变与不变之间：新加坡华语与新加坡华语的形成机制
= Variant and invariant : a preliminary approach to
the exploration of the emergence of Singapore
Mandarin

朱元 Choo, Yuen

2015

Choo, Y. (2015). 变与不变之间：新加坡华语与新加坡华语的形成机制 = Variant and invariant : a preliminary approach to the exploration of the emergence of Singapore Mandarin. Doctoral thesis,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Singapore.

<https://hdl.handle.net/10356/65844>

<https://doi.org/10.32657/10356/65844>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变与不变之间：
新加坡华语与新加坡华语的形成机制**

**Variant and Invariant:
A Preliminary Approach to the Exploration of
the Emergence of Singapore Mandarin**

CHOO YUEN

朱元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2015

**变与不变之间：
新加坡华语与新加坡华语的形成机制**

**Variant and Invariant:
A Preliminary Approach to the Exploration of
the Emergence of Singapore Mandarin**

CHOO YUEN

朱元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A thesis submitted to the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in partial fulfilment of the requirement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Philosophy

2015

致谢

感谢高虹教授和潘秋平教授的悉心指导。

ACKNOWLEDGMENTS

I wish to express sincere appreciation to Professors Helena Hong Gao and Phua Chiew Pheng for their guidance and assistance in the preparation of this manuscript.

目录

图表目录.....	iii
摘要	iv
Abstract	v
第一章 绪论.....	1
1.1 以往学者如何看待新加坡华语.....	1
1.1.1 以往学者给华语的定义.....	1
1.1.2 以往学者给新加坡华语的定义.....	2
1.1.3 本文给新加坡华语的定义.....	4
1.2 新加坡华语样本	5
1.3 研究问题	17
1.3.1 新加坡华语的形成机制.....	17
1.3.2 新加坡华语的特征描写	23
1.4 研究语料	28
1.4.1 成人语言	31
1.5 新加坡华人与新加坡华人社会的语言使用情况.....	33
1.5.1 新加坡的社会语言环境.....	33
1.5.2 新加坡华人历史与华人社会结构.....	34
1.5.2.1 海峡华人.....	34
1.5.2.2 来自中国南部地区的华人移民.....	35
1.5.3 新加坡华人社会的语言使用情况.....	35
1.5.3.1 早期（英属时期 1819-1942）：多方言并用阶段.....	35
1.5.3.2 二战以后（1945-1963）：福建话流行阶段.....	36
1.5.3.3 独立后（1965 至今）：双语政策及讲华语运动	37
1.6 几个术语的界定	41
1.7 论文架构	43
第二章 文献评论.....	45
2.1 语音.....	45
2.1.1 擦音、塞擦音声母.....	45
2.1.2 第五声.....	46
2.2 词汇.....	49
2.2.1 新加坡华语词汇特征研究.....	49
2.2.2 新加坡华语特有词语研究.....	53
2.2.3 新加坡华语词汇与中国普通话词汇对比研究	54
2.2.4 词汇研究的方法问题.....	58
2.3 语法.....	59

第三章 新加坡华语的特征.....	64
3.1 语音.....	64
3.1.1 声母.....	64
3.1.1.1 擦音、塞擦音.....	64
3.1.2 韵母.....	69
3.1.2.1 撮口呼 > 齐齿呼.....	69
3.1.2.2 鼻音韵母.....	70
3.1.3 声调.....	73
3.1.3.1 第五声.....	73
3.2 词法.....	78
3.2.1 构词.....	78
3.2.1.1 轻声.....	78
3.2.1.2 儿化.....	87
3.2.2 词汇语义：共词化（colexification）.....	90
3.3 句法.....	95
3.3.1 名词与名词结构.....	95
3.3.1.1 重叠式名词.....	95
3.3.1.2 量名结构.....	97
3.3.2 动词与动词结构.....	99
3.3.2.1 动补结构.....	99
3.3.2.2 双宾结构.....	112
3.3.3 形容词与形容词结构.....	116
3.3.3.1 重叠式形容词.....	116
3.3.3.2 比较式.....	116
3.4 小结.....	118
第四章 新加坡华语的形成机制.....	120
4.1 柯因内化理论（Koineization）.....	120
4.1.1 柯因内语（Koine）.....	120
4.1.2 柯因内化的形成和延续性.....	122
4.1.3 柯因内语和其他语言接触类型的区别.....	123
4.1.4 新加坡华语和柯因内语的关系.....	124
4.2 新加坡华语的形成.....	125
4.3 柯因内化不能解释的问题.....	144
4.4 可能的解释.....	145
4.4.1 基于语言内部机制提出的观点.....	145
4.4.2 基于语言习得提出的观点.....	148
第五章 结论.....	151
参考文献.....	154

图表目录

表 1.1 新加坡十五岁以上各族人口听得懂各主要和次要语言的百分率	19
表 1.2 新加坡巴士乘客用语状况	20
表 1.3 市场与“熟食中心”用语状况	20
表 1.4 新加坡华族籍贯的人口比例	37
表 3.1 中古入声字“喝”在闽、粤、客等南方汉语方言里的读音	75
表 3.2 中古入声字“跌”在闽、粤、客等南方汉语方言里的读音	76
表 4.1 柯因内化的阶段	121
表 4.2 北京话、福建话、潮州话、广东话、客家话的比较式	129
表 4.3 北京话、广州话、福建话及新加坡华语的状态补语和程度补语标记	131
表 4.4 汉语方言补语 / 补语标记的类型	132
表 4.5 北京话、福建话、潮州话、广东话、客家话比较式的语序类型	136
表 4.6 闽、粤、客家、海南方言的入声韵尾	139
表 4.7 新加坡华语和闽、粤、客家、海南方言的阳声韵尾	139
表 4.8 汉语方言阳声韵尾[-m]和入声韵的分布	140
表 4.9 汉语方言韵尾的分布	141
表 4.10 古入声字在官话方言里的分化情况	146

摘要

本研究关注的是新加坡地区的华语，主要涉及两方面论述：（一）新加坡华语的形成机制；（二）新加坡华语的特征描写。我们将新加坡华语看作一个语言系统，主要探讨这个语言系统的形成机制。一般来说，有关语言各个方面的讨论都必须建立在语言材料的基础之上，因此，要理清一个语言如何形成，我们先要对语言本体进行准确、有效的描写。然而，现有研究对新加坡华语的特征所作的描写不够完善。本文期望做到从整体的结构去考察语音、词法、句法各方面的关联以真正理清新加坡华语的特征，这样对于特征的形成也才能理出个头绪。

本文从语音、词法和句法三个方面讨论了新加坡华语有的一些结构，同时也以北京话作为参照，说明新加坡华语没有的结构。语音部分以声母、韵母、声调分类；词法部分着重讨论了轻声、儿化以及词汇语义；句法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以及由名词、动词、形容词组成的结构。

新加坡早期华人移民的母语大多为南方汉语方言，主要是福建话、潮州话、广东话、客家话和海南话。闽语、粤语、客家话等南方方言之间有亲属关系，都属于汉语，而新加坡华语在结构上与汉语也有系统性的对应。在亲属语言之间发生接触且生成的语言在结构上有系统性对应这一点上来看，新加坡华语符合柯因内语（*Koine*）的特征。

本文在柯因内化理论框架中讨论新加坡华语的形成：各种汉语方言变项在新加坡华人进行交际的言语适应行为中经过协商与妥协，最后融合成一个华人之间可以互相通话的共同语——新加坡华语。然而，在推论过程中我们发现，新加坡华语的形成机制不是一个柯因内化理论就能说明白的，也要一并考虑语言内部的以及语言习得方面的机制。

Abstract

Mandarin spoken in Singapore has been recognized as Singapore Mandarin as it varies from the Standard Mandarin in Mainland China in the aspects of phonology, lexicon and syntax. This thesis attempts to re-examine the emergence of Singapore Mandarin, along with which is a revision of the description of the features of Singapore Mandarin.

In the early 19th century, Chinese migrants moved to Singapore from South China. They brought their own native Chinese dialects, such as Hokkien, Teochew, Cantonese, Hakka and Hainanese. Mandarin is non-indigenous to these Chinese migrants. They kept on using their own native dialects in daily communication. And, it brought about a richly diversified linguistic situation in Singapore.

When speakers of different dialects come into contact, dialect mixing and leveling are likely to take place, of which the formation of a stabilized koine may be one stage. Since Singapore Mandarin emerged under the contact condition of several Chinese dialects, there is possibility that it involved the mixing of features of the different dialects, and led to a new, compromise dialect. So, is Singapore Mandarin a koine? Did Singapore Mandarin come through the process of koineization? On the basis of its phonological, morphological and syntactic structure, the following pages attempt to figure out how Singapore Mandarin emerged.

第一章 绪论

现代标准汉语是中华民国与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方语言，在新加坡是四种官方语言之一，也是联合国六种官方语言之一；其称呼与定义因地而异：中国大陆称为“普通话”，台湾称为“国语”，港澳地区或称“普通话”、或称“国语”，在东南亚与其他海外华人地区则称为“华语”。¹中国大陆的普通话、台湾的国语、东南亚和海外华人地区的华语在语音、词汇、语法上存在一些差异，因而形成地域变体。

本研究关注的是新加坡地区的华语，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论述：

（一）新加坡华语的形成机制；（二）新加坡华语的特征描写。我们将新加坡华语看作一个语言系统，主要探讨这个语言系统的形成机制。一般来说，有关语言各个方面的讨论都必须建立在语言材料的基础之上，因此，要理清一个语言如何形成，我们先要对语言本体进行准确、有效的描写。然而，现有研究对新加坡华语的特征所作的描写不够完善。本文期望做到从整体的结构去考察语音、词法、句法各方面的关联以真正理清新加坡华语的特征，这样对于特征的形成也才能理出个头绪。

1.1 以往学者如何看待新加坡华语

1.1.1 以往学者给华语的定义

关于华语，学界普遍认同的定义是“以现代汉语普通话为标准的华人的共同语”。（卢绍昌 1984；陈重瑜 1986；周有光 2001；徐大明 2003；张从兴 2003；徐杰、王惠 2004；郭熙 2006；周清海 2007；陆俭明 2007）郭熙（2007：24）在这个定义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现在看来，把这个定义中的‘标准’改成‘核心’或许更合适。无论怎样，这里蕴含着这样几个意思：（1）华语不等于汉语；（2）华语也不等于普通话；（3）华语不是中国人所独有的；（4）华语是一种共同语，有自己的标准。”

¹ 现代标准汉语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作为语法规范。

1.1.2 以往学者给新加坡华语的定义

以往学者给新加坡华语的定义主要有两种：一种主张新加坡华语以普通话为基础，另一种主张新加坡华语没有普通话基础。

（一）新加坡华语以普通话为基础

周清海、萧国政（1999）、李临定、周清海（2002：153-154）、陆俭明、张楚浩、钱萍（2002：77-78）、汪惠迪（2002：27）以及徐杰（2007：33）指出，新加坡华语与中国普通话基本上是一致的，都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中国北方话为基础方言。

但是，无论在语音上、词汇上或语法上，二者又有所区别。举例来说，中国普通话里有轻音、儿化，可是在新加坡华语口语中几乎听不到轻音、儿化。这是在语音方面的区别。词汇方面就更明显了，像‘组屋、使到、太过、摆放’等都是新加坡华语常用的词汇，可是在中国普通话里没有这样的词。而像中国普通话里的‘服务员、乘客、宇航员、救护车、摩托车、洗澡、劫持’，在新加坡华语里则分别是‘侍应生、搭客、太空人、救伤车、电单车、冲凉、骑劫’。在语法方面也有区别，最明显的如：在中国普通话里双音节动词、形容词构成反复问时，通常得说成‘参观不参观？／干净不干净？’，可是在新加坡华语里，既可以说‘参观不参观？／干净不干净？’，也可以说‘参不参观？／干不干净？’，而且后一种说法更常见。（陆俭明等 2002：78）

对于新加坡华语与中国普通话在语音、词汇、语法上的差异，学界普遍认同的观点是：由于社会背景和语言环境不同，新加坡华语有别于普通话而具有自己的特色；新加坡华语从英语等外语中吸收了一些外来成分，又从方言中吸收了一些成分，因此，新加坡华语是一种以普通话为基础、有一定融入性的语言。

田惠刚（1994）则认为，新加坡人所说的华语并不具备足够的特征独树一帜，它与海外其他地区的华人所说的华语没有什么不同。田惠刚指出，

新加坡出版的所有教科书和字典都是用标准华语编撰的以及新加坡电台、电视台播放的华语也是标准普通话就是最有力的证据。

以上所言不错，但关键在于我们从哪个视角看待新加坡华语。的确，自 1979 年讲华语运动推广以来，新加坡政府就鼓励华人说标准华语，而所谓标准，就是现代标准汉语。

（二）新加坡华语没有普通话基础

然而，根据周清海（2002；2007：144），新加坡华人是在没有中国普通话口语基础、没有普通话直接影响的情况下开始说华语的。周清海指出，新加坡与中国建交之前，即 1990 年以前，由于中国积极向世界输出革命，所有的广播和出版物都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因此，这些宣传品在东南亚各国都是受禁的。当时，在新加坡的华人完全没有机会接触现代汉语的口语——普通话，也没有机会接触现代汉语的书面语，所接触的是五四前后期的书面语。

周清海（2014）指出，“1949 年之前，中国有很多学者通过中印半岛往南迁移，有很多到了东南亚，特别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就留了下来，也有很多学者由广州到香港、澳门，之后就留在香港、澳门，或者通过香港到其他地方去。更有一大批学者从上海、福建等地移去台湾。华人的大迁移所带去的‘国语’和‘国文’在所居地发展而形成了当地的‘华语’、‘华文’。”。²

汪惠迪 2007 年在新加坡《联合早报》所主办的全球华语论坛上谈“新加坡、马来西亚华语规范的策略”时指出，新加坡的华语和马来西亚的华语是中国明清时期的官话，在新马两国经过长期嬗变而形成华族的共同语。³

² 民国元年（1912 年）以后，中华民国建立了法定的“国语”体系。民国初年的国语以北京话为主，兼顾南北差异，这主要表现在语音方面，即以北京音系为主，但保留入声调（主要采用南京话的入声形式，带喉塞尾[-ʔ]）。

³ 明清时期，国语称为官话。明代官话基础为南京官话，不过民间仍使用方言。（见鲁国尧 1985《明代官话及其基础方言——读利玛窦中国札记》）雍正八年（1730 年），清政府设立正音馆，推广以北京音为标准的北京官话。宣统元年（1909 年），清政府正式设立“国语编审委员会”，订定北京官话为汉语标准语。关于明清官话的基础方言是什么，学界还有争议，但这不影响本文论点。根据文史资料，可以肯定的是，明清时期中国南方通用南方官话，而南京官话在南方官话中有一定声望。（麦耘、朱晓农 2012：344）

1.1.3 本文给新加坡华语的定义

以上关于什么是新加坡华语，有说新加坡华语在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基础上形成，也有说新加坡华语由明清时期的官话发展而来。学界对于新加坡华语是不是有基础语言、基础语言是哪个语言，都还意见分歧。我们不争论新加坡华语是不是有普通话基础，而是从语言本体表现来给新加坡华语定义。我们认为，就其性质而言，新加坡华语的表层与中国普通话、台湾国语、海外其他地区的华语无异，基本上是由北方汉语的形式组成，如：人称代词用的是 [ni²¹⁴]、 “[uo²¹⁴]”、 “[t’a⁵⁵]”，而非 [li⁵¹]/ [nei²³]、 [ŋai¹²]/ [ŋɔ²³]/[gua⁵¹]、 [k’øy²³]/ [ki¹²]/ [i⁵⁵] 等南方汉语的形式；只是新加坡华语在词汇、结构组合、句式等方面表现出某些南方汉语方言特征，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吸收英语、马来语、淡米尔语等其他语言成分。新加坡华语除了借用英语的词汇，其结构组合、句法表现也受到英语的影响，比如表示处所的介宾短语出现在动词及其宾语之后（例：“我 meet 你在学校。”），这是英语的词序，汉语表示处所的介宾短语位于动词之前。跟英语比较起来，马来语及淡米尔语对华语的影响则相对较弱。新加坡华语对马来语及淡米尔语这两个语言成分的吸收只表现在词汇的借用。

就其所表现出来的结构特征而言，我们可以给新加坡华语一个比较中肯的定义：表层基本以北方汉语的形式为主，在词汇、结构组合、句式等方面表现某些南方汉语方言特征，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吸收英语、马来语、淡米尔语等语言成分。就其社会功能而言，新加坡华语是在新加坡地区普遍使用的汉语口语，也是新加坡华人社群的共同语。新加坡华语一方面跟新加坡华人口语使用的福建话、广东话、客家话、海南话等南方汉语方言相对，另一方面又跟现代标准汉语相对，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在共时层面上看，新加坡地区的华语实际上是一个连续体（continuum）。连续体的一端是蹩脚的华语，指方言或英语的词汇、格式比较普遍，但是华语还是占有一定比例，说话人一般是以英语或方言为母语，

日常用语也主要是英语或方言的华人；连续体的另一端是标准华语，指完全运用标准汉语的形式，说话人一般为语文教育工作者、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或在正式场合发言时使用；介于蹩脚华语和标准华语之间的是“市井华语”，指具有新加坡特色的汉语口语，大体上与标准汉语一致，但在词汇、结构组合、句式等方面参杂了南方汉语方言及英语、马来语、淡米尔语等其他语言成分，大部分新加坡华人所说的华语属于这一类。本文探讨的就是这种介于蹩脚与标准之间的“市井华语”，因为这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最自然使用的口语，最能显出地方色彩。

下面我们给出新加坡华语的样本。

1.2 新加坡华语样本

以下为新加坡国家档案馆（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口述历史中心（Oral History Centre）收录的一段访谈内容，访谈日期为 1991 年 3 月 25 日，受访者生于 1915 年，出生地为中国福建安溪，1925 年随父亲、姐姐和叔叔移民到新加坡。受访者在中国上过一、两年私塾，当时私塾的教学媒介是福建话；到了新加坡以后，受访者也上私塾（修竹书院），当时新加坡的私塾的教学媒介是方言。根据访谈内容，受访者是到了师范学院（中国语文学院）才真正接触以国语作为教学媒介的学校。就受访者移民到新加坡的时间来看，受访者是第一代移民到新加坡的华人。据受访者所述，他们到新加坡以后还是说各自的祖籍方言，华人之间为了彼此沟通才开始学习并使用华语（当时称为“国语”）。

下面，我们节录受访者与访员之间的谈话。受访者所说的华语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了解早期新加坡华人所说的华语的面貌提供了线索。为了展现受访者的发音，我们按新加坡国家档案馆口述历史中心的录音记录，给每个段落注音。

不过是这样，因为以前我是住大坡，我们一家人是住大坡，屋子是向人家租的，那么后来搬来这边住一年半载，政府就赶，搬去那边，……我们起初就是说要租屋子，后来就谈，谈说要……

[pu⁵¹kuo⁵¹ sɿ⁵¹ tsə⁵¹iaŋ⁵¹, iŋ⁵⁵uei⁵¹ i²¹⁴ts'ien³⁵ uo²¹⁴ sɿ⁵¹ tsu⁵¹ ta⁴¹p'o⁵⁵, uo²¹⁴mən³⁵ i⁵¹tsia⁵⁵zən³⁵ sɿ⁵¹ tsu⁵¹ ta⁵¹p'o⁵⁵, uʔtsɿ²¹⁴ sɿ⁵¹ siaŋ⁵¹ zən³⁵tsia⁵⁵ tsu⁵⁵ tə, na⁵¹məʔ hou⁵¹lai³⁵ pan⁵⁵ lai³⁵ tsə⁵¹pien⁵⁵ tsu⁵¹ i⁵¹lien³⁵pan⁵¹tsai²¹⁴, tsən⁵¹fu²¹⁴ tsiu⁵¹ kan²¹⁴, pan⁵⁵ ts'i⁵¹ na⁵¹pien⁵⁵,uo²¹⁴mən³⁵ ts'i²¹⁴ts'u⁵⁵ tsiu⁵¹sɿ⁵¹ suoʔ iau⁵¹ tsu⁵⁵ uʔtsɿ²¹⁴, hou⁵¹lai³⁵ tsiu⁵¹ t'an³⁵, t'an³⁵ suoʔ iau⁵¹.....]

我本身去学囉，看人家的工厂怎么样打，一学就会，很容易，很简单。

[uo²¹⁴ pən²¹⁴sən⁵⁵ ts'i⁵¹ sie³⁵ lo⁵⁵, kan⁵¹ zən³⁵tsia⁵⁵ tə⁵¹ koŋ⁵⁵ts'aŋ²¹⁴ tsən²¹⁴mian⁵¹ ta²¹⁴, i⁵¹sie³⁵ tsiu⁵¹ hui⁵¹, hən²¹⁴juŋ^{35:51}, hən³⁵tsien²¹⁴tan⁵⁵]

很容易嘛，我们写几张纸贴出去，我们几时要复课，要上课，学生自然就会来，要出通告，不然学生要怎么样去通知他们，我们贴几张通告。

[hən²¹⁴juŋ^{35:51} ma⁵⁵, uo²¹⁴mən³⁵ sie²¹⁴ tsi²¹⁴tsaŋ⁵⁵ tsɿ²¹⁴ t'ieʔ ts'uʔts'i⁵¹, uo²¹⁴mən³⁵ tsi²¹⁴sɿ³⁵ iau⁵¹ fu⁵¹k'ə⁵¹, iau⁵¹ saŋ⁵¹k'ə⁵¹, sie³⁵sən⁵⁵ tsɿ⁵¹zən³⁵ tsiu⁵¹hui⁵¹ lai³⁵, iau⁵¹ ts'uʔ t'əŋ⁵⁵kau⁵¹, pu⁵¹zən³⁵ sie³⁵sən⁵⁵ iau⁵¹ tsən²¹⁴mian⁵¹ ts'i⁵¹ t'əŋ⁵⁵tsɿ⁵⁵ t'a⁵⁵mən⁵⁵, uo²¹⁴mən³⁵ t'ieʔ tsi²¹⁴tsaŋ⁵⁵ t'əŋ⁵⁵kau⁵¹]

我看相当多年了。

[uo²¹⁴k'an⁵¹ siaŋ⁵⁵taŋ⁵⁵ tuo⁵⁵ lien³⁵ liau²¹⁴]

我有停了一个时期，在那个……我教到 1948 年就停了，50、51、52、53、54、55，到了 56 年 10 月份我再倒回去……到了 1956 年 10 月 2 号才再倒回来教书。

[uo²¹⁴ iu²¹⁴ t'ij³⁵ liau²¹⁴ i⁵¹ kə⁵¹ sɿ³⁵ts'i³⁵, tsai⁵¹ na⁵¹kə⁵¹uo²¹⁴ tsiau⁵¹ tau⁵¹ i⁵¹tsiu²¹⁴ sɿ⁵¹ paʔlien³⁵ tsiu⁵¹ t'ij³⁵ liau²¹⁴, u²¹⁴sɿ³⁵, u²¹⁴sɿ^{35:51}, u²¹⁴sɿ³⁵ə⁵¹, u²¹⁴sɿ³⁵san⁵⁵, u²¹⁴sɿ³⁵sɿ⁵¹, u²¹⁴sɿ³⁵u²¹⁴, tau⁵¹ liau²¹⁴ u²¹⁴sɿ³⁵liu⁵¹lien³⁵ sɿ³⁵ie⁵¹fən⁵¹ uo²¹⁴ tsai⁵¹ tau⁵¹hui³⁵ts'i⁵¹tau⁵¹ liau²¹⁴ i⁵¹tsiu²¹⁴u²¹⁴liu⁵¹lien³⁵ sɿ³⁵ie⁵¹ə⁵¹ hau⁵¹ ts'ai³⁵ tsai⁵¹ tau⁵¹hui³⁵lai³⁵ tsiau⁵¹su⁵⁵]

我说糟糕，等一下给他查到不是麻烦？他说：“不要紧，他不会去查的，你这样填，查到才打算。”……所以，这个有帮助我教多 5 年，可以赚多少年……不然申请很难，申请多一个月，有的最多给你 6 个月。

[uo²¹⁴ suo[?] tsau⁵⁵ kau⁵⁵, tən^{214;51} sia⁵¹ kei²¹⁴ t'a⁵⁵ ts'a³⁵ tau⁵¹ pu⁵¹ sɿ⁵¹ ma³⁵ huan³⁵? t'a⁵⁵ suo[?]: “pu⁵¹ iau⁵¹ tsin²¹⁴, t'a⁵⁵ pu⁵¹ hui⁵¹ ts'i⁵¹ ts'a³⁵ tə⁵¹, ni²¹⁴ tsian⁵¹ t'ien³⁵, ts'a³⁵ tau⁵¹ ts'ai³⁵ ta²¹⁴ suan⁵¹.” …… suo^{35;214}, tsə⁵¹ kə⁵¹ iu²¹⁴ paŋ⁵⁵ tsu⁵¹ uo²¹⁴ tsiau⁵¹ tuo⁵⁵ u²¹⁴ lien³⁵, k'ə^{35;214} tsuan⁵¹ tuo⁵⁵ tuo⁵⁵ sau²¹⁴ lien³⁵……pu⁵¹ zan³⁵ sən⁵⁵ ts'iŋ²¹⁴ hən²¹⁴ nan³⁵, sən⁵⁵ ts'iŋ²¹⁴ tuo⁵⁵ i⁵¹ kə⁵¹ ie⁵¹, iu²¹⁴ tə⁵¹ tsui⁵¹ tuo⁵⁵ kei³⁵ ni²¹⁴ liu⁵¹ kə⁵¹ ie⁵¹]

有他们几个做头的囉，里面呢，主席、总务、财政这些，去交涉。

[iu²¹⁴ t'a⁵⁵ mən³⁵ tsi²¹⁴ kə⁵¹ tsuo⁵¹ t'ou³⁵ tə⁵¹ lo⁵⁵, li²¹⁴ mian⁵¹ nə, tsu²¹⁴ si[?], tsoŋ²¹⁴ u⁵¹, ts'ai³⁵ tsən⁵¹ tsə⁵¹ sie⁵⁵, ts'i⁵¹ tsiau⁵⁵ sə⁵¹]

有，早早就知道。

[iu²¹⁴, tsau³⁵ tsau²¹⁴ tsiu⁵¹ tsɿ⁵⁵ tau⁵¹]

假使说有事情，碰到什么事情要出这个锣鼓，就没有钱拿；你假使不出，有 350 块拿。

[tsia⁵¹ sɿ²¹⁴ suo[?] iu²¹⁴ sɿ⁵¹ ts'iŋ³⁵, p'oŋ⁵¹ tau⁵¹ sən²¹⁴ mo[?] sɿ⁵¹ ts'iŋ³⁵ iau⁵¹ ts'u[?] tsə⁵¹ kə⁵¹ luo³⁵ ku²¹⁴, tsiu⁵¹ mei³⁵ iu²¹⁴ ts'ien³⁵ na²¹⁴; ni²¹⁴ tsia⁵¹ sɿ²¹⁴ pu⁵¹ ts'u[?], iu²¹⁴ san⁵⁵ pai²¹⁴ u²¹⁴ sɿ³⁵ k'uai⁵¹ na²¹⁴]

所以要在那边写明好好啦？（访员）

[suo^{35;214} iau⁵¹ tsai⁵¹ na⁵¹ pien⁵⁵ sie²¹⁴ ming³⁵ hau³⁵ hau²¹⁴ la⁵¹]

啊，写好好，它有章程。

[ã²¹⁴, sie²¹⁴ hau³⁵ hau²¹⁴, t'a⁵⁵ iu²¹⁴ tsan⁵⁵ ts'ən³⁵]

现在会所三层楼，以前打地基是打三层，没有钱，就建两层先。

[sien⁵¹ tsai⁵¹ hui⁵¹ suo²¹⁴ san⁵⁵ ts'ən³⁵ lou³⁵, i²¹⁴ ts'ien³⁵ ta²¹⁴ ti⁵¹ tsi²¹⁴ sɿ⁵¹ ta²¹⁴ san⁵⁵ ts'ən³⁵, mei³⁵ iu²¹⁴ ts'ien³⁵, tsiu⁵¹ tsien⁵¹ lian²¹⁴ ts'ən³⁵ sien⁵⁵]

我们以北京话为参照来看这个语言样本。语音方面，以音节结构，即以声母、韵母和声调来看，有下列几点不同。

（一）舌尖后擦音、塞擦音声母 > 舌尖擦音、塞擦音

新加坡华人将舌尖后擦音和塞擦音声母[tʂ][tʂʰ][ʂ]发成舌尖音。例如：

	北京音	新加坡华语
纸	[tʂɿ ²¹⁴]	[tsɿ ²¹⁴]
厂	[tʂʰaŋ ²¹⁴]	[tsʰaŋ ²¹⁴]
身	[ʂən ⁵⁵]	[sən ⁵⁵]

（二）舌面擦音、塞擦音声母 > 舌尖音

对舌面擦音、塞擦音的把握不稳定，所发出的舌面擦音、塞擦音近于舌尖音。例如：

	北京音	新加坡华语
简	[teien ²¹⁴]	[tsien ²¹⁴]
前	[tɕʰien ³⁵]	[tsʰien ³⁵]
向	[ɕiaŋ ⁵¹]	[siaŋ ⁵¹]

（三）舌尖鼻音声母[n] > 舌尖边音[l]

舌尖鼻音声母[n]发成舌尖边音[l]。例如：

	北京音	新加坡华语
年	[nien ³⁵]	[lien ³⁵]

（四）唇齿擦音声母[f] > 喉擦音[hu]

唇齿擦音声母[f]发成喉擦音[hu]。例如：

	北京音	新加坡华语
烦	[fan ³⁵]	[huan ³⁵]

（五）舌尖后擦音声母[ʒ] > 半元音[j]

舌尖后擦音声母[ʒ]被半元音[j]取代的例子有：

	北京音	新加坡华语
容	[ʒuŋ ³⁵]	[juŋ ³⁵]

(六) 撮口呼 > 齐齿呼

在新加坡华人的发音里，撮口呼常变成齐齿呼。例如：

	北京音	新加坡华语
去	[tɕ'y ⁵¹]	[ts'i ⁵¹]
学	[ɕye ³⁵]	[sie ³⁵]
月	[ye ⁵¹]	[ie ⁵¹]

(七) 鼻音韵母

主要有两种情况：

(i) [-əŋ] > [-ən]

新加坡华人普遍上将鼻音韵母[-əŋ]发成[-ən]。例如：

	北京音	新加坡华语
等	[təŋ ²¹⁴]	[tən ²¹⁴]
层	[ts'əŋ ³⁵]	[ts'en ³⁵]

然而，当声母为双唇音[p][p'][m]和唇齿音[f]，韵母[-əŋ]则被发成[-oŋ]。例如：

	北京音	新加坡华语
碰	[p'əŋ ⁵¹]	[p'oŋ ⁵¹]

(ii) [-in] > [-iŋ]

另一方面，鼻音韵母[-in]则被发成[-iŋ]。例如：

	北京音	新加坡华语
紧	[tɕin ²¹⁴]	[tsiŋ ²¹⁴]

(八) 喉塞音韵尾[-ʔ]及第五声

中古时期或方言的入声语素在新加坡华人的发音里一般带有喉塞音韵尾[-ʔ]，这使得华语在声调上除了阴平、阳平、上声、去声，还多了一个短促的下降调。学界将这第五个声调称为第五声。（陈重瑜 1981；卢绍昌 1981；Chen 1982a；Chua 2003 等）例如：

	北京音	新加坡华语
屋	[u ⁵⁵]	[uʔ]
贴	[t'ie ⁵⁵]	[t'ieʔ]
出	[tɕ' u ⁵⁵]	[ts'uʔ]
说	[ɕuo ⁵⁵]	[suoʔ]
席	[ɕi ³⁵]	[siʔ]

词汇方面，新加坡华语有些南方汉语的词。譬如：在北京话里，“有墙、顶、门、窗，供人居住或做其他用途的建筑物”是“房子”，同样的概念，新加坡华人说“屋子”。“屋子”在北方汉语指的是“房间”。根据 Norman（1988）和罗杰瑞（1995）用来鉴定汉语方言的标准，北方汉语用“房子”或“房子”的同源词称“有墙、顶、门、窗，供人居住或做其他用途的建筑物”，同样的概念，南方汉语说“屋”，闽语说“厝”。此外，新加坡华人用“做头”表示“作为领头人”。“做头”是闽南话的词，北京话不说。

语法方面，新加坡华语有些南方汉语的句法格局。譬如：

（一）副词出现在动词之后。例如：

1. 申请多一个月。
2. 这个有帮助我教多 5 年，可以赚多多少年。
3. 没有钱，就建两层先。

新加坡华人习惯将副词“多”、“少”、“早”、“先”等放在动词之后。如：例（1）和（2），副词“多”出现在动词“申请”、“教”和“赚”之后，例（3）的副词“先”甚至出现在动词“建”及其宾语“两层”之后。在北京话里，这些副词必须放在动词之前。

（二）“有”表示动作行为实现。例如：

4. 我有停了一个时期。
5. 这个有帮助我教多 5 年。

例（4）的意思是“停一个时期”这个事件确实发生过，例（5）则强调某人的动作行为的确对说话人起到帮助的作用。北京话用“了”表示动作行为实现。

(三) “才”表示动作将在另一动作结束后出现。例如：

6. 查到才打算。

在北京话里，表示动作将要在某一情况下出现的副词是“再”。

我们接着来看一段节录自电视节目的语言样本。以下内容是新加坡传媒集团属下 8 频道于 2013 年 11 月 5 日晚间 8 时所播出的节目《摆家乐 5》

(第一集) 中主持人李国煌的说话，主要反映新加坡成人的华语口语。⁴

跟上边的样本一致，也是每个段落注音。其中，无字可写的语气词以小方型格子 (□) 表示，并在小方型格子旁边加注音。

输的人先选。

[su⁵⁵ tə⁵¹ lən³⁵ sien⁵⁵ sien²¹⁴]

蛮牢的现在的家私。

[man³⁵ lau³⁵ tə⁵¹ sien⁵¹ tsai⁵¹ tə⁵¹ tsia⁵⁵ sɿ⁵⁵]

请问你们是什么心态□[hã³⁵]?

[ts'ij²¹⁴ uən⁵¹ ni²¹⁴ mən³⁵ sɿ⁵¹ sən²¹⁴ moʔ siŋ⁵⁵ t'ai⁵¹ hã³⁵]

你们把全部东西移掉，然后玻璃跟我抹干净。这个风扇□[hō³⁵]，是很好用，我知道凉凉的，但是，可以把它拆掉吗？

[ni²¹⁴ mən³⁵ pa²¹⁴ ts'ien³⁵ pu⁵¹ toŋ⁵⁵ si⁵⁵ i³⁵ tiau⁵¹, lan³⁵ hou⁵¹ po⁵⁵ li³⁵ kən⁵⁵ uo²¹⁴ maʔ kan⁵⁵ tsin⁵¹. tsə⁵¹ kə⁵¹ foŋ⁵⁵ san⁵¹ hō³⁵, sɿ⁵¹ hən³⁵ hau²¹⁴ ion⁵¹, uo²¹⁴ tsɿ⁵⁵ tau⁵¹ lian³⁵ lian³⁵ tə⁵¹, tan⁵¹ sɿ⁵¹, k'ə³⁵ i²¹⁴ pa²¹⁴ t'a⁵⁵ ts'ai⁵⁵ tiau⁵¹ ma⁵⁵]

现在我们就去选家俬，还有选装饰品。

[sien⁵¹ tsai⁵¹ uo²¹⁴ mən³⁵ tsiu⁵¹ ts'i⁵¹ sien²¹⁴ tsia⁵⁵ sɿ⁵⁵, hai³⁵ iu²¹⁴ sien²¹⁴ tsuan⁵⁵ sɿ⁵¹ p'ij²¹⁴]

你们先去看看有哪些喜欢的，等下我们集合，我们才来讲，好不好？

[ni²¹⁴ mən³⁵ sien⁵⁵ ts'i⁵¹ k'an⁵¹ k'an⁵¹ iu²¹⁴ na²¹⁴ sie⁵⁵ si²¹⁴ huan⁵⁵ tə⁵¹, tei²¹⁴ sia⁵¹ uo²¹⁴ mən³⁵ tsi³⁵ hə³⁵, uo²¹⁴ mən³⁵ ts'ai³⁵ lai³⁵ tsian²¹⁴, hau²¹⁴ pu⁵¹ hau²¹⁴]

⁴ 李国煌 1968 年生于新加坡，祖籍是中国福建，能说华语、英语、福建话和广东话。（资讯来源：[https://en.wikipedia.org/wiki/Mark_Lee_\(comedian\)](https://en.wikipedia.org/wiki/Mark_Lee_(comedian))），2015 年 10 月 14 日）

这盏灯，你打算放哪里？

[tsə⁵¹ tsan²¹⁴ tən⁵⁵, ni²¹⁴ ta²¹⁴ suan⁵¹ faŋ⁵¹ na³⁵ li²¹⁴]

剩下的钱我们才来买其他装饰品。

[sən⁵¹ sia⁵¹ tə⁵¹ ts'ien³⁵ uo²¹⁴ mən³⁵ ts'ai³⁵ lai³⁵ mai²¹⁴ ts'i³⁵ t'a⁵⁵
tsuaŋ⁵⁵ sɿ⁵¹ p'ij²¹⁴]

给我这两个椅子，跟刚才我们所要的东西，算一下价钱。

[kei²¹⁴ uo²¹⁴ tsə⁵¹ lian²¹⁴ kə⁵¹ i³⁵ tsɿ²¹⁴, kən⁵⁵ kaŋ³⁵ ts'ai³⁵ uo²¹⁴ mən³⁵ suo²¹⁴ iau⁵¹
tə⁵¹ toŋ⁵⁵ si⁵⁵, suan⁵¹ i⁵¹ sia⁵¹ tsia⁵¹ ts'ien³⁵]

五千八百一十三你不会讲就 five eight one three，受英文教育嘛，对不对？

[u²¹⁴ ts'ien⁵⁵ pa²¹⁴ pai²¹⁴ i⁵¹ sɿ³⁵ san⁵⁵ ni²¹⁴ pu⁵¹ hui⁵¹ tsiaŋ²¹⁴ tsiu⁵¹ farv eit wən tri,
sou⁵¹ iŋ⁵⁵ uən³⁵ tsiau⁵¹ i⁵¹ ma⁵⁵, tui⁵¹ pu⁵¹ tui⁵¹]

做么这样久？

[tsuo⁵¹ mo²¹⁴ tsiaŋ⁵¹ tsiu²¹⁴]

这些东西全部你自己推来的？

[tsə⁵¹ sie⁵⁵ toŋ⁵⁵ si⁵⁵ ts'ien³⁵ pu⁵¹ ni²¹⁴ tsɿ⁵¹ tsi²¹⁴ t'ui⁵⁵ lai³⁵ tə⁵¹]

我跟你讲，如果今天□[hō³⁵]，我们 lucky lucky 没有赢□[hō³⁵]，我跟你讲，你全部要自己推回去。够力咧，你把你家里的那些 kalang guni 都推来了。快点，年轻人！还讲有力，拿一个楼梯都要死要死。

[uo²¹⁴ kən⁵⁵ ni²¹⁴ tsiaŋ²¹⁴, lu³⁵ kuo²¹⁴ tsin⁵⁵ t'ien⁵⁵ hō³⁵, uo²¹⁴ mən³⁵ lɔki lɔki
mei³⁵ iu²¹⁴ iŋ³⁵ hō³⁵, uo²¹⁴ kən⁵⁵ ni²¹⁴ tsiaŋ²¹⁴, ni²¹⁴ ts'ien³⁵ pu⁵¹ iau⁵¹ tsɿ⁵¹ tsi²¹⁴ t'ui⁵⁵
hui³⁵ ts'i⁵¹. kou⁵¹ li⁵¹ le²¹⁴, ni²¹⁴ pa²¹⁴ ni²¹⁴ tsia⁵⁵ li²¹⁴ tə⁵¹ na⁵¹ sie⁵⁵ kalaŋ guni tou⁵⁵ t'ui⁵⁵
lai³⁵ liau²¹⁴. k'uai⁵¹ tien²¹⁴, nien³⁵ ts'iŋ⁵⁵ lən³⁵! hai³⁵ tsiaŋ²¹⁴ iu²¹⁴ li⁵¹, na²¹⁴ i⁵¹ kə⁵¹
lou³⁵ t'i⁵⁵ tou⁵⁵ iau⁵¹ sɿ²¹⁴ iau⁵¹ sɿ²¹⁴]

这个等下我们来解决。

[tsə⁵¹ kə⁵¹ tei²¹⁴ sia⁵¹ uo²¹⁴ mən³⁵ lai³⁵ tsie²¹⁴ tsie³⁵]

你的责任就是把那个 curtain 挂上去。你们就帮忙他，好不好？

[ni²¹⁴ tə⁵¹ tsə³⁵ lən⁵¹ tsiu⁵¹ sɿ⁵¹ pa²¹⁴ na⁵¹ kə⁵¹ kətən kua⁵¹ saŋ⁵¹ ts'i⁵¹. ni²¹⁴ mən³⁵ tsiu⁵¹ paŋ⁵⁵ maŋ³⁵ t'a⁵⁵, hau²¹⁴ pu⁵¹ hau²¹⁴]

你去拿砂纸，角头这些木屑把它磨掉。

[ni²¹⁴ ts'i⁵¹ na²¹⁴ sa⁵⁵ tsɿ²¹⁴, tsiau²¹⁴ t'ou³⁵ tsə⁵¹ sie⁵⁵ mu⁵¹ sie⁵¹ pa²¹⁴ t'a⁵⁵ mo³⁵ tiau⁵¹]

你觉得咧？

[ni²¹⁴ tsie³⁵ tə³⁵ le⁵⁵]

现在我们先把这个木摆上去先，看一下如何。

[sien⁵¹ tsai⁵¹ uo²¹⁴ mən³⁵ sien⁵⁵ pa²¹⁴ tsə⁵¹ kə⁵¹ mu⁵¹ pai²¹⁴ saŋ⁵¹ ts'i⁵¹ sien⁵⁵, k'an⁵¹ i⁵¹ sia⁵¹ lu³⁵ hə³⁵]

但是，今天有让我感动到，就是我看到你的家人，还有你的朋友，都为你赴汤蹈火。

[tan⁵¹ sɿ⁵¹, tsin⁵⁵ t'ien⁵⁵ iu²¹⁴ laŋ⁵¹ uo²¹⁴ kan²¹⁴ toŋ⁵¹ tau⁵¹, tsiu⁵¹ sɿ⁵¹ uo²¹⁴ k'an⁵¹ tau⁵¹ ni²¹⁴ tə⁵¹ tsia⁵⁵ lən³⁵, hai³⁵ iu²¹⁴ ni²¹⁴ tə⁵¹ p'ən³⁵ iu²¹⁴, tou⁵⁵ ui⁵¹ ni²¹⁴ fu⁵¹ t'aŋ⁵⁵ tau³⁵ huo²¹⁴]

我们同样以北京话为参照来看这个语言样本。语音方面：

（一）舌尖后擦音、塞擦音声母 > 舌尖擦音、塞擦音

舌尖后擦音、塞擦音声母[tʂ][tʂʰ][ʂ]常被发成舌尖音。例如：

	北京音	新加坡华语
盞	[tʂan ²¹⁴]	[tsan ²¹⁴]
拆	[tʂ'ai ⁵⁵]	[ts'ai ⁵⁵]
输	[ʂu ⁵⁵]	[su ⁵⁵]
砂纸	[ʂa ⁵⁵ tʂɿ ²¹⁴]	[sa ⁵⁵ tsɿ ²¹⁴]

（二）舌面擦音、塞擦音声母 > 舌尖音

新加坡华人对舌面擦音、塞擦音的把握不稳定，所发出的舌面擦音、塞擦音近于舌尖音。例如：

	北京音	新加坡华语
心	[ɕin ⁵⁵]	[sin ⁵⁵]
现	[ɕien ⁵¹]	[sien ⁵¹]
全	[tɕ'yen ³⁵]	[ts'ien ³⁵]
解决	[tɕie ²¹⁴ tɕye ³⁵]	[tsie ²¹⁴ tsie ³⁵]

(三) 舌尖后擦音声母[z] > 舌尖边音[l]

舌尖后擦音声母[z]被发成舌尖边音[l]。例如：

	北京音	新加坡华语
人	[ʐən ³⁵]	[lən ³⁵]
让	[ʐaŋ ⁵¹]	[laŋ ⁵¹]

(四) 撮口呼 > 齐齿呼

在新加坡华人的发音里，撮口呼变成齐齿呼。例如：

	北京音	新加坡华语
育	[y ⁵¹]	[i ⁵¹]
去	[tɕ'y ⁵¹]	[ts'i ⁵¹]
选	[ɕyen ²¹⁴]	[sien ²¹⁴]

(五) 鼻音韵母

主要有两种情况：

(i) [-əŋ] > [-ən]

鼻音韵母[-əŋ]变成[-ən]。例如：

	北京音	新加坡华语
灯	[təŋ ⁵⁵]	[tən ⁵⁵]
朋	[p'əŋ ³⁵]	[p'ən ³⁵]

然而，当声母为双唇音[p-][p'-][m-]和唇齿音[f-]，韵母[-əŋ]则变成[-oŋ]。例如：

	北京音	新加坡华语
风	[fəŋ ⁵⁵]	[foŋ ⁵⁵]

(ii) [-in] > [-iŋ] / [-iŋ] > [-in]

当鼻音韵母中的主要元音为[-i-]，舌尖鼻音[-n]与舌根鼻音[-ŋ]互换，即[-in]被发成[-iŋ]，而[-iŋ]则被发成[-in]。例如：

	北京音	新加坡华语
今	[tɕin ⁵⁵]	[tsiŋ ⁵⁵]
心	[ɕin ⁵⁵]	[siŋ ⁵⁵]
净	[tɕiŋ ⁵¹]	[tsin ⁵¹]

词汇方面，新加坡华语有些南方汉语的词。譬如：“家私”指“家具”是南方汉语的表现。根据《汉语方言词汇》，清楚可见这一点（下表除了北京，其余都是南方方言）：

方言点	词目
北京	家具[tɕia ⁵⁵ tɕey]
梅县	家私[kɑ ⁵⁵ sɿ ⁴⁴] 家生[kɑ ⁴⁴ saŋ ⁴⁴]
广州	家私[kɑ ⁵⁵ ʃi ⁵³]
阳江	家私[kɑ33 qɛi33]
厦门	家私[ke ^{55~33} si ⁵⁵]
潮州	家私[ke ^{33~23} si ³³]
福州	家私[kɑ ⁴⁴ li ⁴⁴]

此外，“够力”、“角头”是闽南话的形式。在闽南话里，“够力”表示“吃力、费力”和“（情况等）严重、利害；糟糕、倒霉”，“角头”则指“角落”。（《新加坡闽南话词典》，页 159；283）

另外，新加坡华语疑问代词的形式和用法基本上与北京话一致，只是个别疑问代词在形式及语义功能上有别于北京话，例如：“做么”。形式上，“做么[tso⁵¹ moʔ]”由“做什么[tso⁵¹ ʂən³⁵ mə]”缩减加上音变而成；功能上，“做么”询问原因和状况。北京话用以询问原因或目的的代词是“为什么”、“干什么”、“干吗”；“怎么”则用以询问性质、状况、方式、原因等。

语法方面：

（一）“才”表示动作将在另一动作结束后出现。例如：

7. 你们先去看看有哪些喜欢的，等下我们集合，我们才来讲，好不好？

（二）“有”表示动作行为实现。例如：

8. 今天有让我感动到。

（三）“到”作动相补语依附于动词。例如：

9. 今天有让我感动到。

“到”强调“感动”状态实现。

（四）动词词组重叠。例如：

10. 还讲有力，拿一个楼梯都要死要死。

这里，动词词组“要死”重叠有调侃兼强调语气的作用。

（五）介词“跟”引进受益者。例如：

11. 然后玻璃跟我抹干净。

（六）语气词

句中语气词[hō]主要用于标志句中的停顿，引出并强调后面的内容。例如：

12. 如果今天[hō]，我们 lucky lucky 没有赢[hō]，我跟你讲，你全部要自己推回去。

13. 这个风扇[hō]，是很好用，我知道凉凉的，但是，可以把它拆掉吗？

句中语气词[lè]表示强调和惊异。例如：

14. 够力[lè]，你把你家里的那些 kalang guni 都推来了。

句末的[lē]则是反问语气。例如：

15. 你觉得[lē]？

句末语气[hā]表示怀疑和揣测。例如：

16. 请问你们是什么心态[hā]？

1.3 研究问题

本研究集中讨论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新加坡华语的形成机制，另一方面是新加坡华语的特征描写。这两方面问题实际上是互相关联的。要理清一个语言如何形成，我们先要对语言本体进行正确、有效的描写。

1.3.1 新加坡华语的形成机制

上边的语言样本说明，新加坡华语是一个混杂的语言系统。除了借用英语、马来语、淡米尔语等语言形式，因其在系统中兼含北方汉语和南方汉语的结构，以往学者一般都在共时平面上、从方言干扰（*dialect interference*）的角度出发来论述新加坡华语的特征。

学者们普遍上将新加坡华语视为带有地域色彩的普通话，因此，现有的研究基本上皆以现代汉语普通话作为参照系，比较新加坡华语和普通话的差异，并且逐项指出差异对应于哪种南方汉语方言结构。譬如：陈重瑜（1981）指第五声是中古入声语素在南方汉语方言中得到保留而通过南方汉语方言投射到新加坡华语。问题是：并非所有保留在南方汉语方言里的中古入声语素在新加坡华语里都读第五声。在音系层面上，第五声是方言入声转移到华语的音节结构并表现为一个喉塞音韵尾[-ʔ]，我们跟着要问：闽语、粤语、客家话等南方汉语方言的音系同时包含入声和阳声韵尾[-m]，为什么只有入声进入华语的音系而方言的阳声韵尾[-m]不干扰华语的音节结构？以上问题说明，新加坡华语的语音特征不单纯是方言接触可以解释清楚的，这里边还有其他一些机制在起作用。

此外，以往谈新加坡华语的语法特征一般也都是指出语言结构之间的平行对应。譬如：作副词用之“多”、“少”出现于动词之后是受粤语和客家话干扰的结果，例如：“吃少一点”、“买多一本”；“有”出现在动词性词语前面作状语，例如：“你有去过吗？ / 我有去过。”，来源于闽、粤方言。（陈重瑜 1983；Chua 2003；祝晓宏 2008 等）由于通行于新加坡华人社群中的南方汉语方言不只一种，因此，目前这类哪个现象源于哪种方言的说法给人的印象是

方言对华语的干扰是随机且不受限制的；这就是说，新加坡华语作为一个语言系统，其形成是没有规律的。

关于新加坡华语如何形成这个问题，学界一直没有明确的说法，都是通过解释语言现象，将新加坡华语的形成指向方言干扰。接触语言学上所谓干扰（interference），是有一个目标语言（target language）作为基础，语言使用者在语言转用过程中将其母语特征带入目标语；也就是说，目标语作为一个基础语言，与语言使用者的母语接触，受母语干扰而发生变异，最后形成一个新的语言。一般上，这种干扰源于转用目标语的语言社群对目标语的不完善学习（imperfect learning）（Thomason & Kaufman 1988；Thomason 2001，2003；吴福祥 2007）。目前学界对新加坡华语的形成所持的看法就是：原本以南方汉语方言为母语的华人在转用华语时，将方言的某些特征带入华语；也就是说，新加坡华语是标准华语（即现代汉语普通话）经方言干扰发生变异而形成的一种汉语变体。

事实上，按文史资料所记载的新加坡华人的语言使用情况，早期华人移民社群中并不存在所谓的标准华语，更别说将华语当作第二语言习得。真要说来自不同方言群的华人移民之间用以交流的共同语言，那是福建话。郭振羽（1985）在研究新加坡的语言与社会的著作中根据语言学家 Ferguson（1971）所建议的分类方式和标准，将福建话与新加坡的四个官方语言，即马来语、英语、华语和淡米尔语，并列为新加坡的主要语言。⁵郭振羽（1985：24）指出，“福建话的地位和功能，不仅在于其方言群人口的多数地位，而更在于它在华族不同方言群人口中作为通用语的地位。”根据郭振羽（1985：24-25）所整理的资料，“自新加坡开埠以来，来自中国福建省南

⁵ 依照 Ferguson（1971）所建议的标准，凡是具有以下条件之一者，即是主要语言：

（一）母语人口达一百万人以上或占全国人口 25%以上。

（二）法定官方语言。

（三）是全国 50%以上中学毕业生的教育用语（Ferguson 1971：159）。

郭振羽（1985：11）指出，根据以上标准，新加坡的四个官方语言，即马来语、英语、华语及淡米尔语，都属主要语言。此外，按 1957 年新加坡全国人口普查，福建话的母语人口占全国人口 30%左右，也应归类为主要语言之一。

部的移民，时间最早，且人数最多，始终占华族人口中的多数地位。多年以来，福建话也发展成为不同方言群人口之间的通用语。在五十年代及六十年代的群众运动中，各党派人士也发现福建话是最能诉诸于民众感情的语言，具有政治上的功能。事实上，直至 1970 年代末期，李光耀总理在发表全国性演说时，还是经常先后以英语、马来语、华语以及福建话发表谈话。李光耀以群众运动起家，自然深深了解福建话的群众性。事实上，1978 年，展开‘华语运动’前，李总理即深深感叹方言之根深蒂固，难以去除。他表示自己在这方面也要负一部分责任，因为是他早年政治运动中把福建话提升为政治语言。（星洲日报，1978，4，8）”

此外，郭振羽（1985：25）所提供的调查数据也能说明福建话在新加坡华族不同方言群人口中的普及性以及其通用语的地位：

（一）1982 及 1983 年市场调查机构 SRS 的调查显示，华人人口中有 93%自称听得懂福建话，其他民族，如：马来族人口中有 17%自称听得懂福建话，印度族人口中则有 13%自称听得懂福建话。在其全国人口代表性的抽样中，各族人口总共有 75%自称听得懂福建话。这个百分比超过官方语言的百分比。

主要语言	主要民族			全人口
	华族	马来族	印度族	
马来语	43.4%	100.0%	87.8%	54.5%
英语	61.3%	75.4%	85.4%	65.7%
华语	88.1%	2.7%	2.4%	68.5%
淡米尔语	0.4%	1.9%	87.0%	6.5%
福建话	92.6%	17.4%	13.0%	74.9%
广东话	74.4%	1.1%	< 1%	57.6%
潮州话	58.7%	< 1%	0.8%	45.4%
受访者人数	3,826	648	241	4,816

表 1.1：新加坡十五岁以上各族人口听得懂各主要和次要语言的百分率 [1982/83]（郭振羽 1985：17，根据 SRS Media Index, 1983, Vol. I, Table 7A）

（二）根据 1979 年新加坡巴士公司的调查，华族乘客在面对华族服务员的时候，75%使用福建话；与马来族服务员和印度族服务员讲福建话的华族乘客也各有 30.6%和 26.8%。

使用语言	使用语言对象		
（一）华人乘客	华人服务员	马来人服务员	印度人服务员
华语	3.7%	1.0%	0.8%
福建话	75.0%	30.6%	26.8%
潮州话	7.0%	1.7%	0.8%
广东话	5.2%	1.0%	0.8%
其他中国方言	1.0%	0.5%	-
英语	7.0%	34.2%	36.2%
马来语	1.2%	31.1%	34.6%
总计	100%	100%	100%

表 1.2：新加坡巴士乘客用语状况（郭振羽 1985：18，海峡时报 1979 年 9 月 8 日，刊载李光耀先生于“推广华语运动”开幕式中演讲词）

（三）根据新加坡环境发展部于 1979 年 4 月在全岛各地九个市场和熟食中心（hawker centres）所作的调查，摊贩对顾客使用福建话的百分比为 53.2%，而顾客对摊贩使用福建话的百分比为 55.5%。这个比例远超过新加坡华族人口中的福建方言群人口（即 30%）。这就是说，在顾客与摊贩之间以福建话交谈的比例中，包含有不是以福建话为母语的人，足见福建话在新加坡社会的通用性。

采用语言	摊贩对顾客用语	顾客对摊贩用语	摊贩方言群背景
福建话	53.2%	55.5%	37.6%
潮州话	20.9%	17.3%	39.0%
广东话	14.3%	15.2%	10.5%
其他方言	1.0%	1.1%	12.9%
（方言总计）	（89.4%）	（89.1%）	（100%）
华语	1.2%	1.2%	—
英语	2.7%	3.0%	—
马来语	6.7%	6.7%	—
总计	100%	100%	—

表 1.3：市场与“熟食中心”用语状况（郭振羽 1985：26，海峡时报 1979 年 9 月 8 日，刊载李光耀先生于“推广华语运动”开幕式中演讲词）

总的来说，在新加坡政府抑制方言的使用及发展以前，福建话不仅是新加坡华族不同方言群人口中普及的通用语，也是新加坡的政治语言之一。也就是说，当时华人社群中的优势语言是福建话。就目标语而言，来自不同方言群的华人为了沟通而学习说的是福建话，不是华语。因此，目前学界普遍认同的方言干扰的说法在根本上就出现了问题：一方面，新加坡华语的特征不是在有一个华语目标，而目标语受汉语方言干扰（即母语干扰）的情境下形成的；另一方面，方言干扰或许能解释新加坡华语某些现象的源头及成因，但对于新加坡华语所没有的结构，譬如：南方汉语方言有双唇鼻音韵尾[-m]，这一显著的方言特征却不干扰华语的音节结构，像这样的问题，方言干扰解释不了。

陈保亚（1996）对汉语和傣语的接触所进行的研究中指出，以傣族学汉语来说（即傣语是母语而汉语是目标语），“傣语和汉语都有的声母，傣语就直接进行一对一的匹配，如傣语的[p][p^h][m]分别匹配汉语的[p][p^h][m]。由于这种一对一的匹配基本上在音质上同等，可以称为等值匹配。傣语中没有而汉语中有的声母，傣语就用一个近似的音去匹配这些汉语声母，比如汉语有[tɕ^h][tɕ^h][tɕ^h]声母而傣语没有，傣语就用近似的[s]去匹配这些声母。这种匹配基于相似原则，可以称之为相似匹配。傣语有而汉语没有的声母，匹配就落空，如傣语有[h]而汉语没有，[h]就落空了，为了方便起见，这种匹配可称之为零匹配。”（陈保亚 1996：16）总的来说，“目标语言的每一个音都必须在母语中受到匹配，这样目标语言有而母语没有的音就必然要在相似匹配中以一对多的方式被归并。另一方面，母语中有而目标语言没有的音，总是在匹配中落空，形成零匹配，并不进入民族方言（或第二语言）。”（陈保亚 1996：30）

若说新加坡早期华人移民社群以华语作为目标语言，那么，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南方汉语方言有的[-m]尾之所以没有带入新加坡华语，是由于华语这个目标语言中在鼻音韵尾上只有舌尖和舌根两个对立，故双唇鼻音匹配

落空，可以不带入。然而，如前所述，早期华人移民社群的语言中没有一个是华语目标，反而是福建话这个南方汉语方言占优势。既然福建话在早期华人的语言使用中占据这么重要的地位，按理说，福建话有的这个[-m]尾在新加坡华人说华语的时候应该会造成强势干扰。事实却相反，新加坡华语在鼻音韵尾上只有舌尖和舌根的对立，没有唇鼻音[-m]。这么说来，新加坡华语的结构似乎不是通过母语的结构与目标语言的结构进行匹配这种对应关系形成的。结合文史资料和语言本体结构来看，在新加坡华语的形成过程中，也就是新加坡华人从说各种南方汉语方言到以华语作为共同语的过程中，可能原本就不存在一个特别突出的目标语言，各南方汉语方言与华语处于平行混合的状态。

本文着眼于新加坡华语的形成问题，希望能给新加坡华语的形成机制一个较完善的说明。目前我们可以确定的事实是，新加坡华语是在一个彼此有亲缘关系的方言混合并相互接触的环境中形成的。早期从中国南部省份移民到新加坡的华人的母语大多为南方汉语方言，主要是福建话、潮州话、广东话、客家话和海南话。闽语、粤语、客家话等南方方言之间有亲属关系，都属于汉语，而新加坡华语在结构上与汉语也有系统性的对应。

所谓系统性对应，指的是在语音、词汇和语法上表现一致性。语音方面，汉语各方言的音节结构规则基本上是一致的：声母可以为零形式，韵母则不能为零；就韵母而言，韵腹是必有成分，韵头、韵尾则可有可无。新加坡华语的音节亦然。若用字母 C 代表辅音音素，V 代表元音音素，对音节的音段成分进行线性分析，新加坡华语音节的线性结构有以下几种类型：CV、CVV、CVVV、CVC、CVVC、VVV、VV、VC、V。例如：“泥[ni³⁵]”是 CV 型、“该[kai⁵⁵]”是 CVV 型、“跳[t'iau⁵¹]”是 CVVV 型、“敢[kan²¹⁴]”是 CVC 型、“凉[liaŋ³⁵]”是 CVVC 型、“歪[uai⁵⁵]”是 VVV 型、“我[uo²¹⁴]”是 VV 型、“安[an⁵⁵]”是 VC 型、“衣[i⁵⁵]”是 V 型。词汇方面，“汉语各方言所使用的词大部分是相同的。所谓相同，是指词义、词素及其

构造方式相同，读音则不必相同。十个数词在不同方言里尽管语音上差异很大，但仍然是相同的词。”（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室编 2004 [2003]《现代汉语专题教程》，页 370）新加坡华语的十个数词与北京话一致，其人称代词也与北京话使用相同的词素，即“你[ni²¹⁴]”、“我[uo²¹⁴]”、“他[t'a⁵⁵]”。语法方面，汉语缺乏表示语法意义的词形变化。新加坡华语也不通过词形变化来表现语法意义，比如：“他爱我”和“我爱他”，里面的两个代词“他”和“我”，不管是作主语还是作宾语，词形都不改变；动词“爱”，不管作主语的是第一人称还是第三人称，都没有相应的词形变化。词序和虚词是新加坡华语表达语法意义的主要手段。这跟汉语各方言一致。例如：“我骂粗话”和“骂我粗话”，因词序不同，所表示的意义也不一样，前者讲粗口的人是“我”，后者是他人对“我”骂脏话。又如：“我和朋友”、“我的朋友”，由于虚词“和”与“的”的不同，所表示的语法关系和意义也不相同，“和”表示“我”与“朋友”是并列关系，“的”表示“我”与“朋友”之间的领属关系。

在亲属语言之间发生接触且生成的语言在结构上有系统性对应这一点上来看，新加坡华语符合柯因内语（*Koine*）的特征。换句话说，新加坡华语可能是一种柯因内语。也就是说，新加坡华语是几种汉语方言在新加坡华人社群内相互接触，经过混合、拉平而生成的一种具有区域性共同语性质的新的语言变体或新的方言。这一过程在社会语言学上称为柯因内化（*Koineization*）。以上是我们根据文史资料及共时的语言材料给新加坡华语的形成机制做的假设。我们将新加坡华语的语音、词法和句法现象放到柯因内化这个理论框架中去讨论，以验证我们的假设。同时，我们也希望能在理论方面有所贡献。

1.3.2 新加坡华语的特征描写

关于新加坡华语在语音、词汇、语法方面的表现，现有的研究皆如我们上边的做法，对现象进行平行。譬如：语法方面，祝晓宏（2008）指新加

坡华语的名词能重叠表示性质或方位，例如：“水水”表示“稀薄（跟‘稠’相对）”、“尾尾”表示“在尾端”；形容词也能重叠表示量的增加，有生动色彩，如：“要求多多”表示“过多要求”、“脸黑黑”和“脸臭臭”表示“脸色不好看，显出不愉悦的样子”。祝晓宏列举了名词和形容词重叠的例子，但没有说明哪些名词、形容词能重叠、哪些不能重叠，这样会让人误以为凡名词和形容词在新加坡华语里都能重叠。本文第三章重新描写了新加坡华语的部分语法范畴。虽然不是穷尽的句法描写，但我们专注说明了某个语法范畴中哪些句式在新加坡华语是合法的、哪些不合法。

又如：语音方面，Chua（2003）指新加坡华语没有轻声和儿化。接着，Chua 在词汇的部分指出，新加坡华语省略“子”后缀及“儿”后缀。至于为什么没有轻声、儿化以及为什么省略“子”后缀和“儿”后缀，Chua 认为，那是因为闽语、粤语、客家话等南方汉语方言没有这些表现。Chua 是从外部干扰，即语言接触的角度，来分别解释新加坡华语在语音方面没有轻声、儿化以及在词汇方面省略“子”、“儿”后缀的原因。

实际上，就语言材料本身而言，结合语音和构词来看，轻声、儿化以及“子”、“儿”后缀的问题是相联系的。关于这种语音与构词之间的关联我们在第三章讨论。我们要指出的是，个别语音现象或个别词汇现象构不成新加坡华语的特征，我们必须从整体的结构去考察语音、词法、句法各方面的关联才能真正理清一个语言的特征，对于特征的形成也才能理出个头绪。

关于新加坡华语特征描写，另外还有两方面问题值得提出：（一）语料用的是口语还是书面语；（二）以哪种语言作为参照系。

首先是语料的问题。在以往的研究中，陈重瑜（1983，1986）、吴英成（1985）和 Chua（2003）从口语语料出发，描写新加坡华语的语法特征；祝晓宏（2008）、刘慧博（2010）以书面语作为材料，分析新加坡华语的语法特征；陆俭明等（2002）以新加坡华语的书面语为主要考察对象，同时兼顾口语。学者们所用的书面材料除了由新加坡作家、学者撰写的华文书籍，

包括小说、戏剧、散文集、游记等，还有新加坡发行的华文报章，主要是《联合早报》；口语材料则来自广播电台、第 8 波道的华语节目以及日常生活对话。陆俭明等（2002：80）指出，之所以以书面语作为考察新加坡华语语法的主要对象，基于以下两方面的考量：

（一）一般说来，书面语是经过加工、提炼的语言，相对说来较具规范性。

（二）一个民族的共同语一般包括口语和书面语两种形式，前者是以口耳进行交际的口头形式，后者是用文字记载下来的书面形式。它们形成共同语的历史过程是不同的。一般说来，一个民族的共同语的形成，书面语要早于口语。……选用新加坡华语的书面语作为考察对象就因为考虑到新加坡华语的书面语更具新加坡华人共同语的代表性。

陆俭明等（2002：81）还指出，新加坡华人的口语还未达到作为新加坡华人共同语的成熟阶段，若以口语为考察新加坡华语特点的材料，就很容易把本不属于新加坡华语的现象看成是新加坡华语的特点。

事实上，华语作为沟通各方言群体的共同语始于口语。通过与新加坡华人年长者（60 岁以上）谈话，我们得知，他们是在日常交际中互相“随便”讲而建立起彼此间沟通的共同语——华语的。也因为如此，年长者一般都苦于只会讲华语却读不懂汉字，更别说书写了。

另外，Chua（2003）指出，语法方面，新加坡华语书面语趋同于现代汉语普通话，而口语较充分体现新加坡华语的特点。也就是说，新加坡华语口语和书面语不是一个系统，不能混在一起谈。

关于书面语的问题，朱德熙（1987）指出，研究书面语语法要比研究口语语法困难得多，因为书面语包含许多不同的层次，稳定性和均匀性都远不如口语。首先，对于书面语语句的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我们不容易作出判断。一种句式是否能说，往往会引起争议。有些书面汉语句式的可接受性也只有程度上的差别，不像口语里的句式那样界限分明。对于我们来

说，重要的是把常见的、已经在语言里生了根的句式跟那些只是偶然出现、身份还不太明确的句式区别开。也就是说，研究口语有利于我们去发现新加坡华语最根本的语法事实。例如：基本句型的确认、语法成分，如：虚词的功能以及语音节律等等。从社会语言学的观点来看亦然。Weinreich, Labov & Herzog (1968) 的经验证据表明，一个言语集团中系统性最强、最能清楚显示语言发展进程的音系是人们漫不经心交谈时的音系；它有着最少的区别对立而有着最多的语境支持。换句话说，口头交谈时所使用的口语比书面语更能反映语言的真实面貌。

Moravcsik (1978: 98) 也表示，“语言学研究的根本目的是解释人类为何及如何用口腔和鼻腔发音以进行沟通交际。因此，语言学研究解释的主要语言材料应该是口语。”。Moravcsik (1978) 也指出，语言学理论必须要能概括包括方言在内的所有可能存在的人类真实话语，并且要能为促进语言使用者沟通交际的各种人类语言设限。换句话说，能解释人类话语交际行为的语言学理论必须建立在口头语言的基础之上。

现有有关新加坡华语语法的研究一般选择书面语作为考察对象，一是因客观条件所限，研究者不能到新加坡进行实地考察，而书面语有纸质和电子等可视文本，易于传递，便于在异地研究；二是书面语比口语更具规范性，便于做对比研究的依据，结论更具客观性。（祝晓宏 2008；刘慧博 2010）但事实上，新加坡华语书面语的内部不是均匀的。周清海（2002）指出，新加坡华语保留了许多近代汉语的成分，比如“抑或”是近代汉语的连词，中国现代汉语已经不用了，但还保留在新加坡华语的书面语里。也就是说，新加坡华语书面语有存古现象。

为满足语料内部均匀、无矛盾，本文考察的语料来自日常观察、新加坡口述历史材料以及新加坡电视剧、电影和短片对白。关于语料的来源，我们在本章 1.4 节“研究语料”的部分进行说明。

接着是参照系的问题。语音方面，陈重瑜（1981）、Chen（1982a, b）、Chua（2003）等皆以普通话作为参照系。这对于语音方面的研究基本没有问题，因为普通话严格遵守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换句话说，作为一个参照系，普通话的语音系统内部算是均匀的。词汇方面，以往的研究均以中国普通话作为参照系，指出新加坡华语词语与中国普通话词语在词义、词形及语用上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选择和差异。就词汇标准来看，由于普通话以北方话为基础，即以广大北方话地区普遍通行的说法为准，因此，这对于词汇方面的研究基本上也没有问题。

参照系的问题主要出在语法方面。目前新加坡华语语法相关研究的共同点是皆以普通话作为参照，拿新加坡华语与中国普通话进行比较，指出个中差异。虽然作为现代汉语的标准语，朱德熙（1987）认为，普通话只是理论上存在的抽象的东西，而且它不十分稳定。朱德熙表示，普通话的不稳定性在书面语和口语上都有所表现。就书面语来说，作者很难避免他自己的方言的影响。此外，书面语还有存古和欧化句式。例如：（朱德熙 1987：80）

17. 老大叫通明，老二叫火亮。都长得粗粗盘盘的。（梁斌《翻身记事》）

18. 微微润润的枕头套冰着烧脸。（巴金《春天里的秋天》）

19. 她无力地堆堆水水地坐在那儿，呆呆地大张着她的小嘴儿……（刘亚舟《男婚女嫁》）

“有些写现代汉语语法书的作者想要证明 AABB 式形容词不都是由 AB 式双音节形容词重叠造成的，可是他举的这些例子都是方言，北京话里没有这样的说法。”（朱德熙 1987）

朱德熙指出，普通话口语的不稳定性主要表现在不同方言区的人说的普通话可以有很大的差别。譬如“不少语法著作从鲁迅、毛泽东、老舍、赵树理、曹禺、巴金、叶圣陶等人的著作里援引例句，可是这些著作的语言远远不是均匀、一致的，甚至同一部著作内部也不一定都一致（例如老舍、曹禺

的作品里对话部分和叙述部分就不一致)。这些著作的语言跟基础方言北京话的关系或远或近,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作者本人的方言的影响和干扰。”。

(朱德熙 1987)

现有新加坡华语语法研究所列举的新加坡华语的语法特点都是就与中国普通话相比较而言,但是,就如朱德熙(1987)所言,要问汉语语法的特点是什么,先要问你是拿汉语跟哪种语言比较。同理,我们要研究新加坡华语的语法特点,也先要考虑拿新加坡华语跟哪种语言比较。朱德熙(1987)提出现代汉语语法的多样性,指出普通话和方言语法之间的分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建立以北京方言语法为基础的多方言语法体系。这是因为北京话基本上是稳定的、均匀的。一个语法格式北京话说还是不说,大都可以找到确定的答案,因此比较容易总结出规律来。总的来说就是,就语法研究对语料的要求而言,普通话不属于内部均匀(homogeneous)、无矛盾(consistent)的语料。我们建议以南北汉语方言作为参照系,立足于汉语方言类型来讨论新加坡华语的语法系统,因为相对于普通话来说,北京话、武汉话、太原话、苏州话、厦门话、广州话等南北汉语方言是单纯的语言。当然,方言也可能因接触而发生变异,但至少个别方言的内部是均匀的。所谓内部均匀指的是,个别方言还是保持其作为北方汉语或南方汉语的类型特征。至少目前还未发生变异导致方言类型改变的情况。再者,方言以口语为基础,即使是书面记录也以口语为依据。这也就是说,要进行平行的比较,我们所用的新加坡华语的材料也必须是口语。

1.4 研究语料

本文所参照的南北汉语方言主要来源于二手语料,即相关前人文献、方言词典、语料库等。我们所参照的北方汉语方言是北京话(即北京口语),语料来源为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研究所“北京口语语料”(简称“北语BJKY”)以及相关前人文献,如:周一民(1998)《北京口语语法》、胡明扬等著(1992)《北京话研究》等。因此,本文所谓北京口语指的是二十至

二十一世纪在北京城区和近郊区的坐地户（上一代便在此地居住的家庭）居民所使用的日常口语。（周一民 1998：1；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研究所“北京口语语料查询系统简介”）我们所参照的南方汉语方言则是新加坡的几个主流汉语方言，即闽南话（主要指福建厦门、漳州、泉州地区的福建话以及广东潮汕地区的潮州话）、广州话及客家话（梅县、大埔），语料来源为相关前人文献及方言词典。广州话的语料也参考香港教育学院语言学及现代语言系“香港二十世纪中期粤语语料库”（A Linguistic Corpus of Mid-20th Century Hong Kong Cantonese）。

本文所研究的语料是新加坡华语口语。语料收集于 2011 年至 2014 年间。我们采用参与观察法（participant observation），从日常会话中获取语料，并以作者近母语者的优势来体察分辨新加坡华语的结构特征。

作者是马来西亚华人，在马来西亚柔佛州长大，高中毕业以后到新加坡升学，至今在新加坡生活了十年。地理上，柔佛位于马来西亚南部，彼岸就是新加坡，中间隔着柔佛海峡。作者的母语是华语。马来西亚华语口语与新加坡华语口语基本上可互通，尤其是马来西亚南部华人所说的华语，因为除了地理位置靠近，在柔佛也能接收新加坡电视及广播频道。传媒的渗透使马来西亚南部华人的语言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新加坡语言的影响。事实上，新加坡华语和马来西亚华语之间还是有所差异。作者由于在马来西亚长大，又在新加坡生活了有一段时间，可以说对马来西亚华语和新加坡华语都比较熟悉，也能分辨出两者的差异。

研究一种语言或方言，作者本身为母语者不仅是语料来源之一，作者具备的语感也可以体察分辨母语中的精妙与特殊之处。再加上我们采用参与观察法，由于被调查者不知道自己受到观察，这使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观察者的矛盾”（the observer's paradox），可以观察到自然的语言状态。参与观察法与录音访谈法不同的是，当你听到一个变项时，必须尽快记录下来，但这种调查方法的不足之处也在于不能记录下所有听到的例子，那么也

就不能提供变式出现的频率。为提高语料的精确性和可信度，我们也从新加坡口述历史、新加坡华语电视 8 频道于 2011 年至 2014 年间播出的本地综艺节目及电视剧、新加坡电影和收录在 viddsee 的短片收集语料。⁶

（一）新加坡口述历史

新加坡国家档案馆（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于 1979 年成立口述历史组，1993 年正式命名为口述历史中心（Oral History Centre），负责保管国家的历史。中心通过访谈录音的方法编整、保存及传播人们对新加坡早期历史的集体回忆。中心迄今收集了几千小时的口述历史访谈资料以及超过四千小时的数位访谈资料。访谈语言包括峇峇马来语（Baba Malay）、印尼语（Bahasa Indonesia）、粤语、英语、海南话、客家话、福建话、日语、马来语（Malay）、华语、上海话、淡米尔语、潮州话、泰语（Thai）等。访谈范围包含：新加坡先驱人物、日本统治时期的新加坡、消失中的行业、新加坡多元种族社会、新华社会、新加坡的政治、经济和教育发展、新加坡的公务员制度等。由于口述历史以非正式且最原始的交谈形式进行，再加上访谈内容范围广泛，我们可以从中获得自然丰富的口语语料。除了录音档，有些访谈纪录还备有文档，而文档也是不加修饰、按原音档转写的。我们通过资料库搜索，将访谈语言设定为华语，选取那些兼有音档和文档的纪录，共十二小时，集中观察受访者的语言。⁷

（二）综艺节目及电视剧

新加坡华语电视频道制作的综艺节目及电视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这个地区的语言特色。除了广播，电视也是新加坡人获取讯息甚至是年长者学习语言的媒介。换句话说，新加坡人所说的语言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电视的影响。基于以上因素，我们将综艺节目及电视剧包括在所收集的语料范围。

⁶ Viddsee 是一个收录了亚洲各个地区短片的网络平台：<https://www.viddsee.com/>。

⁷ 新加坡国家档案馆口述历史中心资料库搜索页面：

http://www.nas.gov.sg/archivesonline/oral_history_interviews/advanced-search

我们在 8 频道于 2011 年至 2014 年间播出的本地综艺节目及电视剧中选取内容比较贴近生活的几个节目，观察并记录节目中所使用的语言。我们选取的节目有综艺节目《美差事·苦差事 2》（2011）、《HDB 太太 3》（2012）、《笑笑没烦恼》、《摆家乐 5》（2013）、《好好说、慢慢讲！2》、《快乐速递》（2014）以及电视剧《甘榜情》（2011）、《我们等你》（2012）、《小子当家》、《小小传奇》（2013）、《118》（2014）。

（三）新加坡电影

新加坡华语电影中的对白经常参杂了华语、方言、新加坡式英语、马来语、淡米尔语等新加坡各个族群使用的语言，因此，新加坡电影很能体现这个社会的语言面貌。我们选取的电影有《小孩不笨》、《小孩不笨 2》、《跑吧！孩子》、《孩子不坏》、《突然发财》、《钱不够用》、《钱不够用 2》、《12 莲花》、《881》、《十二楼》、《我在政府部门的日子》、《新兵正传》、《新兵正传 II》以及《爸妈不在家》。

（四）短片

除了以上来源，我们也通过上载于 viddsee 网络平台的新加坡短片观察新加坡人所说的华语。这些短片所使用的语言与新加坡电影的对白类似，参杂了新加坡的各种社会语言，能体现新加坡的语言面貌。此外，新加坡政府机构上传到 YouTube 的官方宣传短片，譬如：新加坡人力部（Ministry of Manpower）发布的解说职工权益的华语短片、新加坡政府发布的建国一代配套（Pioneer Generation Package）华语解说短片，也为我们观察新加坡华语提供了部分语料。

1.4.1 成人语言

本文研究的是成人口语，即三十岁以上、在新加坡本土出生或在新加坡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华人所说的华语。以上年龄界定按新加坡华人社群因国家语言政策改变而经历的语言变动而定。“因为社会和政治事件都有可能影响人们讲话的方式，所以变异的年龄差异可以反映出社会和政治的变化。这一

点赋予了年龄阶段以新的含义，也为划分讲话人的群体提供了新的途径。”
（徐大明 2006：159）

调查数据显示，新加坡政府自 1979 年推行讲华语运动以来，以祖籍方言作为主要家庭用语的华族人口由 1980 年的 81.4% 急降至 1990 年的 50.6%；同时，以华语为主要家庭用语的华族人口从 1980 年的 10.2% 骤升至 1990 年的 29.8%。然而，1987 年后，政府实行双语教育，各级学校以英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语，族群母语为一门必修科，再加上英语是国家的行政语言，使用英语的华人从 1980 年的 7.9% 倍增至 1990 年的 19.2%。教育部的统计数字显示，在家讲华语的华族小一学生从 1980 年的 25.9% 增至 1990 年的 67.9%，随后开始逐年递减；在家讲英语的华族小一学生人数却不断上升，从 1980 年的 9.3% 增至 1990 年的 26.3%，到 2004 年升至 47.3%，超越讲华语的 40.3%。以上数据说明，新加坡华人社群的语言自讲华语运动到双语政策经历了从方言转向华语以及从华语转向英语两个阶段的变动，而显著的语言转向发生于 1990 年。以教育部的调查为据，1990 年的小一学生（普遍年龄为七岁）到今天 2015 年年约三十。因此，我们将观察对象的年龄界定在三十岁。

本文所描述的新加坡华语的特征主要是三十岁以上成人群体的华语口语特征。青少年所说的华语在某些方面有异于成人所说的华语，但这些差异反而让我们看到一个社群的共同语因不同年龄层的语言使用习惯以及所受的语文教育不同而发生变化。我们之所以将语言的描写固定于成人所说的华语是由于成人的语言与其他年龄层比较起来是相对稳定的。社会语言学研究表明，成年早期的语言系统一旦建立起来，通常情况下会一生保持稳定，很少再出现大规模有规律的变化；即使某些语言变化在同一社区年轻人的语言中根深蒂固，年长的人通常不会受影响。（Chambers 1995；徐大明 2006）反观，社会语言学研究指出，青少年时期是语言革新与变化的重要阶段。他们通过接纳地区性的语言变项，即创新的语言形式，来表达和同龄群体的一致性以及对成年规范的背离。Eckert（1989）对底特律某郊区中学青少年群体实

践社区中的语言变异所做的调查显示，青少年的语言在某些变式的使用频率上总是和同龄人相同并异于他们的父辈。也就是说，青少年群体的言语形式具有其社会意义。从语言本体的角度而言，成人语言和青少年语言之间的差异标示跨代的语言变化。新加坡华语的跨代变化说明，在语言政策主导语言使用的社会里，语言系统持续处于波动状态。

关于新加坡华人与新加坡华人社会的语言使用情况，简述如下。

1.5 新加坡华人与新加坡华人社会的语言使用情况

1.5.1 新加坡的社会语言环境

新加坡临近马来半岛的最南端，处在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来往的航运要道，是东西商舶必经之地。英国东印度公司代理人莱佛士（Stamford Raffles）在 1819 年登陆新加坡之后，逐渐将这个小岛发展为一个自由贸易港口。英殖民地官员积极鼓励各地的移民迁入新加坡以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新加坡移民社会自此成形。

新加坡从开埠以来，一直维持一个多元种族和文化的社会。全国人口普查一向把人民归为四大种族：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及其他种族（包括欧亚混血儿、日本人、泰国人、菲律宾人、缅甸人、犹太人、阿拉伯人等）。根据新加坡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2014 年华人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 74.3%，马来人占 13.3%，印度人占 9.1%，其他种族占 3.3%。华人是占新加坡人口最多的族群。

1965 年新加坡独立法案中的语言政策条款（Government Gazette Acts Supplement, No. 2, 1965, pp. 99-100）规定，马来语、华语、淡米尔语和英语为新加坡的四种官方语言。其中，马来语是国语（National Language），英语为国家行政语言。国家领导人在许多重要的庆典都会以四种官方语言发表演说。新加坡政府也自 1965 年独立建国后强调双语教育，各级学校以英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语，族群母语，即华语、马来语、淡米尔语，为一门必修科。这

一政策的目的是要新加坡人在以英语进行族群间的交际、接收外来资讯、与国际社会沟通的同时，还能通过母语了解并传承本族文化。

1.5.2 新加坡华人历史与华人社会结构

莱佛士登陆新加坡以前，即 1819 年之前（大约十四世纪中叶），新加坡已经有华人的足迹（崔贵强 1994），只是华人社会真正建构起来是在新加坡成为英国殖民地之后，即 1819 年以后。英国殖民地官员鼓励并开放欢迎移民迁入新加坡以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当时，迁入新加坡的华人移民主要有两大来源：来自马六甲的海峡华人（*Straits Chinese*）社群和来自中国南部地区的移民。两个移民群体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语言方面。马六甲的海峡华人主要使用一种混杂了闽南方言和马来语的峇峇马来语（*Baba Malay*），而来自中国南部地区的移民只会说各自的家乡方言，如：厦门话、潮汕话、福清话、广州话、海南话、客家话等，且各个方言群形成各自独立的帮派。

1.5.2.1 海峡华人

海峡华人（*Straits Chinese*），又称为土生华人（*Peranakan Chinese*），是在东南亚特殊历史背景下形成的一个群体。男性海峡华人俗称“峇峇”（*Baba*），女性称为“娘惹”（*Nyonya*），他们的祖辈是来自中国南部一带（主要是福建漳州、泉州）的商人。大约在十五世纪，檳城、马六甲和印尼一些地区已有闽籍华人聚居。这些华人几乎全是男性。他们到南洋经商，后来与当地的马来女子通婚，定居下来，产生具有华族和马来族混合血统的下一代。海峡华人长期居住在东南亚，在语言方面逐渐受到当地马来族的影响。在最早的峇峇家庭里，母亲是马来女子，孩子一般较倾向于学习母亲的语言，因此，马来语普遍上成为峇峇后代的母语，称为峇峇马来语（*Baba Malay*），在家庭里广泛使用。峇峇马来语和马来语不同。由于峇峇的祖先多是闽籍华人，因此，他们所说的峇峇马来语吸收了不少闽南语词汇，在语音和语法方面也受到闽南语的影响。学者一般将峇峇马来语视为闽南语和马来语接触而生成的马来语的一种变体。

1.5.2.2 来自中国南部地区的华人移民

新加坡在英殖民政府的管理和规划下成为一个自由贸易港口，吸引大批外来劳工前来讨生活，其中以来自中国南部地区的华人占多数。随着大量华族移民涌入，新加坡的华族人口也不断增加，到 1845 年就超过了总人口的百分之六十。（Thio 1960: 79）这些华人移民依据家乡地域或方言，各自建立社团或组织，形成所谓的“帮派”。根据曾玲（2003: 6），华人移民内部共有五大主要的帮群：（一）说闽南方言，以来自福建漳州、泉州为主的“福建帮”；（二）来自广东潮州，说潮州方言的“潮帮”；（三）来自广府、肇庆，说粤语的“广帮”；（四）福建闽西永定和广东嘉应五属、丰顺、大埔，说客家话的“客帮”；（五）琼州的“海南帮”。当时的华人社群呈现一种多元异质状态（曾玲 2003: 6），各方言群或帮派内部以所属的方言沟通，各方言群之间没有严格规定的共同语；说不同方言的人在一起做事及进行沟通时趋向于说福建话。

1.5.3 新加坡华人社会的语言使用情况

1.5.3.1 早期（英属时期 1819-1942）：多方言并用阶段

英属时期，由于殖民帝国使用的语言是英语，英语因此成为新加坡官方的行政语言，但在教育尚未普及且大多数华人属于中下层劳动阶级、缺乏学习英语的机会和环境的情况下，第一代新加坡华人主要以所属的祖籍方言进行沟通。此外，由于大部分华人移民来自中国南部省份，能说中国官话的人非常少。⁸就连当时由华人帮群组织开办的私塾和华文义学也以帮群的方言授课，且这些由方言帮派各自开办的学校大多只招收同籍贯的学生。

总的来说，早期的新加坡华人社群基本上呈现一种各方言平行使用的状态。为了与其他种族以及殖民政府官员沟通，华人逐渐掌握简单的马来语和英语，但多数华人说的是市井马来语（Bazaar Malay）和洋泾浜英语

⁸ 这里的中国官话指的是清代中叶以后作为中国官方标准语的北京官话，现称普通话。中国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才强力推广普通话，在那以前，中国各省份人民基本上都说各自的方言。

（Pidgin English）。来自不同方言群体的华人在一起做事时则趋向于使用福建话沟通。

一直到十九世纪末叶海峡华人领袖林文庆倡导华语运动以及二十世纪初期的新中国改革浪潮，新加坡华人才逐渐意识到相对于马来语和方言，华语更适合作为团结华族群体的主要共同语。⁹华文源流学校于是在新加坡涌现。另外，1919 年五四运动之后，有些学校开始废除方言，改由华语教学。值得注意的是，“早年从中国南来的老师们的华语都是南腔北调的”（庄永康 2014），而且，当时普通话还没有得到推广，老师们教授华语根据的是辛亥革命（1911 年）以后中国读音统一会制定的国音系统（俗称老国音），即“以京音为主，兼顾南北，保留入声”的一套语音系统。¹⁰

1.5.3.2 二战以后（1945-1963）：福建话流行阶段

五十年代，新加坡华人在日常生活中主要还是使用方言。根据 1957 年以母语为对象的全国人口普查报告，在新加坡华人人口中，以华语作为母语的只有百分之零点一（0.1%），而自称可以讲华语的人口，在华人人口中也只占百分之二十六点七（26.7%）。这些数据说明，在五十年代，华人还是习惯使用方言沟通，以华语作为生活用语的情况还不普遍。

根据 1957 年新加坡华族籍贯的人口比例统计（表 1.1），福建群体的人口远多于其他方言群体，占华族人口的 40.6%，潮州群体次之，占华族人口的 22.5%，再来是广东群体，占华族人口的 18.9%。

⁹ 林文庆是早年的海峡华人领袖。他所发动的华语运动落实于 1899 年。那一年，林文庆在自己的住家开办华语班，每星期天傍晚教导一群朋友和学生学习华语。1903 年，林文庆在中国领事馆的协助下又组织另一个华语夜班。一些方言学校在他的影响下，也把华语列为学校科目。此外，一些华语学校也纷纷成立。（资料来源：孙传炜（2000）《是巧合还是必然？比较百年间的两个讲华语运动》专访李元瑾教授）

¹⁰ 老国音是于 1913 年中国国语运动中由读音统一会议定的汉语标准音。老国音以北京音系为基础，增加了微母[v]（万）、疑母洪音[ŋ]（兀）和细音[n]（广），并区分尖团，还保留了入声（主要采用南京话的入声形式，带喉塞尾[-ʔ]）。

籍贯	人数	所占华族人口百分比
福建	1,096,596	40.6
潮州	442,707	22.5
广东	245,773	18.9
海南	78,081	7.2
客家	73,072	6.7
福州	16,828	1.5
兴化	8,757	0.8
其他籍贯	28,945	2.6

表 1.4: 新加坡华族籍贯的人口比例 (新加坡人口普查 1957 [Singapore Census of Population 1957])

表 1.4 的数据显示, 五十年代新加坡华人社群中使用人口最多的方言是福建话, 接着是潮州话和广东话。说海南话和客家话的人口则相对较少。

此外, 调查也显示, 大约 29%的华人能说马来语, 而有约 21%的华人能说英语。虽然当中多数华人所说的还是市井马来语和洋泾浜英语, 这种马来语和英语却是不同种族之间沟通交际的生活语言。由于福建人人口在华人人口中所占比例最大, 为与选民沟通, 福建话因此成为当时的“竞选语言”。1979 年以前, 在华人选区的演讲用的都是福建话。

1.5.3.3 独立后 (1965 至今): 双语政策及讲华语运动

新加坡独立之后, 政府积极提倡双语教育, 即全国人民必须掌握英语作为各族之间沟通交际的语言, 同时学习本族母语。对于华人而言, 政府规定学习的本族母语是华语, 不是汉语方言。

随着双语政策的推行, 七十年代, 送孩子上华校的新加坡华人已经很少, 百分之九十的华族学生报读英校。而且, 大部分学生只在修读华文一科时使用华文华语, 其他科目都以英文英语学习。至于那些在政府实行双语教育前以方言为母语的新加坡华人, 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还是以方言为主。一项调查显示, 巴士剪票员和搭客的沟通语, 方言占 88%; 小贩摊主和顾客的沟

通语，方言占 89%，其中又以福建话的使用率最高。¹¹这么一来，新加坡华人社群中的语言使用就出现这样的情况：小孩在学校接受英语教学，学习华语；以方言为母语的祖父母、父母在家里以方言与小孩沟通，以华语为家庭用语的华人还是少数。在这种情况下，小孩就必须掌握英语、华语和祖籍方言三种语言。而且，华语是在学校学习的单个科目，不是日常生活的主要语言，也就是说，华语在当时没有实际的使用环境。新加坡当时的总理李光耀就担心，持续讲方言的社会不仅导致新加坡华人之间没有共同语言，也会干扰双语教育，于是，他在 1979 年发起了讲华语运动。

讲华语运动的根本目的是要消除华人因各自不同的籍贯使用不同方言所造成的分歧，简化语言环境，让华人有一个共同的沟通语言。政府在行政上采取一些措施来推广华文华语，包括开办华族公务员上的华文课、逐步减少乃至终止电视台和电台播出的方言节目等。在推广华语的过程中，大众传播媒介，包括电视、电台和报章在整个运动中肩负着推广、宣传和评估的责任，并直接参与教导华语和提供一个利于学习华语的环境，特别是电视，它深入每个家庭，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Kuo 1984）事实上，直到今天，电视、广播仍是新加坡人接触语言的其中一项媒介，华文报章的阅读率则有下跌的趋势。这也是本研究以电视节目作为语料来源而不使用报章书面语的其中一个原因（有关语料选择说明详见本章第 1.4 节）。

在政府与华社的积极推动下，这项运动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在家使用方言的华族人口从 1980 年的 76.2%下降至 2000 年的 30.7%；在家使用华语的华族人口则从 1980 年的 25.9%上升至 2000 年的 45.1%。（新加坡人口普查 1980、2000）新加坡前新闻及艺术部部长兼贸工部第二部长杨荣文在《华人·华语·华文》（2000）的献词中指出，自 1980 年至 2000 年的二十年里，小一学生的家庭用语有了显著的改变。1980 年，64.4%学生的家庭用语是方言，25.9%是华语，9.3%是英语。1989 年，这个数字分别是 7.2%、69.1%和

¹¹ 资料来源：胡文雁（2000）《离成功还相当远——访欧进福博士》，《华人·华语·华文》，新加坡：新加坡推广华语理事会。

23.3%，方言的使用明显降低。1999 年，这三种语言的数字是 2.5%、54.1%和 42.4%。调查数据显示，讲华语运动推行二十年后，新加坡华人的语言使用情况有了转变，华语在一定程度上取代方言，成为华族的家庭用语。

现年（即 2015 年）47 岁的新加坡华人郑惠芳在《华人·华语·华文》（2000）的访谈中表示，“华语是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走进我的家庭，但广东话并没有完全消失，我们还是讲，但它的地位越来越低。到后来，我甚至觉得自己已经不太能够用广东话来表达一些深入的想法和意见。”讲华语运动提升了华语在新加坡华人社群中的地位，同时也导致华人祖籍方言失去主导地位，逐渐走向式微。今天，除了极少数家庭用语为方言者，新加坡年轻一代的华人多已不谙方言。¹²一名年约六十的长者告诉笔者，她会学讲华语是因为女儿到了小学四年级（10 岁）都还听不懂福建话，为了与孩子沟通，她才自学华语。可见，方言在年轻一代华人的语言中已基本消失，即使父母、祖父母在家里仍使用方言也抵挡不了华语上升之势。

值得注意的是，华语虽然取代方言成为新加坡华人社群的共同语，但从方言转用华语的是受中等教育或较少教育的那一群；那些受高深教育的大部分都讲英语，只有少部分讲华语。（《华人·华语·华文》（2000）访李光耀资政）李光耀也表示，在双语政策下，英语成了主要的教学语言，“人们希望子女能够说流利的英语，考到更高资格，找到更好的职业，在上一层的人都转讲英语了”。

新加坡独立至今，经历了双语教育和讲华语运动两大语言政策。郭振羽在《联合早报》（2013 年 10 月 6 日）的一篇报导中指出，新加坡的社会语言在一世代之间转型，由方言到华语到英语。在新加坡华语社群语言使用的变动中，华语一直处于波动的位置。要不是讲华语运动，华人可能到今天还普遍使用方言沟通，但双语教育中英语的优势又使得年轻一代华人不那么重视华语。我们可以将新加坡华人划分为四个世代：第一代从中国南部地区移

¹²“按照总理的宣示，新加坡年轻人当中，目前只有百分之五说方言。”（庄永康 2014）

民到新加坡、只会说本身祖籍方言的华人；第二代在新加坡出生、见证新加坡独立、日常生活中还使用方言、初试双语教育及讲华语运动的华人；第三代在新加坡出生、接受双语教育、与同龄人之间使用英语、华语交谈的华人；第四代在新加坡出生、基本上不谙方言、接受双语教育、与同龄人之间一般使用英语交谈的华人。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华语的群体是第二代和第三代华人，本文主要关注的也是这个群体的华人所说的华语。正是这两代人真正经历了从方言到华语的语言转变，同时又面临英语的强势。

综上所述，早期的新加坡华人主要使用各自的祖籍方言沟通，其中又以说福建话、潮州话和广东话的人口占多数。为了与其他种族交流，不少华人也掌握了简单的市井马来语和英语。华人之间交流则趋向于使用福建话，福建话甚至成为当时的“竞选语言”。新加坡建国以后，政府实行双语教育，大部分华人通过教育，学习并掌握英语和华语。1979 年讲华语运动推行以来，华语基本上取代了方言，成为新加坡华人社群的共同语。虽然新加坡华人社群中使用方言的人口逐年减少且年轻一代新加坡华人基本上不谙方言，但是学界普遍认同方言的某些特征还存留在新加坡华语中。换句话说，目前学界对新加坡华语及其特征所持的观点是：新加坡华语以现代汉语普通话为基础，但由于受到南方汉语方言的干扰以及长期处在多语接触的环境里，新加坡华语在语音、词汇和语法上发生变异而表现出一些不同于普通话的结构组合。

然而，根据文史资料记载，十九世纪中叶，华人移民到新加坡，当时新加坡没有强制教育，因此，学校也没有统一的教学媒介语，各源流学校并存，且华校和私塾以汉语方言教学。在这种情况下，除了殖民政府的语言——英语，华人社群内部根本没有一种标准语作为学习目标。此外，当时华人的文化水平不高，主要都是为生活打拼，基本上都不在意语言的学习，只要彼此间能进行沟通就好。这也造就了一个方言混杂的背景。因此，严格说来，新加坡华人最开始说华语的时候没有严格规定的标准语，而且华语最开

始也不是通过正规的语言教学（即教师讲解语言结构和语法规则）被习得，而是通过当时那些会说国语的老师和知识分子口耳相传，通过自然交际逐渐在华人社群中传开，这是华语成为华人共同语的雏形。也由于当时没有明确的华语语音标准，老师和知识分子大部分也都来自中国南方地区，本身带有浓重的方言口音，因此造成南腔北调的情况。

由于我们讨论的是一个成形的活语言，因此，站在共时层面上来看，学者们认为新加坡华语在现代标准汉语的基础上受方言干扰发生变异而不同于中国普通话及其他地区的华语，这也不是没有道理。但是，既然要谈语言的形成，就要清楚语言最开始是在什么样的情境背景下产生。所以，除了依赖语言本体材料，文史资料所提供的线索也很关键。在新加坡地区，华人最开始说华语的时候没有严格的标准语作为基础，也不是正规的二语习得，因此，目前学界所谓“新加坡华人在学习以现代汉语普通话为基础的华语时受到母语方言干扰而将方言的某些特征转移到华语”这个论述不甚准确。关于新加坡华人社群的共同语——新加坡华语这个语言系统的形成机制，我们会在第四章结合文史资料、语言本体材料、语言习得等各方面进行讨论。

1.6 几个术语的界定

（一）母语

在双语政策上，新加坡以个人所属的种族决定国人的母语。华人的母语是华语；马来人的母语是马来语；印度人的母语是淡米尔语。若父亲和母亲属于不同种族，可以父亲或母亲的种族作为选择自身母语的依据。若母语指一个人最早接触的语言或出生后说的第一种语言，华人的母语或为福建话、潮州话、广东话、客家话、福州话、海南话等南方汉语方言；马来人的母语或为爪哇语、波亚语等；印度人的母语或为马拉亚里语、旁遮普语、锡克语、孟加拉语等。

（二）双语

按照新加坡的语言政策，双语指的是英语和各种族本身的母语，即华语、马来语或淡米尔语。

（三）现代标准汉语

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作为语法规范。

（四）标准华语

以现代汉语普通话为标准，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作为语法规范。

（五）国语

国语是民国元年（1912 年）以后，中华民国所建立的语言体系。民国初年的国语以北京话为主，兼顾南北差异，这主要表现在语音方面，即以北京音系为主，但保留入声调（主要采用南京话的入声形式，带喉塞尾[-ʔ]）。

（六）南北汉语方言

根据李如龙（2001：1），方言俗称地方话，在中国传统中，历来指的是通行于一定地域的话。方言一般只有口语形式，可以口头言谈而往往难以书写成文。（李如龙 2001：1）

詹伯慧（1991）、李如龙（2001）指出，方言是独立而完整的结构体系。所谓方言特征，必须从整体的结构上去考察，必须是语音、词汇、语法各方面多种特点的有机结合，各种特点之间应该是有主有次、有表有里，且相互关联并相互制约的。

汉语方言学研究指出，研究方言特征必须区分不同的区域和层次，也就是说，不同的方言点、方言片、方言区都应该有各自的方言特征。不仅如此，不同的方言区、方言片之间也会有共同的方言特征。由于方言是民族语的地域变体，因此，考察方言特征首先必须弄清各种特征的地域分布，即从语言现象的地理分布状况（各地之间在共时平面上的异同关系）出发，把地

理上相连、结构上具有较高相似性的方言归为一类。（李如龙 2001：4；曹志耘 2004）地理分类的结果主要就是表现为“方言区”。（曹志耘 2004）

根据 Norman（1988）和罗杰瑞（1995），汉语方言的三个分区是北方话区、南方方言和中部方言。项梦冰、曹晖（2005）指出，从宏观的角度看，汉语方言最显著的差异是南北方言的对立，也就是官话和非官话方言的对立；所谓南方方言就是指非官话方言。然而，项梦冰、曹晖认为，南部方言内部存在若干重要的音韵差异，因此还要进行分组并作一级方言的下位划分。

按项梦冰、曹晖（2005）为南方方言，即非官话方言，所作的分组以及刘勋宁（1995）按古入声分化情况为北方方言，即官话方言，所作的划分，汉语方言的南北分野简述如下：

1.7 论文架构

第一章绪论。首先综述以往学者给华语和新加坡华语的定义，并且提出本文给新加坡华语的定义。接着我们给出新加坡华语的样本以引出研究问题：（一）新加坡华语的形成机制；（二）新加坡华语的特征描写。我们跟

着说明语料来源以及界定说话人的年龄，也描述了新加坡华人与新加坡华人社会的语言使用情况

第二章是文献评论。我们以语音、词汇、语法分类，总结学者对新加坡华语做过的研究，指出现有对新加坡华语的特征所作的描写有哪些问题，并且点出以方言干扰来解释新加坡华语的特征所要面对的问题。

第三章描述新加坡华语的特征。我们从语音、词法和句法三个方面讨论了新加坡华语有的一些结构，同时也以北京话作为参照，说明新加坡华语没有的结构。语音部分以声母、韵母、声调分类；词法部分着重讨论了轻声、儿化以及词汇语义；句法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以及由名词、动词、形容词组成的结构。

我们在第四章应用柯因内化理论探讨新加坡华语的形成机制。但是，由于不能单凭柯因内化一个理论就说清新加坡华语的形成机制，因此，我们进一步从语言内部机制和语言习得两方面进行考虑以完善对新加坡华语形成机制的讨论。

第五章总结并说明往后可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第二章 文献评论

以往学者们对新加坡华语所做的研究为我们认识新加坡华语以及对新加坡华语进行科学的研究奠定了基础。然而，现有对新加坡华语特征的描写还不够完善。本章以语音、词汇、语法分类，指出现有对新加坡华语的特征所作的描写有哪些问题，并且说明为什么我们认为方言干扰对于新加坡华语的特征以及新加坡华语的形成机制来说不是一个妥善的说法。

2.1 语音

2.1.1 擦音、塞擦音声母

Chen (1982b) 和 Chua (2003) 指出，新加坡华语社群常将舌尖后擦音和塞擦音 [ʈʂ] [ʈʂʰ] [ʂ] 发为舌尖音，例如：（Chua 2003: 56）

	北京音	新加坡华语
主张	[ʈʂu ²¹⁴ ʈʂaŋ ⁵⁵]	[tsu ²¹⁴ tsaŋ ⁵⁵]
长处	[ʈʂʰaŋ ³⁵ ʈʂʰu ⁵¹]	[tsʰaŋ ³⁵ tsʰu ⁵¹]
少数	[ʂau ²¹⁴ ʂu ⁵¹]	[sau ²¹⁴ su ⁵¹]

Chen (1982b) 和 Chua (2003) 也指出，在新加坡华语里，舌面擦音和塞擦音 [tʃ] [tʃʰ] [ʃ] 常被发成近似舌尖音，即 [ʃ] 读似 [s]、[tʃ] 读似 [ts]、[tʃʰ] 读似 [tsʰ]。例如：

	北京音	新加坡华语
机	[tʃei ⁵⁵]	[tsi ⁵⁵]
七	[tʃʰi ⁵⁵]	[tsʰi ⁵⁵]
西	[ʃi ⁵⁵]	[si ⁵⁵]

Chen 和 Chua 告诉我们新加坡华语有舌面擦音和塞擦音 [tʃ] [tʃʰ] [ʃ] 发成舌尖音这一语音现象，但这一语音现象不仅新加坡华语有，北京话的女国音也是舌面擦音和塞擦音 [tʃ] [tʃʰ] [ʃ] 的发音部位前移，发成一种近似于 [ts] [tsʰ] [s] 的音。新加坡华人将舌面擦音和塞擦音发成舌尖音的现象是否就是女国音？若不是女国音，新加坡华语这种舌面擦音和塞擦音变成舌尖音的语音现象跟女国音有什么不同？这都是在描写时必须说明的问题，要不然，会让人误以为新加坡华语舌面擦音、塞擦音变舌尖音的现象就是女国音。

基于闽语、粤语和客家话都分别只有一套擦音和塞擦音声母，即闽语和客家话只有舌尖音 [ts-] [ts'-] [s-]，粤语只有舌叶音 [tʃ-] [tʃ'-] [ʃ]，Chen (1982b) 和 Chua (2003) 认为，由于闽语、粤语、客家话等南方汉语方言都没有舌尖后擦音和塞擦音，因此，母语为南方汉语方言的新加坡华人在说华语时无法掌握这些发音。Chua (2003) 也指出，由于闽语和客家话只有舌尖擦音和塞擦音而没有舌面音，因此，母语为南方汉语方言的新加坡华人在说华语时将舌面擦音和塞擦音等同于舌尖的擦音和塞擦音。

Chen 和 Chua 的观点类似于陈保亚 (1996) 在研究傣语和汉语的接触时所提出的母语干扰目标语言的匹配原则。陈保亚 (1996) 指出，匹配是通过一种对应关系，用母语的音来发目标语言的音，它是母语干扰目标语言的第一阶段，而匹配的结果是产生和目标语言有同源关系的民族方言。陈保亚 (1996) 的研究结果显示，目标语言的每一个音都必须在母语中受到匹配，这样目标语言有而母语没有的音就必须要在相似匹配中以一对多的方式被归并；另一方面，母语中有而目标语言没有的音，总是在匹配中落空，形成零匹配，并不进入民族方言或第二语言。

按陈保亚 (1996) 所提出的匹配原则，华语有 [ts ts' s] [tʃ tʃ' ʃ] [tɕ tɕ' ɕ] 三套擦音、塞擦音声母而闽语、客家话只有 [ts ts' s] 一套擦音、塞擦音声母，粤语也只有 [tʃ tʃ' ʃ]，新加坡华人说华语的时候就用近似的舌尖音去匹配这些声母。问题是，新加坡华人的母语，即福建话、潮州话、广东话、客家话等南方汉语方言中有入声，若华语是目标语言，华语中没有入声，入声在匹配中理应落空，形成零匹配，为什么新加坡华语却以第五声的形式保留了南方汉语方言的入声？这说明，新加坡华语的语音好像也不纯粹是通过母语的音与目标语言的音进行匹配这种对应关系构成的。

2.1.2 第五声

陈重瑜 (1981)、Chen (1982a) 和卢绍昌 (1981) 指出，新加坡华语除了阴平、阳平、上声、去声，还有第五个声调。陈重瑜 (1981) 及 Chen

（1982a）指这第五个声调有以下性质：（1）是一个短促的下降调，调值通常是 [41]，有时是 [42]；（2）它的持续时间短，因之听来有“中断”的感觉；（3）带这个声调的音节都有一个喉塞音（glottal stop, [ʔ]）韵尾，此韵尾有时很清楚，有时较模糊；（4）这个塞音韵尾不但截短了声调的持续时间，也使得音节的辅音韵头变为强音（fortis），因而近似浊辅音。陈重瑜将这第五个声调称为“第五声”。新加坡华语第五声的例子如：

	北京音	新加坡华语
吃	[tʂʰɿ ⁵⁵]	[tsʰɿʔ]/[ts ^{41/42}] ¹³
罚	[fa ³⁵]	[faʔ]/[fa ^{41/42}]
骨	[ku ²¹⁴]	[kuʔ]/[ku ^{41/42}]

陈重瑜（1981）和 Chen（1982a）认为第五声是中古入声以南方汉语方言为媒介影响新加坡华语的声调且第五声是中古入声语素或南方汉语方言入声语素的投射，但也指出，不是所有的入声语素在新加坡华语里都读第五声。既然不是所有的中古及方言入声语素都读第五声，这就说明第五声现象不单纯是中古入声透过方言干扰华语的声调。况且，从语言使用者的角度来说，若不是通晓汉语音韵，根本不会懂得中古入声是什么，更不知道某个语素是不是入声，又怎么根据中古入声来决定哪些语素读第五声、哪些不读第五声？

由于第五声的显著性，学者一般都承认第五声为新加坡华语一个重要的语音现象。对于第五声的生成动因和机制，学界普遍接受陈重瑜的说法，即中古入声语素因在南方汉语方言中得到保留而藉着南方汉语方言干扰华语的声调。问题是：闽语、粤语、客家话等南方汉语方言的入声主要由三个塞音韵尾 [-p] [-t] [-k] 组成，方言入声干扰华语的音节结构却只构成一个喉塞音

¹³ 新加坡华语社群普遍将舌尖后塞擦音声母[tʂ]发成舌尖音[ts]。

韵尾 [-ʔ]，并没有让 [-p] [-t] [-k] 都进入华语的音节结构。这就提示我们重新考虑方言干扰的绝对性与合理性。

另一方面，塞音韵尾 [-p] [-t] [-k] 和鼻音韵尾 [-m] [-n] [-ŋ] 的保留及分合是汉语方言分区的一项标准。这六个韵尾在各个现代汉语方言中的保留及分合情况不一致，概括而言，南方方言保留得较完整，北方方言保留得较少，官话方言大多取合并和脱落的方式，即鼻音韵尾合并为 [-n] 和 [-ŋ]（有些官话合并为一个），塞音韵尾基本脱落，只有个别官话将 [-p] [-t] [-k] 合并为喉塞尾 [-ʔ]。从韵尾的结构类型来看，北方官话呈现阴、阳二分的格局，而典型的南方汉语则呈现阴、阳、入三分格局。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新加坡华语的音节结构为什么只受到南方汉语方言入声形式的干扰，却抑制了阳声韵尾 [-m]？换句话说，入声为什么比 [-m] 尾更容易干扰华语的音节结构？若说南方汉语方言的干扰对新加坡华语语音特征的形成有显著作用，那么，来自这些方言的干扰应该是一致的。也就是说，阳声韵尾 [-m] 应该会随着入声一并干扰华语的音节结构。然而，新加坡华语以带喉塞音韵尾的第五声形式保留了入声，却排斥阳声韵尾 [-m]。这又提示我们，即使方言干扰的说法成立，也不是方言的所有结构特征都能有效干扰华语的结构系统，当中存在一些限制。

综上所述，陈重瑜（1981）和 Chen（1982a, b）的调查显示，新加坡华人的发音因各自不同的方言背景而异。这间接说明新加坡华人开始说华语的时候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语，而且所接受的也不是统一教育。¹⁴在早期（1930 年代之前）由各方言组织兴办的学校多以方言为教学媒介，因此，教师的籍贯与方言组织的地缘性通常有较大的一致性。（刘宏 2003：17）譬如：根据《新加坡福建会馆属下道南学校创校六十周年纪念特刊》和《新加坡端蒙中学五十周年纪念特刊》的统计整理，从战前到战后，福建会馆所属

¹⁴ 战前，各方言帮派各自开办学校，却大多只招收同籍贯学生，以自己的方言授学。战后，陈嘉庚希望团结所有华校。陈嘉庚认为，教育的统一是华人团结的象征，他所领导的福建会馆属下的华校也开始开放给所有华人。（以上资料来源：刘宏 2003：13-14）

的道南学校的教师基本上以福建籍为多数；潮州会馆属下的端蒙学校教师也大都为潮州人。也就是说，即使战后陈嘉庚鼓吹统一教育，华人也意识到各方言群体间必须发展出共同语（即华语）以互相沟通，华人在学校所接触的仍是来自福建、潮州等中国南方地区的老师的口音。

2.2 词汇

过去学者分别从词汇特征、特有词语、词汇形式及语义等各个方面对新加坡华语的词汇进行了研究。我们将以往文献中有关新加坡华语词汇的研究分归为三类进行概述：（一）新加坡华语词汇特征研究；（二）新加坡华语特有词语研究；（三）新加坡华语词汇与中国普通话词汇对比研究。

2.2.1 新加坡华语词汇特征研究

陈重瑜（1983）和 Chua（2003）从词语的具体形式描述新加坡华语的词汇特征，并且分别指出该特征源自哪些南方汉语方言，兹列举如下：

（I）失去“子”后缀之词条。例如：（陈重瑜 1983：33）

1. 你的裙太长了。
2. 我买了一只鸭。
3. 我做了一条裤。
4. 这是他的袜。
5. 拿条绳给我。
6. 没有位了。

陈重瑜（1983：33）指出，例（1）-（6）的“裙”、“鸭”、“裤”、“袜”、“绳”、“位”在新加坡华语口语中不带“子”后缀，这些词条在闽南、客家、粤、海南诸方言中也皆无后缀，惟厦门话的“索仔”（绳子）是例外。

（II）失去一音节之词条。例如：（陈重瑜 1983：33-34）

7. 你叫什么名？
8. 这是什么色？
9. 他没有力的。

10. 我不要吃这份工。
11. 你这件衣在哪里买的？
12. 送我一张相好吗？
13. 他一说我就明了。

陈重瑜（1983：34）指出，例（7）-（12）的“名”（名字）、“色”（颜色）、“力”（力气）、“工”（工作）、“衣”（衣服）、“相”（相片）在闽南、客家、粤、海南诸方言中是单音节词，例（13）的“明”表示“明白”则来自粤语。

（III）量词“粒”的泛用。例如：（陈重瑜 1983：34）

14. 一粒糖
15. 一粒鱼丸 / 鸡蛋 / 苹果 / 西瓜 / 篮球
16. 他投进了好几粒球。
17. 你可别小看这个木球，它重 80 公斤，价值 500 元一粒。

陈重瑜（1983：34）指出，以“粒”作为体积较大物之量词乃闽南方言之用法，换句话说，新加坡华语中量词“粒”的用法源自闽南方言。

（IV）时间词与时间单位词的特殊用法。例如：

（陈重瑜 1983：34-35）

18. 今天拜几？
19. 拜六不用上学。
20. 我礼拜来找你。
21. 我七点九个字来。
22. 八点半上课，现在已经四个字了，还不快点！
23. 我等了你半点钟了。

陈重瑜（1983：35）指出，以“拜”表示“礼拜”或“星期”是新加坡华语口语通行的说法，如：例（18）-（20）。陈重瑜认为，新加坡华语以“拜”表示“礼拜”或“星期”的说法来自闽南语，并指出这种说法在新加坡粤语中也通行。

另外，新加坡华人也常用“一个字”表示五分钟。如：例（21）和（22），“九个字”表示四十五分，“四个字”表示二十分。陈重瑜认为，新加坡华语口语里“一个字”表示五分钟的这种用法来自粤语。此外，在新加坡华语口语中，“半点钟”指“半小时”，如：例（23）。陈重瑜认为这种用法来自闽南语。

（V）称谓的特殊用法。例如：（陈重瑜 1983：36）

24. 陈生，刚才林生找你。

25. 是王太告诉我的。

陈重瑜（1983：36）认为，如例（24）和（25），新加坡华语口语中姓氏后“生”与“太”的简略称谓来自粤语。

（VI）语义有所改变之词条。例如：（陈重瑜 1983：37）

26. 你出力打啦！

27. 我有事，跑先了。

例（26）中的“出力”，在普通话里是“用力”。陈重瑜（1983：37）指“出力”用的是闽南语的形式。另外，陈重瑜指例（27）的“跑先”相当于粤语和闽南语的“走先”，意思是“先行离开”。

（VII）口语中之书面词汇。例如：（陈重瑜 1983：38）

28. 这把刀很利。

29. 你的眼睛好利。

30. 我载你去好了。

31. 你来载我好不好？

32. 我有紧要的事要办。

33. 他很大力的。

34. 这条路很阔。

对于以上例子，陈重瑜（1983：38）分别指出个别例子来自哪种南方汉语方言的用法：例（28）和（29），“利”表示“刀子快”和“眼尖”的用法来自粤语；例（30）和（31），“载”表示“（开车）送”和“（开车）接”的用法来自

闽语；例（32）用“紧要”表示“要紧”来自粤语和客家话；例（33）用“大力”表示“力气很大”来自粤语和闽语；例（34）用“阔”表示“宽阔”来自粤语、客家话及厦门话。

除了以上七项特征，陈重瑜（1983：40）还列举了新加坡华语中的特殊词汇并分别指出特殊词汇源自哪种南方汉语方言。例如：“脚车”来自客家话“脚车”和潮州话“骹车”；“锁匙”来自厦门话、潮州话、客家话及粤语；“底裙”、“底裤”来自粤语；“冲凉”来自粤语等。¹⁵

继陈重瑜之后，卢绍昌（1990）和汪惠迪（1990）也描述了新加坡华语词汇的特征。卢绍昌（1990）以《联合早报用词用字调查报告》（1989）中的两万个词条为材料，将词汇分为基本词汇和地方性词汇。所谓基本词汇指的是跟其他地区相同的词汇，卢绍昌指新加坡华语有 95%以上是基本词汇。所谓地方性词汇指的是长期以来在本地区产生、发展并普遍使用而别的地方不用或偶尔使用的词汇。卢绍昌指新加坡华语地方性词汇有以下特征：

（一）方言色彩浓；（二）有不少来自英语和马来语的借词；（三）意译词少；（四）书面词汇多；（五）自创新词。

汪惠迪（1990）指新加坡华语词汇的最大特点是开放性，主要表现于四点：（一）融合英语和马来语的词语，例如：巴仙（来自英语“percent”）、巴刹（来自马来语“pasar”）；（二）吸收来自其他社区的同族词语，例如：空头（来自闽语，表示“机会”）；（三）兼容本地和外地异名同实的词语，例如：音译“chocolate”兼用“朱古力”（新加坡、香港）和“巧克力”（台湾、中国）；（四）渗入外文字母和缩略语，例如：L 牌，取“Learner”的首字母“L”，指初学驾驶者所持的执照。此外，汪惠迪指新加坡华语词汇具有创造性；新加坡华语除了有一批反映本地特殊社会环境的词语，也从英语引进新词语。

¹⁵ 这些词在普通话里分别为“脚踏车”/“自行车”、“钥匙”、“衬裙”、“内裤”、“洗澡”。

2.2.2 新加坡华语特有词语研究

汪惠迪（2002）给新加坡华语特有词语做了狭义和广义两方面的界定。狭义的新加坡华语特有词语指的是反映新加坡社会特有的事物或现象的词语。例如：“组屋”、“华文 B 课程”等，这些词语只通行于新加坡，是新加坡单区独用的词语。广义的新加坡华语特有词语除了单区独用的词语，还包括与中国普通话异名同实的词语，例如：“普通话”（中国、港澳）、“国语”（台湾、港澳）、“华语”（新马），以及中国普通话不用，但新马两地共用或者新马和港台四地共用或者新马和港澳四地共用或者新马和港澳台五地共用的词语，例如：“垃圾虫（litterbug）”（新马港澳台五地共用）、“得直”（新马港三地共用）、“巴刹”（新马两地共用）。简言之，狭义的新加坡华语特有词语是拿新加坡华语跟新加坡以外所有地区的华语比较，指的是仅限于新加坡一地使用的词语或用法；广义的新加坡华语特有词语是仅仅拿新加坡华语跟中国普通话比较，仅仅跟中国普通话不同的词语。（徐杰、王惠 2004）

接着，我们看学者如何对新加坡华语特有词语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和论述。

周清海、周长楫（1998）指新加坡华语带有闽南话的某些特点。根据周清海、周长楫（1998），新加坡华语词语主要在四种情况下表现闽南话的影响：（一）用新加坡闽南话的词语代替华语来表达同一概念或事物。例如：“面盆”（普通话：脸盆）、“龙沟”（普通话：水沟）、“寒衣”（普通话：毛衣）；（二）以闽南话惯用的单音节形式来代替华语原有的双音节形式。例如：“鸭”（普通话：鸭子）、“位”（普通话：位子）、“色”（普通话：颜色）；（三）用闽南话的词序取代华语原有的词序。例如：“人客”（普通话：客人）；（四）扩大华语的词义范围。例如：“肥”，普通话“肥”不指人，对人一般说“胖”，“肥”含贬义，新加坡华语却常用“肥”指人，如：“你最近肥很多”。

汪惠迪（2002）分析了新加坡华语特有词汇产生的社会条件，主要有八个方面：（一）新加坡的社会形态独特；（二）英语、马来语渗透；（三）中国制度转型；（四）圈内互动活跃；（五）政治因素；（六）音义任意结合；（七）方言词语融入；（八）双语教育影响。余尚兵（2002）则指新加坡华族与其他种族的交流促成新加坡华语的特有词汇。徐杰、王惠（2004）也列出了新加坡华语特有词汇产生的六个社会历史条件：（一）独创自组用以反映新加坡特有社会现象或事物的词语；（二）吸收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马来语词汇，其中多为音译，也有音意兼译；（三）受英语影响；（四）港澳台马四地词语的借入；（五）借入方言词语；（六）保留近代汉语甚至古代汉语的词。

2.2.3 新加坡华语词汇与中国普通话词汇对比研究

周烈婷（1998；1999）对“手段、面善、紧张、帮忙、美、烧、作用、本事、还[xuan³⁵]、分别、幼、经验、了解 / 理解”几个词在新加坡华语和普通话的常用义项选择、语义蕴含和语法功能进行了比较。周烈婷列举这些词在新加坡华语里的语义范围和用法，并且指出新加坡华语在多元语言社会中不但受方言影响，也受英语影响，使之在语音、词汇、语法上表现出与中国普通话不同的特征。

周清海、萧国政（1999）将新加坡华语词汇和普通话词汇的差异归纳为以下三方面：（一）词的意义相同，词形选择不同。例如：搭客大厦（新加坡） / 候机楼（普通话）；（二）词形相同，义项选用不同。例如：“呱呱叫”在普通话里形容极好，新加坡华语则表示“意见很大”（例句：他们呱呱叫，说菜炒得很难吃。）或“大吵大闹或声音过大，影响他人”（例句：他们呱呱叫，吵到我没办法做事。）；（三）词形词义相同，色彩和用法不同。例如：“肥”在普通话指含脂肪多，作形容词一般只选择和指动物的名词搭配（如：肥猪、肥肉），但在新加坡华语里“肥”可以和指人的名词搭配（如：她一直嫌自己太肥。）。。

汪惠迪（1999）《新加坡特有词语词典》收集整理了 1560 条（含副条）新加坡华语特有词语。汪惠迪将这些词语与中国普通话进行比较并注释说明。根据汪惠迪的归纳，新加坡华语特有词语主要有以下八类：（一）新加坡华语特有词汇，例如：“组屋”、“拥车证”等；（二）跟中国普通话异名同实的词语，例如：“德士”、“爱之病”等；（三）与中国普通话形同实异，在新加坡另有含义的词语，例如：“公司”、“大衣”等；（四）在新加坡、香港或台湾地区早已通用，但是尚未进入中国普通话的词语。例如：“峰会”、“垃圾虫”等；（五）在新加坡、香港或台湾地区早已使用，近年来已进入中国普通话的词语。例如：“飙升”、“低迷”等；（六）在新加坡一直使用，但中国普通话已列入旧称、旧指的词语。例如：“邮差”、“报聘”等；（七）闽粤方言词语，例如：“显”、“大耳窿”等；（八）个别国名、地名、人名或旅游景点、建筑物、政府部门、法定机构、政党、社团名称。周清海（2006）也做了以上类似的论述。周氏认为，新加坡华语之所以有许多方言词，是因为在新加坡，华语是在没有普通话作为基础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在和普通话缺乏交流的情况下，词汇差异自然显著。

李临定、周清海（2002）从《联合早报》、《联合晚报》、当代新加坡作家的作品和新加坡华人的口语收集了 300 多个词语并将这些词语与中国普通话的词语进行以下七个方面的比较：（一）词汇义位义变异理解。譬如：在普通话里，“耐”的意思是“受得住、禁得起”，使用范围比较窄，一般用在单音节动词前面，如：“耐用”；在新加坡华语里，“耐”是一个比较常用的词，有引申义，还可以转化为动词。此外，新加坡华语“耐”的词汇意义也扩大了，有“耐用、忍耐”的意思，例如：“那个东西很耐。”、“耐到晚上六点多才煮饭给孩子吃。”。（二）词汇色彩义变异理解，其中包括褒贬义色彩、指大指小色彩、书面与口语色彩、社会文化色彩等。例如：“而已”，《现代汉语词典》的注释是：助词，罢了。“而已”是古汉语词，现代汉语书面语有时也用，但是口语一般不用，而新加坡华语口语却常用。（三）同义词汇变异

理解。譬如：动词“开”和“驾”同义；“开”在《现代汉语词典》的注释是：发动或操纵（枪、炮、车、船、飞机、机器等），例如：“开汽车”、“开拖拉机”。在普通话里，和“汽车”等搭配时一般用“开”，新加坡华语则一般用“驾”。

（四）短语变异理解。例如：新加坡华人习惯用“半条命”形容受到折磨、摧残极深，普通话不说“半条命”，与半条命意思相近的短语是“半死”，例：“打个半死”。（五）词汇变异理解和语法（甲），其中包括词汇变异和句法动词及补语位置相关问题、和词汇相关的词序变异理解问题、词汇词性变异理解问题、虚词汇和半虚词汇变异理解问题等。譬如：新加坡华语口语常出现[动词+到完]的用例，例如：“把窗子关到完，用冷气，就没有蚊子了。”。

“完”在《现代汉语词典》的注释是：完结，例：“事情做完了。”。“到完”出现在补语的位置是新加坡华语常见的现象，表示“行动到末尾或把事情全做了”，普通话不这么说，前边新加坡华语这个例子在普通话里说成“把窗子全关了”。（六）词汇变异理解和语法（乙），其中包括单音节词汇和双音节词汇使用变异理解问题、复合词汇构词变异理解问题。譬如：新加坡华人习惯用单音节动词表示“回家”、“回来”、“回去”，例如：“今晚回早吗？”。

（七）词汇变异理解和逻辑选择搭配。例如：“对于学习能力较差的学生，硬邦邦的教学方式是无效的。”（《联合早报》2001.1.9）“硬邦邦”在《现代汉语词典》的注释是：形容坚硬结实，一般选择和指具体物品的名词相搭配，如：“硬邦邦的冰块打也打不碎”。前边取自《联合早报》的新加坡华语的例子在普通话里用“生硬”表示，即“生硬的教学方式”。

徐杰、王惠（2004）指出，表面上，有些词语在新加坡华语和中国普通话里都有，但实际上这些词语在意义和用法上并不相同。意义不同，例如：新加坡华语的“市长”相等于中国普通话的“区长”；用法不同，例如：新加坡华语口语和书面语兼用“而已”，但在中国普通话里，“而已”只用于书面正式语体，口语说“罢了”。

贾益民、许迎春（2005）从新加坡《联合早报》收集了 116 个以往学者未讨论过的与普通话表达相同或相近的概念但形式不同的新加坡华语特有词语。贾益民、许迎春结合过去学者讨论的例子，从结构和来源两方面讨论新加坡华语特有词语与普通话词语的差异。

陈琪（2008）以《联合早报》、《联合早报网》以及新加坡中小学华文课本作为语料来源，进一步考察前人所研究的新加坡华语词语，同时也探讨前人尚未讨论的、与中国普通话存在差异的新加坡华语词语，旨在系统地展现新加坡华语词语与中国普通话词语所存在的差异和形成差异的主要原因。研究发现，新加坡特有词语、新中同形异义词语、新中异形同义词语以名词性词语居多，因为语言迁移和语码转化以及新中两地四十年语言接触间断，新加坡的强势语言——英语、曾经是新加坡华族家庭主要用语的汉语方言、旧词语的保留等因素造就了大量集开放性、兼容性及地方性于一体的新加坡华语词汇。

黄雪霞（2011）《新加坡华语词汇五十年发展变化研究》则在前人所建立的基础下，广泛收集新加坡近 50 年的华语书面语语料以建立新加坡华语书面语语料库，运用语料库语言学（Corpus Linguistics）的基本方法，通过定量统计分析法，深入追溯新加坡华语词汇的发展变化，并从词汇来源分析词汇发展与社会文化的关系，借以了解新加坡的社会发展状况。

综上所述，以往的研究主要提出以下四个方面的论述：（一）由于多元文化多元语言的影响，新加坡华语词语呈现开放性、差异性和创造性等特点；（二）新加坡社会与国情的独特性促成新加坡华语特有词语；（三）新加坡华语词汇与中国普通话词汇在词义、词形和语用上存在不同程度的选择和差异；（四）新加坡华语词汇与中国普通话词汇形成差异的原因可以概括为下列几点：（i）多重语言的影响，包括方言、英语、马来语的影响；（ii）多元社会与文化的影响，包括新加坡特有的多元民族社会与文化结构；

(iii) 历史与地域的影响, 包括语言政策和语言接触的发展变化、自然地理条件等。

2.2.4 词汇研究的方法问题

梳理了以往有关新加坡华语词汇的文献, 我们认为现有的这些研究有下列问题和不足:

首先是如何看待新加坡华语的问题。学者普遍上认为新加坡华语的词汇系统有一个普通话的基础, 新加坡华语的词汇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变异。事实上, 新加坡华语最开始成为新加坡华人的共同语并没有普通话口语作为基础, “在新中建交以前, 新加坡人所接触的书面语也不是中国现代汉语书面语, 而是五四前后期的汉语书面语”(周清海 2002: 11)。因此, 新加坡华语的词汇系统很可能是各南方汉语方言词汇、英语词汇、马来语词汇、淡米尔语词汇与当时华人所接触的白话文混合(mixing)与拉平(leveling)而形成的。¹⁶

再来是描写的问题。陈重瑜(1983)指“裙、鸭、裤、袜、绳、位”等词条在新加坡华语里失去“子”后缀; Chua(2003)在词汇的部分也指出, 新加坡华语省略“子”后缀及“儿”后缀。另外, Chua(2003)在描写语音特征的部分指新加坡华语没有轻声和儿化。至于为什么没有轻声、儿化以及为什么省略“子”后缀和“儿”后缀, Chua 认为, 那是因为闽语、粤语、客家话等南方汉语方言没有这些表现。陈重瑜和 Chua 都是从外部干扰, 即语言接触的角度, 来分别解释新加坡华语在语音方面没有轻声、儿化以及在词汇方面省略“子”、“儿”后缀的原因。

就如我们在 1.3 节研究问题中指出现有研究对于新加坡华语的特征描写不甚完善时所提到的, 轻声和儿化不单是语音问题, 也是构词问题。若结合语音和构词来看, 新加坡华语有没有轻声、儿化与“子”、“儿”后缀是不是被省略是相互有所关联的两个问题。

¹⁶ 我们这里所说的白话文指狭义的白话文, 即官话白话文(亦作语体文)而言。官话白话文以民国时期的官话, 即北京官话, 为基础。

最后是研究方法上的不足。以往的研究均以中国普通话作为参照系，指出新加坡华语词语与中国普通话词语在词义、词形及语用上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选择和差异。就词汇标准来看，普通话以北方话为基础，即以广大北方话地区普遍通行的说法为准。拿普通话的词汇与新加坡华语的词汇进行比较，结果就是表现两个语言系统在词汇方面的差异。事实上，一个语言的词语所表达的概念与范畴体现语言使用者的认知与思维模式。譬如：新加坡华语的动词“还[huan³⁵]”涵盖了普通话“付”、“缴”、“还[xuan³⁵]”三个动词的语义范畴，即在新加坡华语里，动词“还[huan³⁵]”除了表示“归还”，还表示“付（款）”和“缴（费）”。本文从语义范畴出发，讨论新加坡华语的词汇，探讨语言使用者如何对词语所表达的概念和范畴进行整合，甚至缩简合并语义范畴相近的形式。我们不仅仅停留在语言接触或方言干扰的层面去讨论新加坡华语的词汇，而是结合语言的概念范畴，从认知的层面去考虑新加坡华人的思维模式（即如何对概念进行整合），在词汇语义方面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2.3 语法

以往谈新加坡华语的语法，一般都是以中国现代汉语普通话为参照进行比较，罗列新加坡华语的语法特征，并且指出个别特征源于哪些南方汉语方言的干扰。譬如：作副词用之“多”、“少”出现于动词之后是受粤语和客家话干扰的结果，例如：吃少一点、买多一本；“有”用在动词性词语前面作状语，例如：“你有去过吗？/ 我有去过。”，来源于闽、粤方言。（陈重瑜 1983）吴英成（1985）《新加坡华语语法研究》以在台湾的新加坡侨生联谊会的一百三十一位新加坡留学生为调查对象，通过问卷的方式，对新加坡华语特有句法的普遍程度进行了定量研究。吴英成所做的调查可说为陈重瑜（1983）进行了补充，其价值在于对新加坡华语的句式进行了定量分析，从而证明这些句式为新加坡华语社群所接受，并非偶发的语言现象。然而，吴英成也只是就所观察到的现象指出南方汉语方言对华语的句法结构有所干扰，没有更细致的说明。

其他跟语法相关的研究还有陆俭明、张楚浩、钱萍（2002）《新加坡华语语法的特点》、Chua（2003）“The Emergence of Singapore Mandarin: A Case Study of Language Contact”、潘家福（2008）《新加坡华社的多语现象与语言接触研究》、祝晓宏（2008）《新加坡华语语法变异研究》、刘慧博（2010）《新加坡华语与普通话的分歧研究》等。其中，Chua（2003）和潘家福（2008）应用接触语言学的理论探讨新加坡的华语和南方汉语方言接触的情况。Chua（2003）主要关注新加坡的语言政策和多语环境如何促发华语发生变异。Chua 指出，在新加坡，华语由于参杂了南方汉语方言元素而逐渐形成本身的特色，成为拥有显著区域性特征的语言——新加坡华语。潘家福（2008）则着重研究新加坡华社的多语现象与语言接触的课题。该文探讨新加坡华人社会自开埠以来多语现象形成与演变的过程，通过问卷调查和实况录音所得的原始材料，重点分析新加坡华人应用语言的情况及其语言态度。该文也比较了新加坡华语语法和新加坡英语语法，探讨这两种语言在特殊的语境下相互接触之后如何形成独具特色的区域变体。祝晓宏（2008）则从语体的角度出发，以书面文献、大型语料库和问卷调查为材料，系统地比较新加坡华语和普通话语法的使用差异。刘慧博（2010）从新加坡《联合早报》2009 年刊发的文章中提取与普通话分歧的语料，以此建立一定量的语料库，再通过分析，概括新加坡华语在语法和词汇方面的若干特征性项目，并逐项与普通话进行比较，以显示新加坡华语和普通话在词汇和语法方面的分歧所在，然后探索分歧的成因。刘氏认为，英语和汉语方言的影响以及汉语历史词语的遗留是造成新加坡华语和普通话分歧的主要原因。

不论是描述新加坡华语语法的特点，还是从语言接触和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探讨新加坡华语语法与普通话的分歧，学者们都秉持方言干扰主导华语发生变异这一思路。这其实说的是接触语言学所谓转用引发的干扰（*shift-induced interference*），即语言使用者在语言转用过程中将其母语特征带入其目标语（*target language*）之中。这种干扰源于转用目标语的语言社群对目标

语的不完善学习 (imperfect learning) (Thomason & Kaufman 1988; Thomason 2001, 2003; 吴福祥 2007)。在新加坡的情况就是, 原本以南方汉语方言为母语的华人在转用华语时, 由于不完善学习, 将方言的某些特征带入华语, 而这些特征为华语最初使用者所模仿并进而得以在社群中扩散。

然而, 新加坡华人所使用的南方汉语方言不只一种, 因此, 目前这类哪个现象源于哪个方言的说法似乎给人的印象是方言对华语的干扰是随机且不受限制的。譬如陈重瑜 (1983) 指新加坡华语中有指物宾语 (直接宾语) 在前, 指人宾语 (间接宾语) 在后的倒置双宾式, 例如: (陈重瑜 1993: 336-337)

35. 给一点钱我

36. 他给三本书我。

关于这种句式, 陈重瑜表示: “标准华语中之词序为指人宾语在前, 指物宾语在后。粤语 (及吴语) 中则两可。新加坡华语受粤语影响亦为两种词序并存。”回到语言演变的两个基本问题, 即语言变异的动因 (actuation) 和机制 (implementation), 若我们接受变异的动因是语言接触导致的方言干扰, 紧跟着的问题就是牵涉其中的南方汉语方言不只一个, 新加坡华语为什么是受粤语的干扰而有两种双宾语语序?¹⁷按人口比例来说, 闽语人口在新加坡华人人口中所占的比率最高, 按理说, 应该是人口多的方言起干扰作用。

根据张敏 (2010), 闽语 (尤其是分布于其核心区域, 即福建沿海、台湾以及广东潮汕地区的闽语) 作为一种最典型的南方话, 其双宾式不用 [动词+直接宾语+间接宾语] (倒置双宾), 而用的是跟北方话一样的 [动词+间接宾语+直接宾语]。例如:

37. 我乞汝钱。(我给你钱。)

¹⁷ Weinreich, Labov & Herzog (1968) 及 Chen & Wang (1975) 谈语言演变提出两个基本问题: (一) 起变 (actuation) 问题: 什么因素可用来解释演变的起动? 为什么某种结构特征在某个语言的某个时间变了, 而同样的特征在另一种语言或同一语言的另一个时间则不变? (二) 机制 (implementation) 的问题: 演变如何进行, 即演变的过程为何?

根据 Aikhenvald (2007) 所提出的促动语言干扰的语言因素, 语言之间预先存在的结构相似性有利于形式与结构的转移。换言之, 彼此接触的语言之间若存在相似的形式与结构, 两者会相互加强, 即接触中的语言其相似性促进语言往相类似的结构发展。若按目前学界所认同的看法——新加坡华语以现代标准汉语作为基础, 那么, 新加坡华人在学习华语时应该就只会选择跟闽语相同的双宾语语序, 即 [动词+间接宾语+直接宾语], 而排除粤语的倒置双宾式。为什么新加坡华语会同时有两种双宾语语序? 这些疑问引发我们对目前方言干扰的说法提出问题: 无论从语言使用者或从语言系统的角度而言, 哪种结构源于哪个方言干扰是怎么决定的?

另外, 我们谈一谈现有句法特征描写的不足之处。譬如: 陈重瑜 (1983)、吴英成 (1985)、陆俭明等 (2002)、Chua (2003)、祝晓宏 (2008) 对新加坡华语的补语标记“到”都进行了描写。学者们指出, 在新加坡华语里, “到”取代“得”出现于补语之前。例如: (陈重瑜 1983: 24; 吴英成 1985)

38. 他那么说弄到我很不好意思。

39. 真是气到我半死。

例 (38) “到”后面跟着的是状态补语, 例 (39) “到”后接程度补语。陈重瑜 (1983, 1986)、吴英成 (1985)、陆俭明等 (2002)、Chua 2003、祝晓宏 (2008) 等指出, 粤语在程度补语和状态补语之前用“到”, 厦门话用 [kaʔ], 潮州话用 [kau], 新加坡华语复制这些方言的语法结构而以“到”取代“得”补语标记的位置。

事实上, 新加坡华语有 [动词+到+补语] 和 [动词+得+补语] 两种动补结构。也就是说, “到”不是淘汰“得”而取代“得”作为补语标记。学者们只说新加坡华语有“到”取代“得”出现于补语之前的句式, 这会让人误以为新加坡华语引进程度补语和状态补语的标记只有“到”, 没有“得”。另外, 既然新加坡华语有 [动词+到+补语] 和 [动词+得+补

语] 两种动补结构, 那么, 两者在功能上有没有不同? 若两者功能相同, 为什么一个语言需要两个形式来表达相同的意义? 这些都是在描写句法的时候必须说明的。

此外, 祝晓宏(2008)指新加坡华语的名词能重叠, 表示性质或方位。例如: (祝晓宏 2008: 19)

- 40. 那碗粥水水的, 吃时好像是在喝水。
- 41. 昨天没洗发, 今天就油油。
- 42. 你的地板为什么会有一点沙沙。
- 43. 可以帮我拿一下毛巾吗? 就在衣橱的底底层。
- 44. 你只要走到尾尾那边, 就能看到那间店了。

祝晓宏表示, “水、油、沙”都是物质名词, 重叠以后作谓语, 分别可以形容稀饭、头发、地板的状态, “底、尾”是方位词, 重叠后作定语, 表达极限、极致, 相当于说“衣橱的最底层、最尾端的那个地方”。祝晓宏说明了名词重叠式的语法意义及功能, 这帮助我们了解名词重叠式和原式在语义和功能上的区别。问题在于: 是不是所有的物质名词和方位名词都能重叠? 除了物质名词和方位名词, 其他名词能不能重叠以表达同样的语义及功能? 这些问题不说清楚, 会让人误以为在新加坡华语里只要是物质名词和方位名词都能重叠。

以上, 我们按语音、词汇、语法分类, 总结了学者对新加坡华语做过的研究, 指出现有对新加坡华语的特征所作的描写有哪些不足, 并且点出以方言干扰解释新加坡华语的特征所要面对的问题。

下一章是本文对新加坡华语的特征所作的描写。我们就语音、词法和句法三个方面讨论新加坡华语的一些结构。

第三章 新加坡华语的特征

本文所谓新加坡华语的特征，是从整体的结构上去考察，也就是语音、词汇、语法各方面多种特点的有机结合。各种特点之间相互关联并相互制约，个别字音、个别音值和音类特点以及个别词汇、语法现象只是差异的具体表现，称不上特征（李如龙 2001：2）；新加坡华语的特征是在南北汉语方言的框架下，拿差异作比较而归纳出来的特点。

下面，我们以北京话作为参照系，分别列举新加坡华语与北京话之间所表现的语音、词法和句法方面的差异。

3.1 语音

以下语音现象是我们用《方言调查字表》的 3,700 多个常用字所作的观察和记录。《方言调查字表》（1999 [1981]）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辑。这个字表主要是为记录现代汉语方言的语音用的，一共选择了比较常用的字 3,700 多个。用法部分说明，“字的次序按切韵广韵一系列韵书所代表的古音系统排列，也是为整理音系的便利，因为现代汉语方言的音系大体上说都可以从这个古音系统出发来研究。”除了在共时平面上讨论新加坡华语的语音现象，我们也期望借这个字表，从历时音变的角度来看待新加坡华语的语音现象。

3.1.1 声母

3.1.1.1 擦音、塞擦音

（一）[tɕ-] [tɕ'-] [ɕ-] > [ts-] [ts'-] [s-]

如 1.2 节的语言样本所示，新加坡华语社群习惯将舌尖后擦音和塞擦音声母 [tɕ-] [tɕ'-] [ɕ-] 发成舌尖音。根据我们的观察，将舌尖后擦音和塞擦音声母发成舌尖音这一语音现象涉及所有由 [tɕ-] [tɕ'-] [ɕ-] 声母管辖的语素。例如：

1. 一头猪大概可以卖到一两百块。（新加坡口述历史）

[i⁵¹ t'ou³⁵ tsu⁵⁵ ta⁵¹ k'ai⁵¹ k'e^{35;214} mai⁵¹ tau⁵¹ i⁵¹ lian³⁵ pai²¹⁴ k'uai⁵¹]

2. 认为怎么样都是要回去中国住。（新加坡口述历史）

[lən⁵¹ui³⁵ tsən²¹⁴mian⁵¹ tou⁵⁵ sɿ⁵¹ iau⁵¹ hui³⁵ ts'ɿ⁵¹ tsoŋ⁵⁵kuo? tsu⁵¹]

3. 谢谢你们的支持。（电视对白）

[sie⁵¹sie⁵¹ ni²¹⁴mən³⁵ tə⁵¹ tsɿ⁵⁵ts'ɿ³⁵]

4. 我有放那个眼药水。（日常对话）

[uo²¹⁴ iu²¹⁴ faŋ⁵¹ na⁵¹kə⁵¹ ien²¹⁴iau⁵¹sui²¹⁴]

我们将例（1）-（4）中舌尖后擦音、塞擦音声母被发成舌尖音的例字整理成下表：

	北京音	新加坡华语
猪	[tʂu ⁵⁵]	[tsu ⁵⁵]
是	[ʂɿ ⁵¹]	[sɿ ⁵¹]
中	[tʂuŋ ⁵⁵]	[tsoŋ ⁵⁵]
住	[tʂu ⁵¹]	[tsu ⁵¹]
支持	[tʂɿ ⁵⁵ tʂ'ɿ ³⁵]	[tsɿ ⁵⁵ ts'ɿ ³⁵]
水	[ʂuei ²¹⁴]	[sui ²¹⁴]

（二）舌尖后浊擦音 [ʐ]

新加坡华人成人对音节 [ʐuŋ] 有两种发音，即 [joŋ] 和 [loŋ]。例如：

5. 不然很容易给人家欺负的。（新加坡口述历史）

[pu⁵¹lan³⁵ hən²¹⁴ joŋ^{35;51} kei²¹⁴ lən³⁵ tsia⁵⁵ ts'ɿ⁵⁵fu⁵¹ tə⁵¹]

6. 这样敏感的内容哪里可以在电视上播。（日常对话）

[tsiaŋ⁵¹ miŋ³⁵kan²¹⁴ tə⁵¹ nei⁵¹joŋ³⁵ na³⁵li²¹⁴ k'e^{35;214} i²¹⁴ tsai⁵¹ tien⁵¹sɿ⁵¹ saŋ⁵¹ po⁵⁵]

7. 天气这样热，ice-cream 很快就溶掉了。（日常对话）

[t'ien⁵⁵ts'ɿ⁵¹ tsiaŋ⁵¹ zə⁵¹, aiskrɪm hən²¹⁴ k'uai⁵¹ tsiu⁵¹ joŋ³⁵ tiaue⁵¹ liau²¹⁴]

8. 你是觉得这样做很光荣是吗？（日常对话）

[ni²¹⁴ sɿ⁵¹ tsie?tə? tsiaŋ⁵¹ tsuo⁵¹ hən²¹⁴ kuan⁵⁵joŋ³⁵ sɿ⁵¹ ma⁵⁵]

9. 他努力了这么久，这个荣耀该他拿的。（日常对话）

[t'a⁵⁵ nu²¹⁴li⁵¹ liau²¹⁴ tsə⁵¹ mo⁵¹ tsiu²¹⁴, tsə⁵¹ge⁵¹ joŋ³⁵iau⁵¹ kai⁵⁵ t'a⁵⁵ na²¹⁴ tə⁵¹]

10. 你可以形容一下你当时的心情吗？（电视对白）

[ni²¹⁴ k'e^{35;214} siŋ³⁵loŋ³⁵ i⁵¹sia⁵¹ ni²¹⁴ taŋ⁵⁵sɿ³⁵ tə⁵¹ siŋ⁵⁵ts'ɿ³⁵ ma⁵⁵]

11. 这个很容易嘛，对不对？（电视对白）

[tsə⁵¹ kə⁵¹ hən²¹⁴ loŋ^{35:51} ma²¹⁴, tui⁵¹ pu⁵¹ tui⁵¹]

12. 那你之前是在金融公司上班？（电视对白）

[na⁵¹ ni²¹⁴ tsɿ⁵⁵ ts'ien³⁵ sɿ⁵¹ tsai⁵¹ tsin⁵⁵ loŋ³⁵ koŋ⁵⁵ sɿ⁵⁵ saŋ⁵¹ pan⁵⁵]

13. 你要把这个荣誉跟谁分享？（电视对白）

[ni²¹⁴ iau⁵¹ pa²¹⁴ tsə⁵¹ kə⁵¹ loŋ^{35:51} kən⁵⁵ sei³⁵ fən⁵⁵ sian²¹⁴]

我们将例（5）-（13）中音节 [zɿŋ] 被发成 [joŋ] 或 [loŋ] 的例字整理成下表：

	北京音	新加坡华语
容	[zɿŋ ³⁵]	[joŋ ³⁵]/[loŋ ³⁵]
溶	[zɿŋ ³⁵]	[joŋ ³⁵]/[loŋ ³⁵]
荣	[zɿŋ ³⁵]	[joŋ ³⁵]/[loŋ ³⁵]
融	[zɿŋ ³⁵]	[joŋ ³⁵]/[loŋ ³⁵]

根据我们的观察，发音人对音节 [zɿŋ] 的发音是一致的。发 [joŋ] 的人，无论音节 [zɿŋ] 构成的语素与哪个语素搭配成词都发成 [joŋ]。如：例（5）和（6）的“容易”和“内容”的“容”都读 [joŋ³⁵]，例（8）和（9）的“光荣”和“荣耀”的“荣”也都读 [joŋ³⁵]。同样的，将音节 [zɿŋ] 发成 [loŋ] 的人，无论音节 [zɿŋ] 构成的语素与哪个语素搭配成词都发成 [loŋ]。将音节 [zɿŋ] 发成 [joŋ] 的，主要是四、五十岁以上的中老年人。

此外，出现在其他语音环境的舌尖后浊擦音声母 [ʐ] 有两种发音，即 [z-] 和 [l-]。例如：

14. 但是他们很热心。（新加坡口述历史）

[tan⁵¹ sɿ⁵¹ ta⁵⁵ mən³⁵ hən²¹⁴ zəʔsin⁵⁵]

15. 大家认为我们已经是高度发展的社会。（新加坡口述历史）

[ta⁵¹ tsia⁵⁵ zən⁵¹ ui³⁵ uo²¹⁴ mən³⁵ i²¹⁴ tsin⁵⁵ sɿ⁵¹ kau⁵⁵ tu⁵¹ faʔtsan²¹⁴ tə⁵¹ sə⁵¹ hui⁵¹]

16. 我们蔡厝港有这么一批爱好华乐的人。（新加坡口述历史）

[uo²¹⁴ mən³⁵ ts'ai⁵¹ ts'uo⁵¹ kan²¹⁴ iu²¹⁴ tsə⁵¹ mo⁵¹ i⁵¹ p'i⁵⁵ ai⁵¹ hau⁵¹ hua^{35:51} ie⁵¹ tə⁵¹ zən³⁵]

17. 比如说那些演讲啊……（新加坡口述历史）

[pi²¹⁴zu³⁵ suoʔ na⁵¹ sie⁵⁵ ien³⁵ tsiaŋ²¹⁴ a]

18. 以前的柏油路是太阳晒会软软一样。（新加坡口述历史）

[i²¹⁴ ts'ien³⁵ tə⁵¹ pəʔiu³⁵ lu⁵¹ sɿ⁵¹ t'ai⁵¹ iaŋ³⁵ sai⁵¹ hui⁵¹ zuan³⁵ zuan²¹⁴ i⁵¹ iaŋ⁵¹]

19. 一定是有什么事，要不然他的脸不会这样黑。（日常对话）

[i⁵¹ tiŋ⁵¹ sɿ⁵¹ iu²¹⁴ sən²¹⁴ mo⁵¹ sɿ⁵¹, iau⁵¹ pu⁵¹ lan³⁵ t'a⁵⁵ tə⁵¹ lien²¹⁴ pu⁵¹ hui⁵¹ tsiaŋ⁵¹ hei⁵⁵]

20. 饼干漏风就软软了。（日常对话）

[piŋ²¹⁴ kan⁵⁵ lou⁵¹ fəŋ⁵⁵ tsiu⁵¹ luan³⁵ luan²¹⁴ liau²¹⁴]

21. 如果让你试多一次，ok 吗？（电视对白）

[lu³⁵ kuo²¹⁴ laŋ⁵¹ ni²¹⁴ sɿ⁵¹ tuo⁵⁵ i⁵¹ ts'ɿ⁵¹ ok ma⁵⁵]

22. 男人哪里可以打女人的？（电影对白）

[nan³⁵ lən³⁵ na³⁵ li²¹⁴ k'ə³⁵ i²¹⁴ ta²¹⁴ ni²¹⁴ lən³⁵ tə⁵¹]

我们将例（14）-（22）中舌尖后浊擦音声母 [ʐ-] 发成 [z-] 和 [l-] 的例字整理成下表：

	北京音	新加坡华语
热	[ʐə ⁵¹]	[zəʔ]/[ləʔ]
认	[ʐən ⁵¹]	[zən ⁵¹]/[lən ⁵¹]
人	[ʐən ³⁵]	[zən ³⁵]/[lən ³⁵]
如	[ʐu ³⁵]	[zu ³⁵]/[lu ³⁵]
软	[ʐuan ²¹⁴]	[zuan ²¹⁴]/[luan ²¹⁴]
让	[ʐaŋ ⁵¹]	[zaŋ ⁵¹]/[laŋ ⁵¹]
然	[ʐan ³⁵]	[zan ³⁵]/[lan ³⁵]

根据我们的观察，将舌尖后浊擦音声母 [ʐ-] 发成 [z-] 的，主要是四、五十岁以上的中老年人。

（三）[tɕ-] [tɕ'-] [ɕ-] > [ts-] ts'-] [s-]

新加坡华语社群在发音上分不清舌面与舌尖，常将舌面擦音和塞擦音声母 [tɕ-] [tɕ'-] [ɕ-] 发成舌尖音。例如：

23. 开收音机开很大声。（新加坡口述历史）

[k'ai⁵⁵ sou⁵⁵ iŋ⁵⁵ tsi⁵⁵ k'ai⁵⁵ hən²¹⁴ ta⁵¹ sən⁵⁵]

24. 因为一个时期一个时期不同。（新加坡口述历史）

[iŋ⁵⁵ ui⁵¹ i⁵¹ kə⁵¹ sɿ³⁵ ts'i³⁵ i⁵¹ kə⁵¹ sɿ³⁵ ts'i³⁵ pu⁵¹ t'əŋ³⁵]

25. 有一种热心，有没有？（新加坡口述历史）

[iu²¹⁴ i⁵¹ tsoŋ²¹⁴ zəʔsin⁵⁵, iu²¹⁴ mei³⁵ iu²¹⁴]

26. 你连最基本的诚信也没有。（电视对白）

[ni²¹⁴ lien³⁵ tsui⁵¹ tsi⁵⁵ pən²¹⁴ tə⁵¹ ts'ən³⁵ sin⁵¹ ie²¹⁴ mei³⁵ iu²¹⁴]

27. 你不要跟我发脾气可以吗？（电视对白）

[ni²¹⁴ pu⁵¹ iau⁵¹ kən⁵⁵ uo²¹⁴ faʔ p'i³⁵ ts'i⁵¹ k'ə³⁵ i²¹⁴ ma⁵⁵]

我们将例（23）-（27）中舌面擦音、塞擦音声母 [tɕ-] [tɕ'-] [ɕ-] 发成舌尖音的例字整理成下表：

	北京音	新加坡华语
机	[tɕi ⁵⁵]	[tsi ⁵⁵]
期	[tɕ'i ⁵⁵]	[ts'i ³⁵]
心	[ɕin ⁵⁵]	[sin ⁵⁵]
基	[tɕi ⁵⁵]	[tsi ⁵⁵]
信	[ɕin ⁵¹]	[sin ⁵¹]
气	[tɕ'i ⁵¹]	[ts'i ⁵¹]

新加坡华语社群将舌面擦音和塞擦音发成舌尖音的现象不似女国音。女国音是北京话的一种语音现象，即舌面擦音和塞擦音 [tɕ] [tɕ'] [ɕ] 的发音部位前移，发成一种近似于 [ts] [ts'] [s] 的音，一般出现在十五至三十多岁的有文化的女性的发音。（陈松岑 1985）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1937）翻译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时在译者注中指出，女国音只发生在中古三十六字母的精组字，由见组字腭化的舌面音不读似舌尖音。根据我们的观察，新加坡华语社群将 [tɕ] [tɕ'] [ɕ] 发成舌尖音的现象不似女国音只发生在中古精组字，而是源于精组和见组的舌面擦音和塞擦音均被发成舌尖音。¹⁸女国音还

¹⁸ 根据语音演变的历史，北京话的舌面擦音和塞擦音来自中古三十六字母的精组（齿头音）和见组（牙音）。

遵循声母的中古音来源，仅源于精组的舌面擦音和塞擦音读似舌尖音，这在音变上属于还原。新加坡华语的现象则乖离声母的中古音来源，不仅源于精组的舌面擦音和塞擦音读似舌尖音，就连源于见组的舌面擦音和塞擦音也一并被发成舌尖音。若依照音变还原的路径，源于见组的舌面擦音和塞擦音应该变回舌根音或零声母；然而，我们在调查中没有发现如将“记”（中古见组字）的声母 [tɕ-] 发成 [k-] 的情况。

3.1.2 韵母

韵母的部分，我们主要说明表现在韵头（或韵腹）和韵尾方面的语音现象。

3.1.2.1 撮口呼 > 齐齿呼

传统音韵学按照韵头（介音）或韵腹（主要元音）的不同把韵母分为四类，即开口呼、齐齿呼、合口呼、撮口呼，统称“四呼”。开口呼指没有韵头、韵腹又不是 [-i-] [-u-] [-y-] 的韵母，如：[-a-] [-ou] 等；齐齿呼指韵头或韵腹是 [-i-] 的韵母，如：[-i-] [-ia-] [-iou] 等；合口呼指韵头或韵腹是 [-u-] 的韵母，如：[-u-] [-ua-] [-uan] 等；撮口呼指韵头或韵腹是 [-y-] 的韵母，如：[-y-] [-ye] [-yn]。

新加坡华语社群常将音节中的介音或主要元音 [-y-] 发成 [-i-]，即将撮口呼韵母发成齐齿呼。根据我们的观察，将撮口呼发成齐齿呼这一语音现象发生于所有介音或主要元音是 [-y-] 的字。例如：

28. 那个时候就差不多差不多可以过得去生活这样。（新加坡口述历史）

[na⁵¹kə⁵¹ sɿ³⁵hou⁵¹ tsiu⁵¹ ts'a⁵⁵pu⁵¹to⁵⁵ ts'a⁵⁵pu⁵¹to⁵⁵ kə^{35:214}i²¹⁴ kuo⁵¹təʔts'i⁵¹
sən⁵⁵huo³⁵ tsə⁵¹iaŋ⁵¹]

29. 一个月才一毛多钱工钱。（新加坡口述历史）

[i⁵¹kə⁵¹ie⁵¹ ts'ai³⁵i⁵¹mau²¹⁴to⁵⁵ts'ien³⁵ koŋ⁵⁵ts'ien³⁵]

30. 那摊鱼圆面很好生意。（日常对话）

[na⁵¹t'an⁵⁵i³⁵ien³⁵mien⁵¹ hən³⁵ hau²¹⁴ sən⁵⁵i⁵¹]

31. 找时间我们来去云南旅行。（日常对话）

[tsau²¹⁴ sɿ³⁵ tsien⁵⁵ uo²¹⁴ mən³⁵ lai³⁵ ts' i⁵¹ iŋ³⁵ nan³⁵ li²¹⁴ siŋ³⁵]

我们将例（28）-（31）中撮口呼发成齐齿呼的例字整理成下表：

	北京音	新加坡华语
去	[tɕ' y ⁵¹]	[ts' i ⁵¹]
月	[yɛ ⁵¹]	[ie ⁵¹]
鱼	[y ³⁵]	[i ³⁵]
圆	[yɛn ³⁵]	[ien ³⁵]
云	[yn ³⁵]	[iŋ ³⁵]
旅	[ly ²¹⁴]	[li ²¹⁴]

3.1.2.2 鼻音韵母

（一）[-əŋ] > [-ən]

如 1.2 的语言样本所示，鼻音韵母 [-əŋ] 常被发成 [-ən]。例如：

32. 我爸爸外面跟人家做生意。（新加坡口述历史）

[uo²¹⁴ pa⁵⁵ pa⁵⁵ uai⁵¹ mien⁵¹ kən⁵⁵ lən³⁵ tsia⁵⁵ tso⁵¹ sən^{55:51}]

33. 整箱这个银给人家偷去。（新加坡口述历史）

[tsən²¹⁴ siaŋ⁵⁵ tsə⁵¹ kə⁵¹ iŋ³⁵ kei²¹⁴ lən³⁵ tsia⁵⁵ t'ou⁵⁵ ts' i⁵¹]

34. 他疼孩子疼到要死！（日常对话）

[t' a⁵⁵ t' ən³⁵ hai³⁵ tsɿ²¹⁴ t' ən³⁵ tau⁵¹ iau⁵¹ sɿ²¹⁴]

35. 走这条横的过去应该会比较快。（日常对话）

[tsou²¹⁴ tsə⁵¹ t' iau³⁵ hən³⁵ tə⁵¹ kuo⁵¹ ts' i⁵¹ iŋ⁵⁵ kai⁵⁵ hui⁵¹ pi²¹⁴ tsiau⁵¹ k' uai⁵¹]

36. 你看啦，排这边反而更慢！（日常对话）

[ni²¹⁴ k' an⁵¹ la⁵⁵, p' ai³⁵ tsə⁵¹ pien⁵⁵ fan²¹⁴ e³⁵ kən⁵¹ man⁵¹]

37. Malaysia 那个金马仑土崩你还去？（日常对话）

[mələZHə na⁵¹ kə⁵¹ tsin⁵⁵ ma²¹⁴ lun³⁵ t' u²¹⁴ pən⁵⁵ ni²¹⁴ hai³⁵ ts' i⁵¹]

38. 你做么变成这个样子？（电视对白）

[ni²¹⁴ tsuo⁵¹ mo⁵¹ pien⁵¹ ts' ən³⁵ tsə⁵¹ kə⁵¹ iaŋ⁵¹ tsɿ²¹⁴]

39. 那么碰到国庆[hã], 那么就要捐多一点啰! (新加坡口述历史)

[na⁵¹ mo⁵¹ p'ɔŋ⁵¹ tau⁵¹ kuoʔts'ɪŋ⁵¹ hã, na⁵¹ mo⁵¹ tsiu⁵¹ iau⁵¹ tsien⁵⁵ to⁵⁵
i⁵¹ tien²¹⁴ lo⁵⁵]

40. 要不要我开风扇? (电视对白)

[iau⁵¹ pu⁵¹ iau⁵¹ uo²¹⁴ k'ai⁵⁵ fɔŋ⁵⁵ san⁵¹]

41. 你爸爸讲这个礼拜要带我去吃风。(日常对话)

[ni²¹⁴ pa²¹⁴ pa³⁵ tsian²¹⁴ tsə⁵¹ kə⁵¹ li²¹⁴ pai⁵¹ iau⁵¹ tai⁵¹ uo²¹⁴ ts'i⁵¹ ts'ɿʔfɔŋ⁵⁵]

42. 我昨晚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日常对话)

[uo²¹⁴ tsuo³⁵ uan²¹⁴ tsuo⁵¹ liau²¹⁴ i⁵¹ kə⁵¹ hən²¹⁴ ts'i³⁵ kuai⁵¹ tə⁵¹ moŋ⁵¹]

43. 烟雾又来了, 外面整个朦朦的。(日常对话)

[ien⁵⁵ u⁵¹ iu⁵¹ lai³⁵ liau²¹⁴, uai⁵¹ mien⁵¹ tsən²¹⁴ kə⁵¹ moŋ³⁵ moŋ³⁵ tə⁵¹]

44. 做么要封路? (日常对话)

[tsuo⁵¹ mo⁵¹ iau⁵¹ fɔŋ⁵⁵ lu⁵¹]

45. 你去跟他拿一个信封。(日常对话)

[ni²¹⁴ ts'i⁵¹ kən⁵⁵ t'a⁵⁵ na²¹⁴ i⁵¹ kə⁵¹ siŋ⁵¹ fɔŋ⁵⁵]

我们将例(32) - (45)中[-əŋ]发成[-ən]的例字整理成下表:

	北京音	新加坡华语
生	[ʂəŋ ⁵⁵]	[sən ⁵⁵]
整	[tʂəŋ ²¹⁴]	[tsən ²¹⁴]
疼	[t'əŋ ³⁵]	[t'ən ³⁵]
横	[xəŋ ³⁵]	[hən ³⁵]
更	[kəŋ ⁵¹]	[kən ⁵¹]
崩	[pəŋ ⁵⁵]	[pən ⁵⁵]
成	[tʂ'əŋ ³⁵]	[ts'ən ³⁵]
碰	[p'əŋ ⁵¹]	[p'ən ⁵¹]
风	[fəŋ ⁵⁵]	[fɔŋ ⁵⁵]
梦	[məŋ ⁵¹]	[moŋ ⁵¹]
朦	[məŋ ³⁵]	[moŋ ³⁵]
封	[fəŋ ⁵⁵]	[fɔŋ ⁵⁵]

当声母为双唇音 [p-] [p'-] [m-] 和唇齿音 [f-], 韵母 [-əŋ] 一般被发成 [-oŋ], 且韵母 [-əŋ] 发成 [-oŋ] 不受语义及语素所出现的位置制约, 如例 (44) 和 (45) 中“封路”的“封”和“信封”的“封”都读 [foŋ⁵⁵].

(二) [-in] > [-iŋ] / [-iŋ] > [-in]

当鼻音韵母中的主要元音为[-i-], 舌尖鼻音[-n]与舌根鼻音[-ŋ]互换, 即 [-in]被发成[-iŋ], 而[-iŋ]则被发成[-in]。例如:

46. 才第一次被叫去进行这个试音。(新加坡口述历史)

[ts'ai³⁵ ti⁵¹ i⁵¹ ts'ɿ⁵¹ pei⁵¹ tsiau⁵¹ ts'i⁵¹ tsin⁵¹ siŋ³⁵ tsə⁵¹ kə⁵¹ sɿ⁵¹ iŋ⁵⁵]

47. 因为他们政府给每一区的津贴有限。(新加坡口述历史)

[iŋ⁵⁵ ui⁵¹ t'a⁵⁵ mən³⁵ tsən⁵¹ fu²¹⁴ kei²¹⁴ mei^{214;51} i⁵¹ ts'i⁵⁵ tə⁵¹ tsin⁵⁵ tie? iu²¹⁴ sien⁵¹]

48. 害到我很紧张。(电视对白)

[hai⁵¹ tau⁵¹ uo²¹⁴ hən²¹⁴ tsin²¹⁴ tsan⁵⁵]

49. 最近我发现到一个很 cool 的 website。(电视对白)

[tsui⁵¹ tsin⁵¹ uo²¹⁴ fa? sien⁵¹ tau⁵¹ i⁵¹ kə⁵¹ hən²¹⁴ kool tə⁵¹ websait]

50. 那个桌子跟我抹干净。(日常对话)

[na⁵¹ kə⁵¹ tsuo? tsɿ²¹⁴ kən⁵⁵ uo²¹⁴ ma? kan⁵⁵ tsin⁵¹]

51. 你有打电话订位吗?(日常对话)

[ni²¹⁴ iu²¹⁴ ta²¹⁴ tien⁵¹ hua⁵¹ tin⁵¹ ui⁵¹ ma⁵⁵]

52. 很好, 很清洁!(日常对话)

[hən³⁵ hau²¹⁴, hən²¹⁴ ts'in⁵⁵ tsie?]

我们将例（46）-（52）中韵母 [-in] 和 [-iŋ] 交替的例字整理成下表：

	北京音	新加坡华语
进	[tein ⁵¹]	[tsiŋ ⁵¹]
音	[in ⁵⁵]	[iŋ ⁵⁵]
因	[in ⁵⁵]	[iŋ ⁵⁵]
津	[tein ⁵⁵]	[tsiŋ ⁵⁵]
紧	[tein ²¹⁴]	[tsiŋ ²¹⁴]
近	[tein ⁵¹]	[tsiŋ ⁵¹]
净	[teiŋ ⁵¹]	[tsin ⁵¹]
订	[tiŋ ⁵¹]	[tin ⁵¹]
清	[tɕ' iŋ ⁵⁵]	[ts'in ⁵⁵]

必须指出，韵母 [-in] 和 [-iŋ] 互换是新加坡华语一个显著的语音现象，但 [-iŋ] 变 [-in] 不如 [-in] 变 [-iŋ] 绝对。也就是说，新加坡华语社群普遍上将 [-in] 发成 [-iŋ]，却不一定将韵母 [-iŋ] 都发成 [-in]。譬如在我们所收集的语料中，“因、音、今、紧、尽”等的韵母都读 [-iŋ]，但“净、经、清、请、订、平”等的韵母有读 [-in] 的，也有读 [-iŋ] 的。换句话说，[-iŋ] 变 [-in] 显著但非绝对；这是[-in] 和 [-iŋ] 交替的不对称性。也因此，[-in]和[-iŋ]在新加坡华语里不构成最小对立，不论是读[-in]还是[-iŋ]，都不影响语义，听话人一般都可以通过语境辨义。

3.1.3 声调

新加坡华语除了阴平、阳平、上声、去声，还有第五个声调。（陈重瑜 1981；卢绍昌 1981；Chen 1982a）陈重瑜（1981）将这第五个声调称为“第五声”。下面，我们就着重讨论第五声。

3.1.3.1 第五声

如前所述，第五声是一个短促的下降调，带这个声调的音节通常都有一个喉塞音韵尾 [-ʔ]。我们按所收集到的语料列举几个例子：

53. 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每天要吃那种红棕油。（新加坡口述历史）

[na⁵¹ kə⁵¹ sɿ³⁵ hou⁵¹ uo²¹⁴ tsi⁵¹ təʔ uo²¹⁴ mən³⁵ mei²¹⁴ tien⁵⁵ iau⁵¹ ts'ɿʔ na⁵¹ tsoŋ²¹⁴ hoŋ³⁵ tsoŋ⁵⁵ iu³⁵]

54. 也是一个木板屋来的。（新加坡口述历史）

[ie²¹⁴ sɿ⁵¹ i⁵¹ kə⁵¹ mu⁵¹ pan²¹⁴ u? lai³⁵ tə⁵¹]

55. 挑给他们作为用的、喝的，还是洗衣服的这样（新加坡口述历史）

[t'iau⁵⁵ kei²¹⁴ ta⁵⁵ mən³⁵ tso⁵¹ ui³⁵ ion⁵¹ tə⁵¹, hə? tə⁵¹, hai³⁵ sɿ⁵¹ si²¹⁴ i⁵⁵ fu? tə⁵¹ tsə⁵¹ ian⁵¹]

56. 我出门之前关好了。（日常对话）

[uo²¹⁴ ts'u? mən³⁵ tsi⁵⁵ ts'ien³⁵ kuan⁵⁵ hau²¹⁴ liau²¹⁴]

57. 我想吃鸭饭。（日常对话）

[uo²¹⁴ sian²¹⁴ ts'ɿ? ia? fan⁵¹]

58. 做到乱七八糟！（日常对话）

[tsuo⁵¹ tau⁵¹ luan⁵¹ ts'i? pa? tsau⁵⁵]

59. 你的孩子读几年级？（日常对话）

[ni²¹⁴ tə⁵¹ hai³⁵ tsɿ²¹⁴ tu? tsi²¹⁴ nien³⁵ tsi?]

我们将例（53）-（59）中读第五声的例字整理成下表：

	北京音	新加坡华语
得	[tə ³⁵]	[tə?]
吃	[tʂ'ɿ ⁵⁵]	[ts'ɿ?]
屋	[u ⁵⁵]	[u?]
喝	[xɤ ⁵⁵]	[hə?]
服	[fu ³⁵]	[fu?]
出	[tʂ'u ⁵⁵]	[ts'u?]
鸭	[ia ⁵⁵]	[ia?]
七	[tɕ'i ⁵⁵]	[ts'i?]
八	[pa ⁵⁵]	[pa?]
读	[tu ³⁵]	[tu?]
级	[tɕi ³⁵]	[tsi?]

根据陈重瑜的论述，新加坡华语的第五声源于中古入声；中古入声语音素因在南方汉语方言中得到保留而藉着南方汉语方言干扰华语的声调。卢绍昌则称新加坡华语的第五声为特殊的促调，因为它是那些原来属于方言入声字的调子自成一类而形成的。

由于第五声的显著性，学者一般都承认第五声为新加坡华语一个重要的语音特点。而对于第五声产生的动因和机制，大家都普遍接受陈重瑜的说法，即中古入声以南方汉语方言为媒介影响新加坡华语的声调且第五声是中古入声语素或南方汉语方言入声语素的投射。

黄颖瑜（2012）重新探讨了新加坡华语第五声的起因。该文以 83 个在新加坡华语里读第五声的词语为考察对象，查证这批词语在中古时期的声调以及它们在南方汉语方言里是否也同样是入声语素。考察发现，方言里不是入声的语素，在新加坡华语里也读第五声。例如：第五声高频词“喝[həʔ]/[hə^{41/42}]”。“喝”是中古入声字，但在福建话和广东话里，表达相同意思的形式分别是“啲[lim]”和“饮[jem]”，都不是入声。另外，黄颖瑜的考察也发现，在新加坡华语里读第五声的语素不一定等同于南方汉语方言的语素。例如：福建话和潮州话表示“跌倒”的语素为“跋[puaʔ]”，新加坡华语为“跌[tieʔ]/[tie^{42/41}]”。“跋[puaʔ]”和“跌[tieʔ]/[tie^{42/41}]”表达相同的意义但语音形式不同。黄颖瑜因此认为，对于第五声的起因更合理的解释为南方汉语方言以入声语素表达的概念转移到新加坡华语并投射为第五声，而非陈重瑜所谓语素的一一对应。具体而言，音变不一定依据语素或词的单位进行，而且音变不一定由语音因素促动。若要从音节结构来看音变，黄颖瑜认为，诱发第五声的关键是单元音韵母。

值得注意的是，黄颖瑜（2012）考察汉语方言语素的依据为《汉语方言词汇》，但若依据《汉语方音字汇》所注某个字在各个方言里的读音，上边所说的中古入声字“喝”在闽、粤、客等南方汉语方言里皆读入声。

	北京	梅县	广州	厦门	潮州
喝 _{喝水}	[xɤ]	[hot]	[hot]	[hat]	[hat]

表 3.1：中古入声字“喝”在闽、粤、客等南方汉语方言里的读音（《汉语方音字汇》，页 25）

此外，闽、粤、客等南方汉语方言虽使用不同的语素表示“跌倒”这个概念，但根据《汉语方音字汇》，中古入声字“跌”在闽、粤、客等南方汉语方言中都读入声。

	北京	梅县	广州	厦门	潮州
跌	[tie]	[tiɛt]	[tit]	[tiɛt]	[tiɛk]

表 3.2: 中古入声字“跌”在闽、粤、客等南方汉语方言里的读音（《汉语方音字汇》，页 43）

陈重瑜指中古入声或方言入声与新加坡华语的第五声是语素与语素的对应。黄颖瑜通过考察反驳了陈重瑜的观点，认为新加坡华语的第五声是南方汉语方言中以入声语素表达的概念的转移。然而，通过《汉语方音字汇》，我们发现，新加坡华语里读第五声的中古入声字在闽、粤、客等南方汉语方言里皆读入声。因此，我们面对一个问题：中古入声或方言入声与新加坡华语第五声究竟是语素与语素的对应、方言概念的转移或单纯是字与字的对应？

我们发现，新加坡华语社群对第五声的辨识有规律。譬如：多音多义语素“只”。¹⁹新加坡华语社群将作量词的“只[tɕi⁵⁵]”读第五声，而作副词的“只[tɕi²¹⁴]”读第三声。这说明中古入声或方言入声与新加坡华语第五声不单纯是入声字与入声字的对应。由于作量词的“只[tɕi⁵⁵]”是中古入声字，在梅县客家话、广州话、潮州话、厦门话等南方汉语方言里也是入声，我们不能排除方言的作用。²⁰但是，若根据文史资料，新加坡华人最开始从老师那里接触到的华语语音不是北京音，而是南腔北调，而且当时（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华语的语音以老国音为标准，虽以北京音系为基础，但保留了入声

¹⁹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只[tɕi⁵⁵]”可以作量词，例如：“一只鸡”，也可以表示“单独的，极少的”，例如：“只身”；“只[tɕi²¹⁴]”表示“仅仅，唯一”，例如：“只是”，也表示“限于某个范围”，例如：“只管”。

²⁰ 作量词的“只”在梅县客家话的语音形式为[tsak]，在广州话为[tɕɛk]，在厦门话为[tsiaʔ]，在潮州话为[tsiaʔ]，皆为入声。

调，因此，我们有理由怀疑新加坡华语的第五声是自国音遗留下来的语音形式。

另外，陈重瑜（1981）指出，不是所有的中古及方言入声语素都被读作第五声。根据 Chen（1982a），在中古带有 [-k] 韵尾但在新加坡华语里不读第五声的入声语素为：黑、北、脚、熟（/-ou/）、百、白、薄、粥、拆、窄。

根据我们从日常对话的观察所得，“熟”、“薄”、“粥”、“拆”在四、五十岁中老年人的说话里是第五声。

60. 这个菜很容易熟的。

[tsə⁵¹ kə⁵¹ ts'ai⁵¹ hən²¹⁴ juŋ^{35.51} su? tə⁵¹]

61. 切薄薄了拿来煎。

[ts'ie? po?po? liau²¹⁴ na²¹⁴ lai³⁵ tsien⁵⁵]

62. 早上吃粥。

[tsau²¹⁴ saŋ⁵¹ ts'ɿ? tsu?]

63. 窗帘跟它拆下来拿去洗。

[ts'uaŋ⁵⁵ lien³⁵ kən⁵⁵ t'a⁵⁵ ts'ə? sia⁵¹ lai³⁵ na²¹⁴ ts'i⁵¹ si²¹⁴]

我们将例（60）-（63）中“熟”、“薄”、“粥”、“拆”的第五声读法整理成下表：

	北京音	新加坡华语
熟	[ʃou ³⁵]/[ʃu ³⁵]	[su?]
薄	[pau ³⁵]/[po ³⁵]	[po?]
粥	[tʃou ⁵⁵]	[tsu?]
拆	[tʃ'ai ⁵⁵]	[ts'ə?]

我们参照《方言调查字表》的 3,700 多个常用字进行观察，在新加坡华语里不读第五声的中古入声语素为：雪、发^{头发}、没^{没有}、摸、脚、捉、角、北、贼、黑、百、拍、白、窄、摘。这十五个语素，除了“发”和“摸”是单韵母，其余皆为复韵母。如是印证黄颖瑜（2012）所作的推测——单元音韵母是构成第五声的其中一项语音条件。

接着，我们就轻声和儿化谈新加坡华语在语音与词法方面交叉的情况，也就是在构词平面上谈轻声和儿化。

3.2 词法

轻声和儿化是语音问题，但是也牵扯到词汇、语法的问题。（鲁允中 2001：1）新加坡华语没有轻声和儿化。轻声和儿化是北京话的一个特征。事实上，说新加坡华语没有轻声和儿化，是以新加坡华语和北京话比较之后得出的结论。因此，以下对于新加坡华语没有轻声和儿化所作的论述皆以北京话的轻声和儿化作为参照。

3.2.1 构词

3.2.1.1 轻声

轻声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韵律。（劲松 2002：1）²¹作为词汇现象，轻声是构词方式中的一类，具有区别词汇、语法意义的作用。北京话有一类同形词，以 AB、A'B'来表示，AB 和 A'B'的词形相同，音节结构中的声母和韵母也相同，不同的是 B 有声调而 B'为轻声音节。例如：

²¹ 语言学上所谓韵律，主要是指非线性的、以不同层级的语言单位为载体的音频、音时和音量特性。（劲松 2002：1）

AB	词义	A'B'	词义
买卖 [mai ²¹⁴ mai ⁵¹]	买和卖。	买卖 [mai ²¹⁴ mai]	(1) 生意。 (2) 指商店。
地道 [ti ⁵¹ tau ⁵¹]	在地面下掘成的交通坑道（多用于军事）。	地道 [ti ⁵¹ tau]	(1) 真正是有名产地出产的。 (2) 真正的；纯粹。 (3) （工作或材料的质量）实在；够标准。
大意 [ta ⁵¹ i ⁵¹]	主要的意思。	大意 [ta ⁵¹ i]	疏忽；不注意。
东西 [tuŋ ⁵⁵ ei ⁵⁵]	(1) 方位词。东边和西边。 (2) 指从东到西的距离。	东西 [tuŋ ⁵⁵ ei]	(1) 泛指各种具体的或抽象的事物。 (2) 特指人或动物（多含厌恶或喜爱的感情）。

从上边所举的双音节词来看，每一组词的后一个音节单独念的时候，读音都是相同的，但后一个音节读轻声与否起着辨义作用。所谓辨义，具体得从构词和语法两方面来看。我们根据张洵如 1957 年编的《北京话轻声词汇》以及《现代汉语词典》（第 6 版）所收录的轻声词，在北京话轻声词汇的基础上讨论新加坡华语没有轻声的原因。

从词汇方面来说，轻声是一种构词手段，因为同形词变读轻声可以改变词的意义。例如：

词	读音	词义
本事	[pən ²¹⁴ ʂt ⁵¹]	文学作品主题所根据的故事情节：这些诗词的～年久失考。
	[pən ²¹⁴ ʂu]	本领：学～。
别子	[pie ³⁵ tsɿ ²¹⁴]	古代指天子、诸侯的嫡长子以外的儿子。
	[pie ³⁵ tsɿ]	(1) 线装书的套子上或字画手卷上用来别住开口的东西，多用骨头制成。 (2) 烟袋荷包的坠饰。
大爷	[ta ⁵¹ ie ³⁵]	指不好劳动、傲慢任性的男子：～作风。
	[ta ⁵¹ ie]	(1) 伯父。 (2) 尊称年长的男子（一般指年纪大于父亲的）。
地方	[ti ⁵¹ fan ⁵⁵]	(1) 中央下属的各级行政区划的统称（跟“中央”相对）：这项工程有中央投资，也有～投资。 (2) 军队方面指军队以外的部门、团体等：培养军队和～两用人才。 (3) 本地、当地：他在农村的时候，常给～上的群众治病。
	[ti ⁵¹ fan]	(1) （～儿）某一区域；空间的一部分；部位：你是什么～的人？ (2) 部分：这话有对的～，也有不对的～。
方向	[fan ⁵⁵ ɕian ⁵¹]	(1) 指东、南、西、北等：在山里迷失了～。 (2) 正对的位置；前进的目标：军队朝渡口的～行进。
	[fan ⁵⁵ ɕian]	情势：看～做事。
故事	[ku ⁵¹ ʂt ⁵¹]	旧日的行事制度；例行的事：奉行～。
	[ku ⁵¹ ʂu]	(1) 真实的或虚构的用作讲述对象的事情，有连贯性，富吸引力，能感染人：神话～。 (2) 文艺作品中用来体现主题的情节：～性。
老公	[lau ²¹⁴ kuŋ ⁵⁵]	丈夫 [tʂan ⁵¹ fu]。
	[lau ²¹⁴ kuŋ]	太监。
冷战	[lən ²¹⁴ tʂan ⁵¹]	指国际间进行的战争形式之外的敌对行动。
	[lən ²¹⁴ tʂan]	因寒冷或害怕身体突然颤动一两下。
星星	[ɕiŋ ⁵⁵ ɕiŋ ⁵⁵]	细小的点儿：～之火，可以燎原
	[ɕiŋ ⁵⁵ ɕiŋ]	夜晚天空中闪烁发光的天体。
兄弟	[ɕioŋ ⁵⁵ ti ⁵¹]	哥哥和弟弟：～二人。
	[ɕioŋ ⁵⁵ ti]	(1) 弟弟。 (2) 称呼年纪比自己小的男子（亲切的口气）。 (3) 谦辞，男子跟辈分相同的人或对众人说话时的自称：～我刚到这里，请多多关照。

褒贬	[pau ⁵⁵ pien ²¹⁴]	评论好坏：～人物。
	[pau ⁵⁵ pien]	批评缺点；指责：有意见要当面提，别在背地里～人。
抽打	[tɕou ⁵⁵ ta ²¹⁴]	（用条状物）打：赶车人挥着鞭子，不时地～着牲口。
	[tɕou ⁵⁵ ta]	用掸子、毛巾等在衣物上打，以除掉灰尘：大衣上满是土，得～～。
发送	[fa ⁵⁵ sun ⁵¹]	发出；送出：～文件。
	[fa ⁵⁵ sun]	办丧事，特指殡葬。
照应	[tɕau ⁵¹ iŋ ⁵¹]	配合；呼应：互相～。
	[tɕau ⁵¹ iŋ]	照料：一路上乘务员对旅客～得很好。
肉头	[zou ⁵¹ t'ou ³⁵]	（1）软弱无能；软弱可欺。 （2）傻：他净干这种～事！ （3）性子慢，动作迟缓：这人干活儿可真～。
	[zou ⁵¹ t'ou]	丰满而柔软；软和：这孩子的手多～！
自在	[tsɿ ⁵¹ tsai ⁵¹]	自由；不受拘束：逍遥～。
	[tsɿ ⁵¹ tsai]	安闲舒适：他们俩的小日子过得挺～。

其他同形词变读轻声而改变词义的例子还有：

大夫、大人、大师傅、大王、东西、风头、废物、姑爷、后晌、犄角、来路、粒子、卵子、眉目、门道、男人、年时、女人、人性、生意、师爷、时令、枪手、特务、图书、土地、媳妇、小子、刑法、烟火、颜色、游子、章程、丈夫、丈人、针眼、砖头、告诉、号丧、忽闪、开发、试探、牢稳、清亮

以上同形词变读轻声仅词义改变，读轻声与读原调的两个同形词之间的词性相同，即读原调的词若是名词，变读轻声后的词仍是名词。

就以上所列举的非轻声与轻声词的组合来看，新加坡华语要么用跟北京话不同的词形来表达这些概念，要么就是跟北京话相同的词形或只承载那个由非轻声管辖的意义，或只承载由轻声管辖的意义，不会两者兼顾。譬如：在新加坡华语里，“本事”只有“本领”一个义位；“老公”只有“丈夫”一个义位；“星星”就指“夜空中闪烁发光的天体”；“发送”也只有“发出；送出”一个义位。换句话说，新加坡华语不需要以轻声作为构词手段。但是，新加坡华语

也不是没有一个词形承载两个以上意义的词。遇到如“东西”即指“东边和西边”也泛指“各种具体的或抽象的事物”这类同形词，人们一般通过语境辨别语义。

从语法方面来说，轻声可以改变词性。（鲁允中 2001；劲松 2002）例如：

词	读音	词性与词义
言语	[iɛn ³⁵ y ²¹⁴]	[名词] 说的话：～粗鲁。
	[iɛn ³⁵ y]	[动词] 说；说话：问你话呢，你怎么不～？
大方	[ta ⁵¹ faŋ ⁵⁵]	[名词] 指专家学者；内行人：～之家。
	[ta ⁵¹ faŋ]	[形容词] (1) 对于财物不计较；不吝啬：出手～。 (2) (言谈、举止) 自然；不拘束：举止～。 (3) (样式、颜色等) 不俗气：陈设～。
人家	[zɤn ³⁵ teia ⁵⁵]	[名词] (1) 住户：这个村子有百十户～。 (2) 家庭：勤俭～。 (3) 指女子未来的丈夫家：她已经有了～儿了。
	[zɤn ³⁵ teia]	[代词] 人称代词 (1) 指自己或某人以外的人；别人：～都不怕，就怕你。 (2) 指某个人或某些人，意思跟“他”或“他们”相近：你把东西快给～送回去吧。 (3) 指“我”(有亲热或俏皮的意味)：原来是你呀，差点儿没把～吓死！
下水	[ɕia ⁵¹ ɕuei ²¹⁴]	[动词] ¹ (1) 进入水中：新船～典礼。 (2) 把某些纺织品、纤维等浸在水中使收缩。 (3) 指做坏事：拖人～。 [动词] ² 向下游航行：～船。
	[ɕia ⁵¹ ɕuei]	[名词] 用作食品的牲畜的内脏，有些地区专指肚子和肠子：猪～。
受用	[ɕou ⁵¹ iun ⁵¹]	[动词] 享用；得益：学会这种本领，一辈子～不尽。
	[ɕou ⁵¹ iun]	[形容词] 身心舒服（多用于否定式）：听了这番话，他心里很不～。

同样的，新加坡华语不用轻声来作为区别词性的手段。以上边所举的同形词组合为例，新加坡华语社群在口语里基本不用“言语”，一般用“讲话”表示“说话”或“说的话”；“大方”在新加坡华语里只有形容词的用法；“人家”一般用作人称代词；新加坡华语社群也不用“下水”指动物的内脏。因此，轻声没有必要成为新加坡华语的一种语法手段。再加上若遇到有别义的同形词，语言使用者一般能借由语境辨别语义，无需动用轻声。

除了以上的双音节同形词，北京话的后缀与轻声有着天然的联系。（周一民 2005：149）周一民（2005）指出，北京话的“子、儿、头”等后缀由实词虚化得来，它们都与轻声有关，譬如：在北京话里，“莲子”、“虾子”、“鱼子”的“子”都有实义，读重音，轻声的“子”为后缀，意义多数很虚。简言之，轻声是后缀的标记。从语素个体表义的角度来看，在“桌子、锄头”等这类词中，非轻声音节为实语素，词汇意义主要由非轻声语素表达，轻声语素作为后缀，其意义已经虚化，轻声音节依附在非轻声音节上辅助表义，起构词的作用。如：“鸭子”去掉“子”后，“鸭”仍可以指“嘴扁腿短、趾间有蹼、善游泳的家禽”，后缀“子”出现与否不影响表义。事实上，这就给新加坡华语有时加、有时又不加后缀“子”的现象做了解释。

新加坡华语社群在使用下列名词时，有时加后缀“子”，有时不加。即使加了，作为后缀的“子”也保留原调，不读轻声。

鞋 / 鞋子	盒 / 盒子
裤 / 裤子	箱 / 箱子
裙 / 裙子	瓶 / 瓶子
位 / 位子	罐 / 罐子
柱 / 柱子	袜 / 袜子
鸭 / 鸭子	帽 / 帽子

与北京话比较起来，从语言习惯和思维模式的角度来说，新加坡华人在说华语时不习惯用“子”后缀。我们再举一些例子：

北京话	新加坡华语
被子	被
领子	领
豹子	豹
钉子	钉
窗子	窗
筛子	筛
车子	车
房子	房
屋子	屋
稻子	稻
麦子	麦
包子	包
爪子	爪
孙子	孙

由于“子”在以上所举的双音节词中是意义虚化的词缀，只起构词作用，其主要功能实际上是构成双音化的形式，对意义的影响不大，因此，在语言认知的层面上来说，由于南方汉语方言的词汇多为单音节（尤其是闽语），“子”后缀的弱表义功能没有对大多数母语是南方汉语方言的新加坡华人成人的语言思维起到显著的刺激作用，新加坡华人因此还是习惯词语的单音节形式。

新加坡华语有“头”后缀，但作为后缀的“头”保留原调，不读轻声。这是由于新加坡华语里带“头”缀的词基本上只有一个义位，不需要以词缀变读轻声来区别意义。例如：

词	读音	词义
锄头	[ts'u ³⁵ t'ou ³⁵]	松土和除草用的农具。
对头	[tui ⁵¹ t'ou ³⁵]	仇敌；敌对的方面：他们两个是死～。
额头	[eʔt'ou ³⁵]	人的眉毛以上头发以下的部分。
风头	[fun ⁵⁵ t'ou ³⁵]	出头露面，显示个人的表现（含贬义）：他最喜欢出～的。
斧头	[fu ²¹⁴ t'ou ³⁵]	斧子。
骨头	[kuʔt'ou ³⁵]	人和脊椎动物体内支持身体、保护内脏的坚硬组织。
罐头	[kuan ⁵¹ t'ou ³⁵]	指罐头食品。
来头	[lai ³⁵ t'ou ³⁵]	来历：你知道他是什么～吗，竟敢惹他！
石头	[sɿʔt'ou ³⁵]	构成地壳的坚硬物质，是由矿物集合而成的。
灶头	[tsau ⁵¹ t'ou ³⁵]	指称厨房里做饭的平台。
枕头	[tsən ²¹⁴ t'ou ³⁵]	躺着的时候，垫在头下使头略高的东西。

在北京话里，“头”读轻声除了作为后缀的标记，还有辨义的作用。以上边所举的词为例，“对头”和“风头”在北京话里读轻声和不读轻声除了表示不同的意思，词性也有不同。

词	读音	词义
对头	[tuei ⁵¹ t'ou ³⁵]	[形容词] (1) 正确；合适：方法～，效率就高。 (2) 正常（多用于否定式）：他的脸色不～，恐怕是病了。 (3) 合得来（多用于否定式）：两个人脾气不～，处不好。
	[tuei ⁵¹ t'ou]	[名词] (1) 仇敌；敌对的方面：冤家～。 (2) 对手。
风头	[fəŋ ⁵⁵ t'ou ³⁵]	[名词] 风的势头。
	[fəŋ ⁵⁵ t'ou]	[名词] (1) 比喻情势：看～行事。 (2) 出头露面，显示个人的表现（含贬义）：～十足。

结合方言的构词来看，新加坡华语社群之所以习惯用“头”缀而不习惯用“子”缀是由于如上边所列举的带“头”缀的词，在闽语、粤语、客家话等南方汉语方言里也都是双音节而且多数也由“头”或“头”的同源语素组成。

	梅县	广州	厦门	潮州	福州
石头	石头 [sak ⁴ t'eu ¹²]	石头 [ʃək ²² t'eu ²¹]	石头 [ts'ioʔ ³² t'au ²⁴]	石口 [tsieʔ ²¹ kou ³⁵]	石头 [suoʔ ³¹ lau ⁵²]
枕头	枕头 [tsəm ³¹ t'eu ¹²]	枕头 [tʃəm ³⁵ t'eu ²¹]	枕头 [tsim ⁵¹ t'au ²⁴]	枕头 [tsim ²⁴ t'au ⁵⁵]	枕头 [tsien ³¹ nau ⁵²]
斧头	斧头 [pu ³¹ t'eu ¹²]	斧头 [fu ³⁵ t'eu ²¹]	斧头 [pɔ ⁵¹ t'au ²⁴]	斧头 [pou ⁵³ t'au ⁵⁵]	斧头 [puo ³¹ lau ⁵²]
锄头	锄头 [kiok ²¹ t'eu ¹²]	锄头 [tʃɔ ²¹ t'eu ²¹]	锄头 [ti ²⁴ t'au ²⁴]	锄头 [tu ²¹³ t'au ⁵⁵]	锄头 [t'y ⁵² lau ⁵²]

北京话里有“儿”化和“儿”尾两种“儿”后缀，北京胡同名“土儿胡同”、“炭儿胡同”、“菊儿胡同”中的“儿”都是自成音节的轻声“儿”尾；“儿”化是“儿”

尾和前一音节的并合。（周一民 2005：149）新加坡华语没有轻声“儿”尾，连带地也就没有儿化。

3.2.1.2 儿化

黄伯荣、廖序东（2002）指出，“儿”和“子”、“头”有所不同；“儿”同词根结合后已不能自成音节，而是使前一音节韵母带有卷舌的色彩。从构词的角度来看，儿化的性质，实际上是属于一种构词的或者构形的内部变形的形态单位。（鲁允中 2001：76）换句话说，儿化所引起的词性或词义的变化是由儿化音节，即词根语素，内部元辅音的变化来表现的。（鲁允中 2001：76）

从词汇方面来说，儿化能区别意义。例如：

词	词义
左手	左边的手。
左首儿	左边（多指座位）：～坐着一位老太太。
针眼	睑腺炎的通称。
针眼儿	被针扎过之后所留下的小孔。
水牛	牛的一种，角粗大弯曲，作新月形，毛灰黑色，暑天喜欢浸在水中，吃青草等。适于水田耕作。
水牛儿	蜗牛。
字	文字：汉～。
字儿	（1）字音：咬～。 （2）字据：立～为证。
信	书信：送～。
信儿	音信；信息：通风报～。
风	跟地面大致平行的空气流动的现象，是由于气压分布不均匀而产生的。
风儿	风声；消息：闻～而动。
长短	是非；好坏：背地里说人～是不应该的。
长短儿	长短的程度：这件衣裳～正合适。

儿化有分化同音词的作用，如：“左手”和“左首儿”。另一方面，同形词也能通过儿化区别词义，如：“针眼、针眼儿、水牛、水牛儿、信、信儿”

等。从上边所列的义位来看，新加坡华语用不同的词形来区分义位，列举如下：

北京话	新加坡华语	词义
左手	左手	左边的手。
左首儿	左边	左边（多指座位）：～坐着一位老太太。
针眼	针眼	睑腺炎的通称。
针眼儿	针孔	被针扎过之后所留下的小孔。
水牛	水牛	牛的一种，角粗大弯曲，作新月形，毛灰黑色，暑天喜欢浸在水中，吃青草等。适于水田耕作。
水牛儿	蜗牛	蜗牛。
字	字	文字：汉～。
字儿	字音 / 字据	（1）字音：咬～。 （2）字据：立～为证。
信	信	书信：送～。
信儿	信息	音信；信息：通风报～。
风	风	跟地面大致平行的空气流动的现象，是由于气压分布不均匀而产生的。
风儿	消息	风声；消息：闻～而动。
长短	是非	是非；好坏：背地里说人～是不应该的。
长短儿	长短	长短的程度：这件衣裳～正合适。

因此，新加坡华语不需要儿化来构词。

从语法方面来说，在北京话里，儿化有改变词性的作用。例如：

词	词性与词义
唱	[动词] 口中发出（乐音）：独～。
唱儿	[名词] 歌曲；唱词：地方小～。
盖	[动词] 由上而下地遮掩；蒙上：～被子。
盖儿	[名词]：器物上部有遮蔽作用的东西：锅～。
亮	[形容词] 光线强：这盏灯不～。
亮儿	[名词] 灯火：拿个～来。
尖	[形容词] 末端细小；尖锐：把铅笔削～了。
尖儿	[名词] 出类拔萃的人或物品：～货。
卷	[动词] 把东西弯转裹成圆筒形：把竹帘子～起来。
卷儿	[量词] 用于成卷儿的东西：一～纸。
热闹	[形容词] （景象）繁盛活跃：～的大街。
热闹儿	[名词] 热闹的景象：他只顾着瞧～，忘了回家了。

新加坡华语不用儿化作为区别词性的语法手段。从以上所举的词来看，在新加坡华语里，作动词的“卷”和作量词的“卷”同形，语言使用者一般借由语境辨别词性与意义。又如：“盖”在新加坡华语里可以作动词，也可以作名词，词性和语义凭借语境来区分。另一方面，新加坡华语用不同的词形来区别词性，譬如用“灯”或“火”来指“灯火”，不说“亮儿”。

儿化实际上是一个地方性的特征。（陈重瑜 1993：9）根据《汉语方言词汇》，在北京、济南、沈阳、西安、成都、昆明、合肥、扬州八个北方话方言点，只有北京和西安是说“一朵花儿”，其他六个方言点都说“一朵花”。陈建民（1984：17）谈及普通话时指出，“文化低的老年人儿化多，文化高的和年青人儿化少……年青人受书面语的影响，大量可儿化可不儿化的词就不儿化了”。换言之，儿化在普通话里也不是必然存在的。新加坡华语没有儿化，

还因为这个地方的人说话没有儿化的习惯。之所以不用儿化，跟这个语言社群的认知与思维模式相关。王力《汉语史稿》（1958：229）指出，粤语、闽语没有儿化词。在新加坡华语社群中，母语为闽语和粤语的成人占了绝大多数。看来，方言的模式在华语的形成过程中起了作用。

3.2.2 词汇语义：共词化（colexification）

这一节，我们讨论新加坡华语与普通话共有但在语义上有所差异的词汇形式。我们在以普通话词汇（普通话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即以广大北方地区普遍通行的词汇为准）作为参照系的基础上提出新加坡华语的共词化（colexification）现象。普通话词义以《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为基准，新加坡华语的词义则参考《全球华语词典》中的释义。

共词化指用一个词位或构式表达多个不同但有联系的意义。（Viberg 1984, 2002, 2005 等；François 2008）如 Viberg（1984, 2005）发现，英语的 know 可以表示社会意义的认知 know a person、纯粹认知 know a fact、心理能力 know a language、技能 know how to do something。Viberg 指出，将上述几种意义共词化是认知类基本动词的大趋势。

下面，我们分别举名词、动词、形容词的例子来说明新加坡华语的共词化现象。

（一）名词

（A）教室 / 课室、班

新加坡华人习惯用“[pan⁵⁵]班”指称“学校里进行教学的房间”。例如：

64. 时间要到了，我差不多应该回去班了。（日常对话）

65. 正在走向班的时候，我经过了我四年级的班。（同上）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班”作名词有下列义项。

[名词]

I. 为了工作或学习等目的而变成的组织。

大～ | 作业～ | 进修～

II. 军队编制的最基层的单位，一般隶属于排。

虽然在具体造型上“教室 / 课室”指具体的教学用的房间而“班”指的是较为抽象的按照一定的宗旨和系统建立起来的集体，但由于“教室 / 课室”与“班”的概念有共通点，即皆与“教学”或“学习”相关，新加坡华语社群因此将相关联的语义范畴联系起来，即对概念进行整合，忽略具体造型上的差异，把语言表层的词形简化或等同对待。也就是说，在新加坡华语社群的认知里，“班”可以指具体的教学用的房间，也可以指学习组织；既可以说“回班上课”，也可以说“我要去上舞蹈班”。

(B) 房子、屋子、家

新加坡华人用“家”指称“家庭”及“家庭的住所”。指称“供人居住的建筑物”时，新加坡华人也用“家”，例如：

66. 他在 Punggol 买了一间家。（日常对话）

在普通话里，“房子”指称“有墙、顶、门、窗，供人居住或做其他用途的建筑物”，“家”指“家庭；人家”及“家庭的住所”而言。“房子”和“家”共同的概念要素为[住所]，区别在于“房子”是指实体的建筑物，且不仅限于供人居住，还能作为其他用途；“家”所指的是抽象的家庭的住所。或许在新加坡华人的观念及认知里，人居住的地方就是家，因此，不论是具体的建筑还是抽象的家庭都一律称作“家”。

另外，即使不用“家”指称“供人居住的建筑物”，新加坡华人也极少说“房子”，而更常使用“屋”或“屋子”。例如：

67. 你什么时候要买屋？（日常对话）

68. 这一区有很多刚刚才建好的屋子。（同上）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屋子”指“房子内隔成的各个部分”，即房间。概念上，“屋子”和“房子”都是实体建筑，惟“屋子”内附于“房子”，是“房子”的子集。但在新加坡华人的认知里，“屋子”即是由一间间房间所组成的供人居住的建筑物。

（二）动词

（A）咬、嚼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咬”和“嚼”作动词有下列义项：

咬：上下牙齿用力对着（大多为了夹物体或使物体的一部分从整体分离）。例如：～了一口苹果。

嚼：上下牙齿磨碎食物。例如：细～慢咽。

“咬”和“嚼”共同的概念要素为动力皆来自上下牙齿的运动，区别在于“嚼”的动作方式是将食物磨碎，故结果是食物碎烂，而“咬”是用力使整体的一部分脱离，结果不一定导致物体碎烂，要使物体碎烂还需经过“嚼”的过程。

在新加坡华人的认知里，“咬”包含将食物磨碎的过程，因此，在饮食活动中，新加坡华人用“咬”一个词位表示“上下牙齿用力对着，使食物的一部分从整体分离，并且磨碎食物”。也就是说，以牙齿为工具，[用力分解物体]与[磨碎食物]两个义素在新加坡华语里共用一个词位——“咬”。

（B）绑、系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绑”和“系”作动词表达下列意义：

绑：用绳、带等缠绕或捆扎。例：把行李～紧一点儿。

系：打结。例：～鞋带。

“绑”、“系”共同的概念要素是：

- （1）驱动者：人
- （2）工具₁：手
- （3）工具₂：绳子、带子等

“绑”和“系”的区别性概念是：“绑”的动作方式为缠绕，即将条状物回旋地束缚在别的物体上，其受事为物体，而“系”的动作方式为在条状物上打疙瘩，其受事是绳子、带子等，即工具本身。在新加坡华人的认知里，“绑”可以是缠绕，也可以是打结。也就是说，新加坡华人用“绑”一个词位表示[缠绕]和[打结]两种动作方式，即将[缠绕]和[打结]两个义素共词化。此外，新加坡华语也用“绑”比喻被事物束缚或拖累（《全球华语词典》2010：36）。例如：

69. 现在年轻人只要一买屋子，就会给贷款绑住一辈子。（日常对话）

（C）付、缴、还[huan³⁵]

新加坡华语的动词“还”涵盖了普通话“付”、“缴”、“还[xuan³⁵]”三个动词的语义范畴，即在新加坡华语里，动词“还”除了表示“归还”，还表示“付（款）”及“缴（费）”（《全球华语词典》2010：381）。例如：

70. 记得去图书馆还书。（日常对话）

71. 我昨天买东西忘记还钱。（同上）

72. 别忘了去还水电费。（同上）

例（70），“还”表示“归还”；例（71），“还”表示“付款”，而例（72），“还”表示“缴交（费用）”。

在现代汉语普通话里，表示“归还”义的动词“还”隐含[借]这个事件，即其语义域包含[+借]，意思是“借了以后归还”，而“付”、“缴”表示把事物从一方交到另一方的动作事件，其中不经历“借”的过程，即其语义域[-借]。新加坡华语忽略了语义上的细微差异，用“还[huan³⁵]”这个词位涵盖[+借，+位移（客体）]和[-借，+位移（客体）]两种语义结构。

（三）形容词

（A）斜、陡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斜”和“陡”作形容词有下列义项：

斜：跟平面或直线既不平行也不垂直的。例：～线。

陡：坡度很大，近于垂直。例：～坡。

“斜”和“陡”共同的概念要素是：[跟平面不平行]，二者的区别性概念是：“斜”跟平面既不平行也不垂直；“陡”跟平面近于垂直，且“陡”专用于形容地形。

在普通话里，“陡坡”指和水平面所成角度大的地面，即坡度大的坡，“斜坡”指高度逐渐降低的地面；从高度上来说，前者高度增加，后者高度降低。但在新加坡华人的认知里，“斜坡”既指高度逐渐降低的地面，也指和水平面所成角度大的地面。换言之，对新加坡华人而言，“斜坡”既是“陡坡”，反之亦然。因此，新加坡华人选择语义域较广，即不限于形容地形的词位“斜”，涵盖[跟平面既不平行也不垂直的]以及[近于垂直的]两个义素。譬如：新加坡华人习惯说“山路很斜”，不说“山路很陡”。

（B）热、烫、烧

根据《全球华语词典》（2010：727），“烧”作形容词表示“热；烫”。例如：

73. 有烧水吗？（日常对话）

74. 这水好烧。（同上）

75. 他的脸好烧。（同上）

例（73）-（75）的“烧水”、“水好烧”、“脸好烧”在普通话里分别是“热水”、“水好烫”、“脸好烫”。“烧”和“热”、“烫”在普通话里属于不同的范畴。“热”和“烫”可以作形容词，但“烧”不行。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热”、“烫”、“烧”的语义如下：

热：[形容词] 温度高；感觉温度高（跟“冷”相对）。例：～水。

烫：[形容词] 物体温度高。例：这水太～。

烧：[动词] 加热或接触某些化学药品、放射性物质等使物体起变化。例：～饭。

[名词] 比正常体温高的体温。例：～退了。

“热”、“烫”、“烧”共同的概念要素为[温度高]，区别在于“热”和“烫”表示一种状态，而“烧”作动词的概念域较广，其概念要素还包括：

- (1) 驱动者：人
- (2) 主体：物
- (3) 方式：加热
- (4) 结果₁：物体温度升高
- (5) 结果₂：物体起变化

“烧”作动词除了表示“温度高”的状态，也说明结果并交代了动作的方式。因此，新加坡华语选择概念域较广的词位——“烧”以涵盖“热”和“烫”两个相近的概念。

3.3 句法

由于名词、动词、形容词是实词类中的主要词类，所以本节将着重讨论由名词、动词、形容词组成的句法结构。

3.3.1 名词与名词结构

本节主要讨论重叠式名词及其句法功能以及由名词与名量词所组成的结构及其句法表现。

3.3.1.1 重叠式名词

在新加坡华语里，有些单音节名词，尤其是兼有量词用法的，可以重叠。例如：

人人、餐餐、天天、年年

这种重叠的语法意义为“每”，即 AA 等于“每 A”。例如：

- 76. 如果人人都像你这样想，就天下太平了。（日常对话）
- 77. 我哪里有机会餐餐给他吃好的？（日常对话）
- 78. 我的老板天天都在外面，很少进 office 的。（日常对话）
- 79. 年年都送一样的东西，不会显咩？（日常对话）

例（76）-（79）中的“人人”、“餐餐”、“天天”、“年年”分别表示“每个人”、“每餐”、“每天”、“每年”。这种重叠式虽能产，但不是所有用作量词的名词都能重叠。例如：“月”、“班”、“组”、“车”、“碗”、“碟”等就不照此形式重叠。

有些相类的单音节名词可以按 AABB 式重叠，重叠后表示复数，其语法意义为“所有 AB”或“AB”之类。例如：

瓶瓶罐罐、边边角角、前前后后、上上下下

这种重叠式数量有限，例如“碗”和“碟”、“杯”和“盘”、“盆”和“罐”、“桌”和“椅”就不能按此形式重叠。

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华语有一类重叠式名词主要构成修饰性词语，表示对事物的描述。例如：

80. 生病不要吃这样油，我煮一碗水水的粥给你。（日常对话）

81. 这个芝麻糊应该是放太多水，水水的。（同上）

82. 我的头发只要一天没有洗就油油了。（同上）

83. 桌上那张油油的纸是谁放的？（同上）

84. 他的声音沙沙的。（同上）

85. 这边灰尘很多，地上扫了还是沙沙。（同上）

86. 他的店在这条路尾尾。（同上）

87. 走到尾尾就是码头了。（同上）

水水	水分很多的样子
油油	被油弄脏的样子
沙沙	（1）声音低沉而不圆润 （2）踩着沙子的样子
尾尾	位置很靠后

例（81）、（82）、（84）及（85）的“水水”、“油油”、“沙沙”在句子中作谓语。例（80）的“水水”作定语，修饰宾语“粥”；例（83）的“油油”也作

定语，修饰主语“纸”。例（86）和（87）的“尾尾”则是“在”和“走到”的宾语。这种形式的重叠不是任意的，例如“火”、“风”、“泥”、“汤”、“雨”、“手”、“脚”等就不能照此形式重叠。

*火火、风风、泥泥、汤汤、雨雨、手手、脚脚

3.3.1.2 量名结构

名词结构（或名词短语）的简单定义为：名词与其修饰语一起组成的结构。一般而言，与名词结构相关的功能性成分包括冠词、指示代词、量词、定语助词、复数标记等。本节讨论的功能性成分只涉及量词。

Chierchia（1998）、Borer（2005）等指出，汉语的名词从本质来说是不可数名词，因此，当名词进入句子层面充当论元时，需要量词对其进行切分（individuation），使其成为可数名词。（参照张庆文、邓思颖 2014）因此，汉语的名词性成分在充当论元时通常会与量词一起出现，例如：“一滴水”、“一架飞机”、“一句话”等。（参照张庆文、邓思颖 2014）

除了一般的（数）量名结构，新加坡华语有一类量名结构能受形容词“大”和“小”修饰。这类结构一般作谓语，且若语境能清楚带出所指，则量名结构中的名词可以省略。例如：

88. 这间房很大间。（日常对话）

89. 这样小件怎样穿？（同上）

90. 每次都给很小盘，吃不饱。（同上）

91. 我哥哥很大只，我弟弟又太小只。（同上）

例（88）“大间”指房间大；例（89）“小件”说的是衣服尺码小；例（90）“小盘”指食物分量少；例（91）的“大只”、“小只”则指人或动物的体格大小。

名词不省略时，[形容词+量词]作定语修饰名词，而所构成的形量名结构一般充当句子的主语或宾语。例如：

92. 你这样大个人怕一只壁虎？！（日常对话）

93. 我从来没有想过会住这样大间屋子。（同上）

修饰量词的形容词还可重叠，重叠后的形容词与量词成为名词的定语。若名词省略，则重叠的形容词与量词组成名词结构并充当主语或宾语。

例如：

94. 我要订做大大张的桌子。（日常对话）

95. 苹果要选大大粒的才会甜。（同上）

96. 这样小小间要租五百块？（同上）

97. 小小本的到现在好像还买得到。（新加坡口述历史）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形容词重叠与否，只有表程度的形容词“大”和“小”能出现在以上所述的形量名结构中。此外，也不是所有的名量词能组成这类形量名结构。我们参照刘子平（2013）编著的《汉语量词大词典》中所收录的量词，整理出那些能与形容词和名词搭配组成形量名结构的量词：

把、班、包、杯、本、串、滴、点、叠、堆、朵、份、封、幅、个、罐、锅、盒、架、间、件、卷、棵、口、块、粒、辆、盘、片、瓶、圈、声、条、桶、团、尾、样、叶、张、只、支、桌

也就是说，在这类结构中，形容词与量词的搭配不是任意的，如：能说“牛比羊大只”、“马很大只”，但“牛比羊大头”、“马很大匹”就不合法。按以上所列举的量词来看，能与形容词“大”、“小”和名词搭配组成形量名结构的主要是那些为形象性强的事物分类的量词。譬如：“支”用于杆状的东西，语言使用者从客观的角度完全可以判断如“笔”、“枪”等杆状物体的大小。又如“只”用于动物，动物的大小可以通过其形象来判断；“间”义为房屋的最小单位，语言使用者可以通过对空间范围的测量与视觉感知来判断房屋的大小。以上解释为我们对语料进行观察后所得出的看法，或非绝对的事实。

3.3.2 动词与动词结构

本节主要讨论两类动词结构：（一）由动词及其后接的补充成分所构成的动补结构；（二）双宾结构。

3.3.2.1 动补结构

动补结构是汉语语法结构的一个十分重要而显著的特点。根据梁银峰（2006）的定义，动补结构是由两个连用的动词且其中第二个动词补充说明第一个动词的结果或趋向等所构成的动补组合。本节讨论新加坡华语动补结构其中的四种形式——〔动词+掉〕、〔动词+去〕 / 〔动词+补语+去〕、〔动词+回〕和〔动词+到+补语〕。

（一）动词+掉

关于〔动词+掉〕结构中“掉”的语法意义，学者们持不同的看法。Chao（1968）将“掉”视为表示方向和位移的补语。Li & Thompson（1981）将〔动词+掉〕结构归为动结式复合词底下的动相类。叶经韬（1986）认为〔动词+掉〕只能表示动作对象或动作本身的消失或位移。Cheng（1989）认为“掉”是结果补语，但其后来的研究（1997）指“掉”为动相标记。周磊磊（1999）指出，〔动词+掉〕所表示的语法意义应当是动作过程的完成，其中包括动结式和动趋式两个小类。Packard（2000）称〔动词+掉〕表示动作过程的实现和完成；朴奎容（2000）指出，〔动词+掉〕结构中“掉”的词汇意义是“消失”，如：“烧掉、倒掉、抹掉、删掉、剪掉”等，其作为补语的语法意义则表示动作的结果，且“掉”作补语表示客体受到动作作用后从眼下消失，而不表示从现实中消失。刘月华（2001）把“掉”的语法意义分为两类，一类表示脱离、脱落，例如：“小心点，别把他的博士帽碰掉了。”，另一类表示消失，例如：“我们要想办法吃掉敌人，否则就会被敌人吃掉。”。刑贺（2005）认为，跟着及物动词的“掉”表示去除，跟着不及物动词的“掉”表示完成。曹晋（2005）指“掉”作为一个补语性成分和它前面的词素一起构成述结式，可以表示脱离、脱落，也可以表示消失。刘焱（2007）把“掉”的语法意

义分为三类：“掉₁”表示客体脱离，如：“家珍脱掉了旗袍，也和我一样穿上粗布衣服。”；“掉₂”表示客体消失，如：“花费了几代人心血建造的塔房就这样一把火都烧掉了。”；“掉₃”表示事件完成、状态变化，如：“他答应母亲2006年一定把房子买掉，把婚结掉，把孩子生掉。”。陈洪磊（2009）认为〔动词+掉〕中“掉”的语法意义大致包括三类：去除类、离开类、已然类。去除表示事物或客体脱离了某一基体或某个范围，表示去除性结果义的动词都是自主的及物动词，都是施事主动地施动于受事，使之产生“去除”的结果，故这类动词都带有〔+自主〕〔+去除〕的语义特征，譬如：“打掉、拔掉、脱掉、擦掉、割掉、剪掉”等。离开表示主体离开了某一位置，即空间位置的变化和移动，表示离开的〔动词+掉〕结构中的动词都是一价自主动词，其后不能带受事宾语，这类动词都含有〔+自主〕〔+离开〕的语义特征，如：“跑掉、溜掉、逃掉、飞掉、开溜掉、逃跑掉”等。已然主要是指某种状态变化的完成，表示状态变化完成义的〔动词+掉〕结构中的动词都是非自主的不及物动词，而且动词本身带有很强的消极义，故这类动词的语义特征为〔-自主〕〔+消极义〕，如：“塌掉、瞎掉、烂掉、谢掉、枯萎掉、坏掉”等。

工具书方面，吕叔湘（1999）《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指出，“掉”可以用在动词后作动结式的第二成分，中间可插入“得”或“不”。“掉”用在及物动词后，表示离开，如：“走掉、跑掉、飞掉、死掉、蒸发掉”等。房玉清（1992）《实用汉语语法》指〔动词+掉〕结构中的“掉”表示去除或离开、消失。《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则指“掉”用在某些动词后，表示动作的结果。

以上为学者和工具书对现代汉语〔动词+掉〕结构中“掉”的语法意义所作的诠释及分析。H-W. Cheng（2004）在探讨台湾国语中“掉”出现在动词后面时的语意内涵与语法地位的研究中指出，当“掉”身为补语时，它的意思为“被往下移除”；身为动相标志时，意思为“被移除”；身为动貌标志时，则标

示起始意。H-W. Cheng 还指出,“掉”与静态动词、瞬间动词及达成动词构成达成复合动词,与动作动词及完成动词则构成完成复合动词。总的来说,在现代汉语和台湾国语里,“掉”作补语表示结果,但结果分三类,一类结果发生位移,一类结果表示去除或消失,还有一类结果表示状态发生变化且状态完成。

在新加坡华语里,与“掉”搭配得最多的是他动词。²²例如:

98. 那时候是亚答屋,有一次着火烧掉。(新加坡口述历史)

99. 在日本时代,就便宜卖掉。(同上)

100. 结果被华人杀掉。(同上)

101. 大概不久要拆掉了。(同上)

102. 还把自己变不见掉了。(电视对白)

103. 我们需要把她的头发剃掉才能敷药。(同上)

104. 怀了之后堕掉。(同上)

105. 你画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有什么用?你跟我擦掉!(同上)

106. 你这样会抢掉别人的风头。(日常对话)

107. 我在等你的时候读掉了一份报纸。(同上)

例(102)的“不见掉”意即消失不见,这里用了双重补语,“不见”已经能表示消失,“掉”似加强了消失的意味。例(104)的“堕掉”是堕胎,也就是把孩子拿掉的意思。从以上的例子来看,新加坡华语依赖于动词后的“掉”来表示去除、消失义。

我们以“掉”为关键词在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研究所“北京口语语料”进行搜索,所得 92 条用例中,除去 45 条“掉”作动词的例子,“掉”主要与动词“忘、卖、烂、扔、摘、埋、失、辞、割、损失、打、去、甩、克服、退、删、扒、砍、毁、剁、冻、革、处理、花_[花费]、改、剪”搭配组成动补结构(如例 108-133),没有发现如例(134)-(143)所示的新加坡华

²² 他动词即主体为动作的发出者、动作涉及客体的动词,如:核对、拿、吃、重视、研究。(鲁川主编 1994《动词大词典(人机通用)》)

语里动词“抱、拐、采、借、禁、捐、捞、挤、偷、挖”与“掉”搭配而表示去除、消失的〔动词+掉〕结构的用例。按语料库搜索所得结果，在北京话里，与“掉”搭配组成动补结构的动词必须带有“去除、消失”义，新加坡华语里与“掉”搭配的动词没有这条规则限制。

取自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研究所“北京口语语料”的例子：

108.反正不能忘掉阶级反正.....

109. 她买房子时候儿啊，是卖掉我父亲的遗产之后买的这房子。

110. 哈，执行上，作风上，官僚作风上，但是，是不是都是黑帮啊，烂掉了，我当时就表了这么个态。

111. 我这自己就把工作就扔掉了。

112.就是扫盲啊，要摘掉文盲帽子。

113. 就是人死了以后，尽快地埋掉.....

114. 有点儿失掉了咱们民族尊严这种性质。

115.是剥削这样儿的，就把老太太呢，就给辞掉了。

116. 那个地方呢又是那个陈伯达搞的割掉资本主义尾巴这个试点的一个公社.....

117. 国家给这点的什么，你能叫他吃不上，在你手里头给损失掉.....

118.有些制度已经也都，也都给打掉了哈.....

119. 它上面儿包着好多沙子，把那沙子去掉它这铁件儿才能露出来。

120. 干着干着，就，就，就抓这钱来了，把工作就给甩掉了。

121. 只要你不灰心，是哇，这个能动地去做，他总是能够克服掉的。

122. 那白色且也退不掉呢.....

123. 每年，差不多都有新的教材补充进来，不好的那个删掉了。

124. 有条件的地方儿应当恢复，扒扒掉了，还重新盖这种房。

125. 什么那个保险柜呀，文件柜呀就，那会儿也就随之砍掉了。

126.自己头脑这个不冷静，把人家呢，一个挺好的同志打死了，自己也毁掉了自己的一生。

127.逮着这样儿人，我建议都剃掉坏可气，相当地那什么。

128.四十度，你能让他冻着去，帽子不戴，那真冻掉耳朵儿。

129.备考高中的时候呢，呃，来了这么一场“革命”，把我们的学校呢也革掉了。

130.除非让他们那些烂的处理掉.....

131.事情一过去了，很多人又后悔：把钱全花掉了。

132.吐痰这种活动吧，还得还得抓紧，要不吧也不能彻底地那个什么，改掉这个习惯。

133.就是兔子还活着的时候儿吧，然后拿一个剪子把头都剪掉了.....

新加坡华语的用例：

134.他的孩子两岁的时候给人家抱掉，到现在都还找不到。（日常对话）

135.牵住他，等下给人家拐掉你才知道！（同上）

136.我的木瓜不懂给谁采掉了。（同上）

137.你要的书已经给人家借掉了。（同上）

138.听说这部片因为有政治敏感的内容，所以被禁掉了。（同上）

139.这些书你不要的话就捐掉它啦。（同上）

140.汤上面的那些葱帮我捞掉。（同上）

141.这几粒痘痘做么一直挤不掉的？（同上）

142.我的 handphone 应该是被偷掉了。（同上）

143.他吃包是把里面的料挖掉，只吃皮。（同上）

以上例句中的“掉”都表示事物或客体脱离某一基体或某个范围，如例（134）和（135）“孩子给人家抱掉、拐掉”意思是孩子被别人给抱走、拐走，与父母脱离；又如例（137）的“书给人家借掉”意思是书被借走了。值得注意的是，这类表示去除、消失的“掉”其动作若同时包含位移变化，则

[动词+掉]可与[动词+去]互换。譬如例(134)和(135)“孩子给人家抱掉、拐掉”，“孩子”这个客体除了与父母脱离，客体也被移动而空间位置发生变化，因此，“孩子给人家抱掉、拐掉”也能说“孩子给人家抱去、拐去”。其他如“变不见掉”(102)、“采掉”(136)、“借掉”(137)、“偷掉”(142)因动作也导致空间位置发生变化与移动，所以也能说成“变不见去”、“采去”、“借去”、“偷去”。这也说明，[动词+去]结构中的“去”除了表示空间位置的移动，也表示脱离。

除了与他动词搭配，“掉”也与自动词搭配组成[动词+掉]结构。²³例如：

144.你连看见我都吓到跑掉。(电视对白)

145.今天在银行就等掉我两个钟头。(日常对话)

146.他就这样走掉了啊？也不会讲一声。(同上)

147.球滚掉了嘛，快点去追！(同上)

148.我刚才不小心睡掉。(同上)

149.那个老师很过分，她直接跳掉我的阿 boy，叫后面的同学回答。

(同上)

150.不要假假，你以为你闪得掉啊？(同上)

例(145)“等掉两个钟头”意思是耗了两个小时等候。例(148)“睡掉”的“掉”表示状态发生变化，从清醒的状态到睡着的状态，结果是睡着。其他例句中的“掉”表示主体离开原来所在的位置，空间位置发生变化和移动，如例(147)“球滚掉”表示“球”滚动而位置改变，例(149)跳过一人到另一人，也是一种位置的移动。

此外，内动词也能与“掉”搭配组成[动词+掉]结构。²⁴例如：

151.这次的云吞没有包好，一下水去煮就散掉了。(日常对话)

²³ 自动词即主体为动作的发出者、动作不涉及客体的动词，如：“走、跑、暴走、休息、毕业”等。(鲁川主编 1994《动词大词典(人机通用)》)

²⁴ 内动词即主体不是动作的发出者、动作不涉及客体的动词，如：“死、塌”等。(鲁川主编 1994《动词大词典(人机通用)》)

- 152.东西掉掉了。（同上）
- 153.我找不到皮包，应该是跌掉了。（同上）
- 154.煤气炉的火灭掉了。（同上）
- 155.杂牌就是这样，你看，皮脱掉了。（同上）
- 156.我饿到要晕掉了。（同上）
- 157.本来美美的，给你挤到皱掉了。（同上）
- 158.我的镜片花掉了。（同上）
- 159.先讲啊，你醉掉我是没有办法扛你回去的啊！（同上）

例（152）和（153）“掉掉”和“跌掉”表示物体由上往下掉落，除了脱离基体，也发生位移。其他例句中的“掉”表示状态变化，如例（157）物体原来是完好的，因受到挤压而外表变得皱巴巴；又如例（159），“掉”标示从清醒到喝醉的状态。其他能与“掉”搭配的内动词还有“变、差、倒、断、滑、裂、漏（东西从孔或缝中滴下，透出或掉出）、飘、漂、破、少、失传、输、死、牺牲、瞎”。就如陈洪磊（2009）所述，与“掉”搭配组成〔动词+掉〕结构的非自主动词（内动词属非自主动词）带有一定程度的消极义，“输”能与“掉”搭配成〔动词+掉〕结构，“赢”就不能进入此种结构。

最后，由外动词组成的〔动词+掉〕结构，例如：²⁵

- 160.鞋底开掉了。（日常对话）
- 161.帮我看一下有没有漏掉什么东西。（同上）
- 162.镜子缺掉了一个角。（同上）
- 163.那个人把我的东西撞掉也没有讲 sorry。（同上）

例（163）“撞掉”的“掉”表示物体脱离原来的位置。例（161）“漏掉”的意思是遗漏，在此意义上“掉”表示消失。其他例句中的“掉”标示状态变化，如例（160）“掉”标示鞋底从密实到裂开的状态变化。能组成〔动词+掉〕结构的其他外动词有“失、忘、遗失”，也都带有消极义。

²⁵ 外动词即主体不是动作的发出者、动作涉及客体的动词，如：“碰见、知道、丢失、收到”等。（鲁川主编 1994《动词大词典（人机通用）》）

综上，新加坡华语〔动词+掉〕结构中“掉”的语法意义多样，主要可归纳为四类：表示去除、消失；表示空间位置的变化和移动；标示状态变化；标示动作事件完成。最能与“掉”搭配组成〔动词+掉〕结构的是他动词，能进入〔动词+掉〕结构的自动词有限。我们从观察语料发现，组成〔动词+掉〕结构的内动词和外动词都带有一定程度的消极义。

（二）动词+去 / 动词+补语+去

在新加坡华语里，“去”除了出现在动词后作趋向补语，例如：

164. 后来那个报馆的事情被抓去。（新加坡口述历史）

165. 我本来是跟他比的，可是她赢不过我，就换去她。（电视对白）

以及构成表位移兼表脱离的〔动词+去〕，如上面提到的“抱去、拐去、变不见去、采去、借去、偷去”，新加坡华语还有一类结构是“去”出现在动词及其由形容词充当的补语之后，即〔动词+补语+去〕。例如：

166. 那个时候刚刚给炸弹炸坏去。（新加坡口述历史）

167. 我本来都弄好好的，你又跟我弄乱去。（日常对话）

168. 整个变弯去了。（同上）

169. 给你煮到烂去了啦！（同上）

170. 香蕉放到太熟去了。（同上）

171. 菜炒到黑去了。（同上）

从以上例句来看，动词“炸、弄、变、煮、放、炒”之后的补语“坏、乱、弯、烂、熟、黑”表示由于动作而呈现出来的状态，“去”出现在这些状态补语之后标示状态实现。譬如：“炸坏去”表示“炸”的动作导致“坏”的状态实现。“去”一般出现在表示消极或负面状态的动补结构之后，其作用类似动貌标志。

此外，“去”也能直接作形容词谓语的补语。例如：

172. 太多天没有下雨，那个缸的水都干去了。（日常对话）

173. 你讲到他的脸都红去了。（同上）

174.你好像胖去了，有吗？（同上）

175.肮脏去了啦，快点拿起来！（同上）

176.早一点来就好，慢一步去了。（同上）

跟着形容词谓语的“去”一般也表示消极或负面状态。譬如以上例句中的“水干了、胖了、肮脏了、慢了”至少都不带有正面及乐观含义。“肮脏”、“旧”等带有消极义的形容词能与“去”搭配组成谓补结构，“清洁、新”等带有积极义的形容词就不行。

*清洁去

*新去

*美去

（三）动词+回

新加坡华语有一类以“回”作补语的动补结构。例如：

177.你叫他给我打回啦！（日常对话）

178.乖，把玩具还回给姐姐。（同上）

179.钱他给回我了。（同上）

180.我还是买回一样的牌子。（同上）

181.那你就答应我不要轻易放弃，去找回思思。（电视对白）

182.补假补回给你。（新加坡口述历史）

从以上例句来看，〔动词+回〕结构中的“回”表示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回”表示动作事件的路径，或者更具体地说，“回”的语义结构包含〔+方向〕。譬如：例（177）的“打回”表示还手，是将“打”的动作报复在先前做出“打”的动作的人身上，即动作方向逆转；又如例（178）“还回”，位移事件的客体首先由 A 转移到 B，后又从 B 回到 A，动作方向也发生逆转，而这个方向性由“回”表示。“还”的语义结构原来就包含〔+方向〕，“还回”结构中的“回”表示动作方向逆转实际上是将“还”的部分底层概念，即〔+方向〕，

形式化。另一方面，“回”还带有“重复”的意义。如：例（180）“买回一样的牌子”，意即重复购买一个牌子的东西，这里的“回”表示事件或状态重复进行。

北京话也有〔动词+回〕结构，“回”作趋向补语，表示人或事物随动作从别处到原处。例如：

183.可是我们这个呢，要，不知道要拿出多少份儿去，才能收回这么多钱。（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研究所“北京口语语料”）

184.挂上钩后，他从广州贩，贩运，坐飞机，贩运回北京。（同上）

185.我呢，这里，走这班呢，就是替保车。就是哪个车保养，我给开回场子，完了下回我还开这车。（同上）

北京话的〔动词+回〕结构不表示动作反过来作用在先前做出动作的人身上，如：新加坡华语的“打回”，也不表示事件或状态重复，如：新加坡华语的“买回”。

根据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研究所“北京口语语料”，北京话更常用〔动词+回来/回去〕表示人或事物随动作从别处到原处。例如：

186.不给保存取回来吧，也没地儿搁就取回来跟家里给存着。（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研究所“北京口语语料”）

187.买走了吧，回家以后还不合适，还得拿回来。（同上）

188.但是呢，我自己呢有一个迫切心情哈，就是愿意呢，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同上）

189.车你拉出去了，你不给他拉回来他没办法，是不是，所以也得有铺保。（同上）

190.最后呢，我就把那个差的钱呢，就给人补回去了。

191.是老北京人，就在嗯，在那个东城区那边儿住，还没有提出说的把人运回去埋了。（同上）

（四）动词+到+补语

在新加坡华语里，“到”作动相补语表示动作状态实现或完成。例如：

192.没有改变到。（电视对白）

193.可能半年后才录取到。（同上）

194.没有给你看到。（同上）

195.现在是发生在学校外面，我们要管也管不到啊！（同上）

196.三百块分到来，一人连五十块都拿不到啦！（同上）

197.被你感动到。（同上）

198.根本没有进步到。（同上）

例（197）“感动到”中的“到”标示感动状态实现。“到”也出现在否定式，表示动作状态没有实现，如：例（195）和（198）“管不到”和“没有进步到”。

此外，[动词+到]后边能带宾语。例如：

199.最近我发现到一个很 cool 的 website。（电视对白）

200.你就赢到他们的全部啦！（同上）

201.还以为付出爱心就可以感动到他们。（同上）

202.吓到我。（同上）

203.都是你啦，害到我输！（同上）

例（199）-（203）的动词“发现、赢、感动、吓、害”在北京话里可直接带宾语，“到”不出现。这一点说明以上例句中“到”的功能不是作为介词引介宾语，而是附着于动词的一个形式。再者，北京话不说“赢到”。北京话表示“取得”的词组是“赢得”，如：“赢得时间”、“赢得信任与支持”。根据吕叔湘（1999）《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动词“害”表示使损害，可带“了、过”，必带名词宾语；“害”也可用作兼语，例如：

[害+得+小句]

204.害得我们全家不得安宁。

就“发现到、赢到、感动到、吓到、害到”这些能带宾语的〔动词+到〕结构的用例来说，〔动词+到〕结构似乎是新加坡华语里一个已经成形的凝固结构。

除了带宾语，〔动词+到〕还能接状态补语和程度补语。先说状态补语。状态补语表示由于动作、性状而呈现出来的状态。〔动词+到+状态补语〕的用例有：

205.他自己讲到很投入，都不管下面的人有没有在听。（日常对话）

206.他气到好几个星期不说话、不讲话、不交往。（新加坡口述历史）

207.吓到屁滚尿流。（电视对白）

208.整天吵架，吵到乱。（同上）

209.做到乱七八糟，跟没有交有什么两样？（同上）

210.驾到比乌龟还要慢。（同上）

例（205）-（210）的动词和状态补语之间有“到”作为标记，引入补语。引入状态补语的标记有时是“得”。例如：

211.刚刚那阵雨来得很快，我都来不及躲。（日常对话）

212.他经常把问题想得很简单。（同上）

也就是说，在新加坡华语里，说明动作状态的动补结构有两种形式——〔动词+到+状态补语〕及〔动词+得+状态补语〕。然而，两种形式所表达的语义有时不完全一致。比较下面几句话：

213.这件衣给你穿到很好看。

214.*这件衣给你穿得很好看。

215.你今天穿得很好看。

216.你今天穿到很好看。

217.吵架吵到乱。

218.*吵架吵得乱。

例（213）和（217）动词“穿”、“吵”和补语“很好看”、“乱”之间的“到”有表示程度的意味。“穿到很好看”除了说衣服穿在你身上呈现好看的状态，也表示衣服穿在你身上达到了很好看的程度或者说你的搭配方式让一件原本看起来普普通通的衣服上升至很好看的程度。“吵到乱”除了说明由吵导致乱的状态，也表示吵到了乱的程度。由于例（213）和（217）兼表达状态所达到的程度，因此借用“到”所含的“到达”义来形象化状态以及状态所达至的程度，“得”起不到这样的效果。至于例（215）和（216），“穿得很好看”表示一种好看的状态，而“穿到很好看”除了表示好看的状态，也表示今天的穿戴达到了好看的程度。

程度补语表示动作、性状达到极点或很高的程度。〔动词+到〕接程度补语的用例有：

219. 只有笨蛋才要上厕所，臭到要死。（电视对白）

220. 饱到你不能动。（同上）

比较下面几句话：

221. 饱到不能动。

222. 饱得不能动。

223. 气到爆。

224. *气得爆。

225. 笨到没有人有。

226. *笨得没有人有。

例（221）“饱到不能动”说明“饱”的状态已经到了不能动的程度，而“饱得不能动”呈现的是“饱”而不能行动的状态。我们经常会在对话中听到这样的片段：“我们昨天去吃 buffet，我是吃到……饱到……”，“吃”和“饱”后面的“到”会被刻意拉长音并提高声调，夸张地强调程度。就我们对语料的观察，“得”不曾出现在这样的语境。同样的，我们也常在对话中听到“我气到……”及“你真的是笨到……”，“气”和“笨”后面的“到”被拉长音并提高声调，强调一个

人生气的程度以及一个人认为对方的愚蠢已经到了无人能及的地步。“到”在这些语句中所能表达的语义甚至感情色彩是“得”不能取代的。

综上，新加坡华语有〔动词+到+补语〕和〔动词+得+补语〕两种动补结构，但〔动词+到+补语〕和〔动词+得+补语〕所表达的意义不完全一致。当〔动词+到+补语〕和〔动词+得+补语〕共现，〔动词+得+补语〕纯粹说明动作、性状所呈现出来的状态，而〔动词+到+补语〕除了说明状态，也兼表程度。当语境要求强调动作、性状所达到的程度，用的是〔动词+到+补语〕且一般不能以〔动词+得+补语〕代之。

3.3.2.2 双宾结构

所谓双宾结构，通俗的说法就是一个动词后面带两个宾语（陆俭明 1988：31），根据朱德熙（2007 [1982]：118），双宾语里离动词近的那个宾语叫近宾语，离动词远的那一个叫远宾语。朱德熙指出，在表示给予意义的双宾结构里，近宾语指接受者，接受者多半是人，因此近宾语往往是指人的名词或代词，远宾语指所给的事物，远宾语如果指人，就只能用指人的名词，不能用人称代词。在类型学上，不用近宾语或指人宾语以及远宾语或指物宾语称呼双宾句式的两个宾语，而是用间接宾语（即近宾语 / 指人宾语）和直接宾语（即远宾语 / 指物宾语）。这主要是因为直接宾语和间接宾语之分有语言共性的依据。²⁶下文讨论新加坡华语双宾结构的部分采用直接宾语、间接宾语的叫法。

²⁶关于类型学上区分直接宾语和间接宾语的理据，参考刘丹青（2001）：“凡是宾格和与格区别的语言，无例外地都是受事取宾格，跟其他宾语有同等句法地位，而与事取与格，跟一般的宾语不同，如俄语、德语、日语、藏语等。更重要的是，在这些语言中宾格是动词更为直接、更无标记(unmarked)的论元，而与格是动词更为疏远、更有标记的论元。比如，在藏语的给予类双宾式中，‘与事宾语带标记 la¹³，受事宾语为零标记’（王志敬 1994:345）。在日语双及物结构中，受事宾语带宾格标记 o，与事后则用与格标记 ni。ni 同时也是表示方向的后置介词，跟英语用表示方向的 to 表与事类似。带 ni 的与事能否算宾语是有争议的，因为 ni 的性质介于格标记和后置词之间，只是有些表现更接近格标记一些（见 Sadakane & Koizumi 1995）。在俄语的双宾式中，受事取宾格，与事取与格。与格是独立的形态格，宾格只有阴性名词有自己的形态，阳性中性名词的宾格分别同零形态的主格（非动物性名词）或领属格（动物性名词）。显然宾格是更直接、更无标记的动词论元。没有发现有一种语言，受事宾

按朱德熙（2007 [1982]：118-119）的分类，由间接宾语（即指人宾语 / 近宾语）和直接宾语（即指物宾语 / 远宾语）组成的双宾结构有以下几种类型：

（一）表示给予：

- a. 送他一份礼
- b. 还小李十块钱
- c. 卖我所房子
- d. 赔他一本新的
- e. 给你两个人
- f. 喂孩子牛奶
- g. 问你一个问题
- h. 放你三天假

（二）表示取得：

- a. 买了他一所房子
- b. 偷了我一张邮票
- c. 娶他家一个闺女
- d. 收了你两百块钱

朱德熙指出，表示取得的双宾结构里的间接宾语和直接宾语之间在意义上有领属关系。

（三）表示等同：间接宾语和直接宾语的所指在某一方面有同一性

- a. 叫他老大哥
- b. 骂他傻瓜
- c. 当他好人

语取一种宾格以外的格，与事反倒拥有宾格的形态。所以从语言共性讲，双及物结构的受事是直接宾语，与事是间接宾语或像其他靠介词引进的题元一样是间接格(oblique)。”

按间接宾语和直接宾语在动词后的排序，新加坡华语的双宾结构基本可归纳成以下三种类型：

I. [动词+间接宾语+直接宾语]

出现在这种语序的动词主要是给予义动词、取得义动词和叙说义动词。例如：

- 227.给我一点钱先。（日常对话）
- 228.我生日他送我一个 smartphone。（同上）
- 229.我要他赔我修车的钱。（同上）
- 230.他到底收你多少钱？（同上）
- 231.我赢他两场球。（同上）
- 232.那个浑蛋还骗了我几千块。（同上）
- 233.麻烦你告诉他这件事。（同上）
- 234.我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吗？（同上）

例（227）-（229）的动词“给”、“送”、“赔”都带有“给予”义，其他能出现在这种双宾式的给予义动词还有“还、交、分、找_{找钱}、退_{退还}、付、发_{发给}、借、租、赏、补_{补贴}、卖、传、嫁、分配、赠送、赔偿、奖励”等。例（230）-（232）的动词“收”、“赢”、“骗”都带有“取得”或“夺取”义，能出现在这种双宾式的取得义动词还有“抢、偷、扣_{扣除}、罚、拿”等。例（233）-（234）的动词“告诉”、“问”则带有“叙说”义，能构成这种双宾式的叙说义动词还包括“答应、回答、报告、通知、答复、提醒、请教”等。

II. [动词+直接宾语+间接宾语]

学界将这种双宾语语序称为倒置双宾。新加坡华语的倒置双宾主要由带“给予”义的动词组成。例如：

- 235.怎样你都要给一个答案我啊！（日常对话）
- 236.你问他要不要租一间房你。（同上）
- 237.他叫我借几块钱他，我看他可怜，就给了十块钱他。（同上）

例（235）-（237）的动词“给”、“租”、“借”都是带“给予”义的动词，其他如取得义动词（例 238-239）、叙说义动词（例：240-241），不构成倒置双宾。

238.*他收一块钱我。

239.*他赢两盘棋我。

240.*请你提醒这件事他。

241.*我问几个问题老师。

III. [动词+直接宾语+主谓结构]

但是，取得义动词能构成一种特殊的双宾式，靠近动词的是直接宾语，直接宾语后接一个主谓结构。给予义动词也能出现在这种双宾式。例如：

242.等下我买 kiwi 你吃。（日常对话）

243.我没有钱买，难道你要我去抢一辆脚车他玩咩？（同上）

244.给一杯水我喝。（同上）

245.随便分几千块我花也好啊！（同上）

例（242）-（245）的动词“买”、“抢”、“给”、“分”后分别接直接宾语“kiwi”、“一辆脚车”、“一杯水”和“几千块”，直接宾语之后是主谓结构“你吃”、“他玩”、“我喝”、“我花”。这种双宾式实际上是省略动词“给”而成，因为以上例句也能说成：

246.等下我买 kiwi 给你吃。

247.难道你要我去抢一辆脚车给他玩咩？

248.随便分几千块给我花也好啊！

也就是说，动词“买”、“抢”、“分”及其宾语“kiwi”、“一辆脚车”、“几千块”之后原本应该接的是兼语结构“给你吃”、“给他玩”、“给我花”，只是说话人有时会省略“给”，“买 kiwi 给你吃”等连谓结构就成了双宾结构。值得注意的是，如例（244）的“给一杯水我喝”就不能说成“给一杯水给我喝”，由于已

经用了一个动词“给”，另一个“给”似乎是有意识地被省略的。若动词换成“拿”，则两种句式——“拿一杯水我喝”和“拿一杯水给我喝”都能说。

3.3.3 形容词与形容词结构

本节讨论重叠式形容词以及由形容词结构组成的比较句式。

3.3.3.1 重叠式形容词

在新加坡华语里，形容词重叠后可作谓语，表示对事物的描述。例如：

249.你静静啦！（电视对白）

250.没有美美的。（同上）

251.好像谁弄他生气，从刚才到现在，他都脸黑黑。（日常对话）

252.她整天这样脸臭臭，不会笑的。（同上）

253.去梳一下啦，头发乱乱很好看咩！（同上）

例（249）是个命令句，是说话人要对方闭嘴。例（251）和（252）的“黑黑”和“臭臭”不是指颜色和气味，而是对脸上表现不愉悦的描述。

作谓语的重叠式形容词虽然能产性高，但也不是所有的形容词能重叠。比如“病了脸色不好看”说“脸青青”，不说“脸绿绿”；形容倾斜度大说“斜斜”不说“陡陡”；形容人虚伪说“假假”，没有与之相对的“真真”。此外，形容性情的形容词只有少数几个能重叠作谓语，如：“凶—凶凶、鬼祟—鬼鬼祟祟、乖—乖乖、傻—傻傻、轻松—轻轻松松、紧张—紧张紧张”，其余的如“善、恶、诚实、虚伪、下流、固执、坚强、调皮、无知、迟钝、聪明、欢乐、兴奋”等都不能重叠。

3.3.3.2 比较式

新加坡华语表示比较主要有三种形式：

I. [甲+比+乙+形容词]，例如：

254.你的女儿成绩比他儿子好。（日常对话）

255.这个箱子比那个大几倍。（同上）

II. [甲+形容词+乙+数量]，例如：

256.我小他三岁。（日常对话）

III. [甲+形容词+过+乙]，例如：

257.我走路还快过他跑步。（日常对话）

258.你妈妈需要你多过你需要她。（同上）

259.这边买便宜过外面。（同上）

第一种是北京话惯用的形式。第二种形式虽不是北京话典型的比较式，但这种形式现在在中国普通话里也很流行。（陆俭明等 2002）第三种形式在新加坡华语社群里用得很频繁。陈建民（1986）指出，在北京口语里偶尔可以听到“一浪高过一浪”的说法，但也只有少部分的形容词能在这种形式中出现，如：“一天好过一天、青菜贵过鱼肉、一阵紧过一阵”。也就是说，[甲+形容词+过+乙]不是北京口语的普遍形式。

[甲+形容词+过+乙]虽是新加坡华语的普遍形式，却也不是所有的形容词能进入这个形式。

260.他画的圆过你的。（日常对话）

261.*甲扁过乙

262.分数高过 90 分的很少。（日常对话）

263.这次平均都低过 70 分。（同上）

264.我刚刚冲好凉，怎样都香过你啦！（同上）

265.*甲臭过乙

266.*甲饱过乙

267.*甲痒过乙

268.你讲我凶啊，她还凶过我咧！（日常对话）

269.*甲善过乙

270.不用比，他肯定善良过你。（日常对话）

271.*甲随便过乙

272.*甲呆过乙

关于新加坡华语〔甲+形容词+过+乙〕这个比较式，学界普遍认为是方言干扰，即华语跟南方汉语方言接触而受到方言干扰，最终吸收方言的句式。事实上，闽语、粤语、客家话等各个方言的比较式不完全一致，来自不同方言群体的新加坡华人如何达成共识而选择以〔甲+形容词+过+乙〕作为表示比较的主要形式？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会在下一章讨论。

3.4 小结

本章主要从语音、词法和句法的层面描述了新加坡华语的特征。语音方面，就声母而言，有：（一）舌尖后（[tʂ-] [tʂʰ-] [ʂ-]）及舌面（[tɕ-] [tɕʰ-] [ɕ-]）擦音、塞擦音声母变读舌尖音；（二）声母为舌尖后浊擦音 [ʐ-] 的音节 [ʐuŋ] 变读 [joŋ] 或 [loŋ]；（三）其他语音环境中的舌尖后浊擦音声母 [ʐ-] 变读 [z-] 或 [l-]。就韵母而言则有：（一）撮口呼 [-y-] 变齐齿呼 [-i-]；（二）鼻音韵母 [-əŋ] 变读 [-ən]，但当声母为双唇音 [p-] [pʰ-] [m-] 和唇齿音 [f-]，[-əŋ] 一般发成 [-oŋ]；（三）主要元音为 [-i-] 的鼻音韵母的发音混淆，有 [-in] 变读 [-iŋ] 的情况，也有 [-iŋ] 变读 [-in] 的情况，只是 [-iŋ] 变读 [-in] 发生的频率没有 [-in] 变读 [-iŋ] 来得高。再来就是，新加坡华语有一个以喉塞音韵尾来表现或表现为一个短促的下降调的第五声。

词法方面，新加坡华语不用轻声和儿化这两种构词手段来区别词义与词性。北京话的“子、儿、头”等后缀由实词虚化得来，都与轻声有关（周一民 2005）；新加坡华语有“头”后缀，但由于带“头”缀的词基本上只有一个义位，不需要以后缀变读轻声来区别意义，因此，作为后缀的“头”保留原调，不读轻声。此外，由于“子”后缀的主要功能实际上是构成双音化的形式，对意义的影响不大，因此，“子”后缀在新加坡华语里可有可无。另外，我们在词汇语义的基础上阐述了新加坡华语的共词化现象。

句法方面，我们以名词、动词、形容词三类实词为主，着重谈了以下几种结构：（一）名词与形容词重叠式的可重叠范围以及重叠式所表达的语

法意义；（二）能受形容词“大”和“小”修饰的量名结构；（三）动补结构的四种形式——〔动词+掉〕、〔动词+去〕/〔动词+补语+去〕、〔动词+回〕、〔动词+到+补语〕；（四）双宾结构；（五）由形容词充当中心语的比较式〔甲+形容词+过+乙〕。

以往学者都从接触语言学所谓底层语言干扰（substrate interference）的角度出发来解释新加坡华语的特征，认为新加坡华语的无论语音、词汇、语法现象皆源自南方汉语方言的干扰。方言干扰或许能作为一种解释，说明某种语言现象发生的动因，也就是解释语言的某个方面为什么变了，但方言干扰无法解释语言的某个方面为什么不变。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将新加坡华语看作是在受到方言干扰的环境中形成的一个汉语的变体，但方言干扰的角度往往只让我们注意语言变体中的变异却忽略了不变的方面。

我们认为，我们在讨论新加坡华语的特征时不能只单纯考虑成因。语言接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背景，既然说新加坡华语在各种语言和汉语方言接触的环境中形成，那么，我们就必须回到根本，凭借共时的语言现象重构语言特征形成的机制，如此才有可能理清新加坡华语有以及没有某种语言结构的原因。

第四章 新加坡华语的形成机制

在这一章里，我们将新加坡华语的语音、词法和句法现象放到柯因内化理论中去讨论，以验证我们在第一章所做的假设：新加坡华语是几种汉语方言在新加坡华人社群内相互接触，经过混合、拉平而生成的一种具有区域性共同语性质的新的语言变体或新的方言。

4.1 柯因内化理论 (Koineization)

柯因内语 (Koine) 原是公元前四世纪到公元六世纪期间希腊的通用语，在希腊语是“普通”之意。Samarin (1971) 首先提出柯因内化 (Koineization) 这个概念，将它等同于方言混合并且以阿拉伯口语 (colloquial Arabic) 的例子说明方言拉平的过程。Samarin 指出，拉平之所以发生是由于方言间相互接触而说话人尝试保留方言间共有的形式。Samarin 表明，柯因内化的结果是生成柯因内语。

Dillard (1972) 指出，方言拉平经常发生在说不同方言的人互相接触交流的环境，譬如移民社会，而拉平是消除方言间差异的过程。Gambhir (1981) 指圭亚那博杰普尔语 (Guyanese Bhojpuri) 是经过方言拉平而形成的一种柯因内语。Gambhir 认为，拉平简化了语言系统，主要是形态缩减、敬语消失、局部特征消除等。

4.1.1 柯因内语 (Koine) ²⁷

社会语言学家 Jeff Siegel 给柯因内语下的定义为：柯因内语是一种稳定的交际变体，是一些较为相似的、可互相通话的地区方言和社会方言之间混合和拉平的产物。这种现象发生的背景是这些变体的说话人之间越来越多的互动和融合。²⁸换句话说，柯因内语是一种语言的几种可相互通话的变体，在

²⁷ 关于柯因内语的说明主要引述 Siegel (1985, 2001) 和徐大明 (2006: 259-269)。

²⁸ A koine is a stabilized contact variety, which results from the mixing and subsequent leveling of features of varieties, which are similar enough to be mutually intelligible, such as regional or social dialects. This occurs on the context of increased interaction or integration among speakers of these varieties. (Siegel 1985: 363; 2001:175)

一定的环境下，经过说话人的接触而产生的一种新的、在一定区域内具备通语地位的变体。产生柯因内语的过程就称为“柯因内化”（Koineization）。

Trudgill（1986, 2004）认为，柯因内化是方言接触的特例，通常在一个语言区内不同地方的移民迁徙至同一个新的地方时最容易发生。也就是说，柯因内化发生的前提是新聚居地第一代移民的语言适应行为。

Trudgill（1986：127）指出，移民型柯因内语的柯因内化包含三个过程：混合（mixing）、拉平（leveling）和简化（simplification）。混合是同在一个接触环境中的几种方言的结构并存的状态。拉平指的是在语言混合中出现的语音、词汇或语法形式的变式数量减少的过程。根据 Trudgill（2003：79），在拉平过程中被排除的往往是使用人口少的形式。拉平的作用是减少方言之间的差异。（Kerswill 2002：671）简化按 Trudgill（1986：103）的说法是提高语言结构的规律性以及形态与词汇方面的透明度。Kerswill（2002）指出，柯因内化还经过重新分配（reallocation）这个阶段。重新分配指两个或更多经过拉平而获得保留的变式在新方言（即柯因内语）中被赋予新的功能。（Britain & Trudgill 1999：245）

Trudgill（1998）、Trudgill et al.（2000）归纳了柯因内化的三个阶段，并且认为这三个阶段大致与移民后最早的三代说话人相对应。

阶段	说话人	语言特征
第一阶段	成人移民	初步的拉平
第二阶段	第一代母语说话人	极度多样性，进一步拉平
第三阶段	随后的几代人	定型、拉平、重新定位

表 4.1：柯因内化的阶段（摘自徐大明 2006：263）

在柯因内化的过程中，有些发展阶段的具体情况与上表并不完全相同，比如有时在第二阶段就出现了定型（focusing）现象，有时第三阶段经历了好几代人也没有出现定型现象。

Trudgill 指出，在一个新聚居地，当人们使用不同的变体时，可能会有意无意地运用方言的一些独特用法，这是一种适应行为。Trudgill 把这种个体行为发展成新方言的过程称作“长期适应行为”（long-term accommodation），

其表现方式是个体经过与不同变体的说话人长时间的接触后，自己的日常言语发生了近乎永久性的变化。

Trudgill 调查了在美国的英国人、在英国的美国人以及在挪威的瑞典人的语音情况等大量案例后发现，适应过程似乎有规律可循。他提出了适应过程的基本顺序：

(1) 自然的或者预期的语音变化：比如英国人在美国也会用轻拍音[r]代替塞音[t]，例如 water 一词中/t/的发音。因为这种替代在英国本土也有一定程度的表现。

(2) 清晰的、成系统的音位替换：比如英国人在美国发 dance、last、half 等词中的元音时会用[æ]替代[a:]。这是一种有规律可循的变异。

(3) 难以实现的复杂的变化：包括重新拆分母语里已合并的音位，发出母语里没有的音位和无法按照词汇规律预测的变化等。

除了提出适应的顺序，Trudgill 还进一步提出“超强特征”（the most distinctive feature）的概念，认为超强特征是抑制适应过程的因素。音位对立是造成超强特征的一个原因。有时候音位对立会让说话人产生强烈的感受，使他们觉得这是某一类人的标志，进而不愿使用。譬如：北部英语中 dance 一词的元音发作[æ]，南部英语发作[a:]。在交流中，北方人很少会采用南方的[a:]读音。但是在 butter 一词中，北方人又愿意采用南方的[ʌ]读音。原因在于南部英语的[a:]是一个超强特征，它使北方人强烈地感受到不同，所以不愿意适应；而[ʌ]是北方人没有的音位，不会给人强烈的感觉，因而就不会有不愿适应的问题。

4.1.2 柯因内化的形成和延续性

以柯因内语为母语的新一代人的形成，标志着柯因内化的形成。

新西兰国家广播公司 1946 年曾录制了 325 名出生于 1850 年至 1900 年之间的人的发音，这个年龄段正好代表了以新西兰英语为母语的第一代人。Trudgill 前几年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这份语音档案的一大特点就是异常

明显的多变性，在人际间和个体内部都是如此。Trudgill 的解释是：在缺少单一的、稳定的成人语言模式的环境下，儿童对语言变体的选择面变得十分宽泛。同样，在缺少稳定的同龄人语言模式的环境下，成年人，尤其是父母或其他监管人对儿童言语的影响也会变得更大（Trudgill et al. 2000）。因此，个体很自然会从其接触到的各种变体中做出新的选择。

尽管那一代新西兰人的言语形式如此不稳定，还是出现了一些拉平的现象。比如，元音[ʊ]几乎完全消失了，而[u]是北部英格兰人的特征。从历史上看，迁入新西兰的移民中北部英格兰人占少数，所以这一元音很自然地在拉平过程中被淘汰。

Trudgill 认为，从总体上看，第一阶段说话人所说的各种变式的比例决定了第二阶段说话人言语中这些变式的比例。Trudgill 没有进一步深入研究从上述第二阶段说话人的新西兰英语到今天完全定型的第三阶段说话人的新西兰英语之间是如何转变的。不过他对第三阶段的一些特征也进行了调查，发现绝大部分人不是全部保留，就是将上一代人言语变体的某个特征全部剔除。

4.1.3 柯因内语和其他语言接触类型的区别

柯因内语和其他语言接触类型，如：皮钦语（pidgin）和克里奥尔语（creole）最显著的区别是其连续性。（Siegel 2001: 182）一方面，在柯因内语的形成过程中，说话人可以继续使用各自不同的方言进行交际。因此，这当中不需要经过第二语言习得或语码转换，也就没有 Thomason and Kaufman（1988）所谓的语言结构特征转移，即说话人将母语的的特征转移到所学习的目标语或第一语言的特征干扰第二语言。换句话说，柯因内语的接触模式不涉及新语言的习得，也就是没有目标语可学，因此，在一个语言社群中并存的各种方言之间没有顶层与底层之分（substrate-superstrate distinction）。某个方言的结构特征或许会在柯因内语中占优势，但这并不表示该方言是目标语。皮钦语和克里奥尔语的形成一般会有一个基础语言，这个基础语言与其

他语言接触、受其他语言干扰而产生变异，最终形成一个新的语言。柯因内语的形成没有基础语言，其结构可以由接触环境中的任何一个方言提供。因此，柯因内语是由方言中的形式混合、拉平而成，并不是语法规则的混合与重构。

另一方面，柯因内语和同在一个接触环境中的方言之间有发生学关系。同在一个接触环境中的方言一般互为亲属语言，故所生成的柯因内语是一个新的方言或新的语言变体。Nida and Fehderau (1970: 152) 及 Gambhir (1981: 185) 指出，相对于皮钦语和克里奥尔语，柯因内语及其他方言在结构上具备延续性。也就是说，柯因内语在语音、词汇、语法各方面与同在一个接触环境中的方言有系统性的对应。皮钦语、克里奥尔语和基础语言之间在结构上则出现断层。因此，Thomason and Kaufman (1988) 等学者一般认为，皮钦语和克里奥尔语及其基础语言或同在一个接触环境中的其他语言之间没有亲属关系。

4.1.4 新加坡华语和柯因内语的关系

根据新马华人或东南亚华人史书上记载，1819 年以后，新加坡在英殖民政府的管理和规划下成为一个自由贸易港口，吸引大批外来移民前来讨生活，其中以来自中国华南地区的华人占多数。华人移民内部共有五大主要的方言群：（一）来自福建漳州、泉州的闽南方言群；（二）来自广东潮州的潮州方言群；（三）来自广府、肇庆的粤方言群；（四）来自福建闽西永定和广东嘉应五属、丰顺、大埔的客家方言群；（五）来自琼州的海南方言群。当时的华人社群呈现一种多元异质状态，各方言群内部以所属的方言沟通，但各方言群之间没有共同的语言。

早期的新加坡华人社群基本上呈现各种汉语方言平行使用的状态。由于殖民帝国使用的语言是英语，英语因此成为新加坡官方的行政语言。为了与其他种族以及殖民政府官员沟通，华人逐渐掌握简单的马来语和英语。也就是说，华人移民到新加坡来，除了本身的方言，最先掌握的是马来语和英

语。后来因政治因素启发，华人才逐渐意识到他们需要有一个共同语来团结社群内的各方言群体。华语随之应运而生。当时，中国还没有推广普通话，教师和学者从中国带来的是国语和国文，语音依据也是辛亥革命（1911 年）以后中国读音统一会制定的国音（俗称老国音）。虽然共同语有了雏形，但华人在日常交际中主要还是使用各自的方言。一直到 1979 年讲华语运动的推行，华语才基本上取代方言，成为新加坡华人社群的共同语。因此，1979 年讲华语运动是新加坡华语定型的转捩点。

按以上所述的历史背景，华语萌芽的环境是一个闽方言、粤方言、客家方言、海南方言等南方汉语方言以及国语平行使用并且与英语、马来语、淡米尔语等其他社会语言并存的多语环境。

闽语、粤语、客家话、海南话等南方汉语方言以及国语之间有亲属关系，都属于汉语，而在新加坡华人社群中形成的共同语——华语在结构上与汉语有系统性的对应，可以看作汉语的一个变体。在亲属语言之间发生接触且生成的语言在结构上有系统性对应这一点上来看，新加坡华语符合柯因内语的特征。另一方面，在接触模式上，从各种方言平行混合这一点来说，新加坡华语的生成模式也与柯因内语的接触模式相类似。那么，我们接着从语音、词法和句法材料看新加坡华语是不是通过柯因内化产生。

4.2 新加坡华语的形成

（一）混合。第一代华人移民在交流时各说各的方言，主要是福建话、潮州话、广东话、客家话、海南话。其中，福建话的使用人口最多，接着是潮州话和广东话，说海南话和客家话的人口则相对少。当时知识分子和学者带来的汉语标准语是国语，不是北京话，也不是普通话。我们根据新加坡国家档案馆所收录的早期的访谈记录以及共时的语言材料构拟第一阶段华语的面貌。²⁹当时不同的汉语方言共存，从语音方面来看就有闽、粤、客家、海南等几种方言以及国语的音系同时存在，言语里自然难免出现各种变异现

²⁹ 新加坡口述历史的访谈对象包括第一代华人移民，如：林清爽先生（Mr. Lim Cheng Song）1915 年生于福建安溪，1925 年移民到新加坡。

象，例如：声母变项有 [b] [g] [f] [j] [tʂ] [tʂʰ] [ʂ] [ts] [tsʰ] [s] [dz]/[z] [n] [l] [ŋ] [h] 等，韵母变项有 [e] [ɛ] [ə] [ɤ] [i] [y] [uo] [ie] [ye] [in] [yn] [ien] [yen] [iu] [iou] [ui] [uei] [ɤr] [an] [ən] [aŋ] [əŋ] [uŋ] [oŋ] [in] [ian] [iŋ] [iuŋ] [ioŋ] [uan] [uən] [uaŋ] [uəŋ] [am] [iam] [em] [əm] [im] [om] [uam] [ap] [ep] [əp] [ip] [op] [iap] [at] [et] [ət] [it] [iat] [ut] [ot] [uat] [ak] [ok] [uk] [ek] [ik] [iak] [ioŋ] [uak] [aʔ] [eʔ] [iʔ] [uʔ] [oʔ] [iaʔ] [uaʔ] [ioʔ] [ueʔ] [uiʔ] 等，此外还有复杂的声调变项，闽、粤、客家、海南方言都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和入声，方言的声调数目取决于五种调类是否各分阴阳。国语虽以北京语音为主，但保留了入声调。

我们接着以比较式为例，说明福建话（漳州、泉州）、潮州话、广州话和客家话在句法上所表现的差异。

（A）福建话

在福建话里，常见的比较式是 [甲+比+乙+较+形容词]。例如：
（周长楫、周清海 2000：130）

1. 小弟比阿兄较坏。（弟弟比哥哥坏。）
2. 我比伊较会食。（我比他能吃。）

有时也用 [甲+较+形容词+乙]。例如：（周长楫、周清海 2000：130）

3. 小弟较坏阿兄。（弟弟比哥哥坏。）
4. 我较擎食伊。（我比他能吃。）

这种比较式也可以在比较结果后面再加上数量词。例如：（周长楫 1998）

5. 我较加伊三岁。（我比他大三岁。）

福建泉州还有 [甲+恰+形容词+乙]。例如：（陈章太、李如龙 1991）

6. 汝恰悬我。（你比我高。）

此外，福建话还有一种没有比较标记的比较式〔甲+形容词+乙〕。

例如：

7. 我矮伊。（我比他矮。）（周长楫 1998）
8. 我勇汝。（我比你健壮。）（陈法今 1982）
9. 伊大汉我。（他比我高大。）（同上）

（B）潮州话

潮州话常见的比较式是〔甲+形容词+过+乙〕。例如：

10. 狗大过猫。（狗比猫大。）（李新魁 1994：405）
11. 伊人个感情好过乜嘢个。（他们的感情比什么都好。）（李永明 1959）

此外，表示比较程度时，潮州话常用〔甲+天+形容词+乙〕。例如：（李新魁 1994：405）

12. 我天大汝。（我比你较大。）
13. 我个天大，许个天细。（我的比较大，那个比较小。）

（C）广州话

广州话的比较式主要是〔甲+形容词+过+乙〕。例如：（高华年 1980：263）

14. 佢细过我。（他比我小。）
15. 我老豆梗係肥过你嘞。（我父亲一定比你胖。）

有时也用〔甲+比+乙+形容词〕。例如：（李新魁等 1995）

16. 铁比铜硬。

〔甲+比+乙+形容词〕不是粤语典型的比较句式，但邓思颖（2015：189）指出，现在粤语慢慢接受这种说法，尤其用在比较严肃、正式的语境里。³⁰

³⁰ 根据邓思颖（2015：189），Yue-Hashimoto（1997）、Liu（2002）、邓思颖（2003）、张双庆、郭必之（2005）等也都对粤语里的〔甲+比+乙+形容词〕比较句式进行过论述。

此外，在形容词的后面加词尾“得”，构成〔甲+形容词+得+过+乙〕比较式，有强调的意思。例如：（高华年 1980：264）

17. 呢度边个忙得过张院长呀！（这儿谁也比不上张院长忙呀！）

18. 冇人快得过你。（没有人比你更快。）

(D) 客家话（大埔）

表示比较，客家话有两种表现形式：

I. 〔甲+比+乙+靠+形容词〕。例如：（何耿镛 1993：72）

19. 厓比佢靠大。（我比他大。）

20. 佢比厓靠会食。（他比我能吃。）

梅县客家话用“过”，即〔甲+比+乙+过+形容词〕。例如：（林立芳 1997）

21. 佢比你过高。（他比你高。）

II. 〔甲+形容词+过+乙〕。例如：（何耿镛 1993：72）

22. 厓大过佢。（我比她大。）

23. 佢高过厓。（他比我高。）

在客家话里，如果要表示“我比他大三岁”，不用〔甲+形容词+过+乙〕，即不能说成“厓大过佢三岁”，而是直接说成“厓大佢三岁”，即〔甲+形容词+乙+数量〕。

我们将北京话、福建话、潮州话、广州话和客家话主要的比较式整理为表 4.2：

北京话	福建话	潮州话	广州话	客家话
甲+比+乙+形容词	甲+比+乙+较+形容词	甲+形容词+过+乙	甲+形容词+过+乙	甲+比+乙+靠/过+形容词
甲+形容词+乙+数量	甲+较+形容词+乙+(数量)	甲+天+形容词+乙	甲+比+乙+形容词	甲+形容词+过+乙
	甲+形容词+乙			甲+形容词+乙+数量

表 4.2: 北京话、福建话、潮州话、广州话、客家话的比较式

在第一代华人移民的沟通与交际活动中，汉语方言之间发生接触，说不同方言的人在交际时也互相适应，在各种方言结构中寻求融合以建立共同语。（余志鸿 2000：26）而各种方言达至融合的方式是拉平，通过拉平减少方言混合所出现的变式的数量。

（二）拉平。按柯因内化理论，方言拉平的机制可概括为三个方面：

（i）简化；（ii）重新定位；（iii）除掉少数说话人使用的或异常的形式，也就是保留多数说话人使用的以及在各种汉语间表现出共性的形式。

先说简化和重新定位。

（i）简化

在言语适应和方言拉平过程中，出现音位合并等简化现象。例如：舌尖后擦音、塞擦音 [ʈʂ][ʈʂʰ][ʂ] 和舌尖擦音、塞擦音 [ts][tsʰ][s] 相混；舌尖后浊擦音 [ʐ] 或和福建话、潮州话、海南话都有的舌尖浊擦音 [z] 相混，或简化成舌尖边音 [l]；舌根鼻音韵母 [-əŋ] [-iŋ] 和舌尖鼻音韵母 [-ən] [-in] 相混，即前后鼻不分；舌尖鼻音 [n] 和舌尖边音 [l] 相混等。Trudgill（1986）的研究发现，语音中比较容易实现的特征更有可能在言语活动中被适应。因此，舌面擦音、塞擦音 [tʃ][tʃʰ][ç] 也被简化成舌尖音。

另外，词汇语义也发生共词化，即用一个词位表达多个不同但有联系的意义。譬如：用“家”一个词位指称“家庭”以及“供人居住的建筑物”，用“还[huan³⁵]”一个词位表示“归还”、“付（款）”及“缴

（费）”，“烧”作形容词既表示“热”也表示“烫”。就语义范畴而言，共词化是将互相关联的概念联系起来，忽略概念上的细微差异而对概念进行整合，把语言表层的词形简化。

（ii）重新定位

以动补结构来说，大部分南方汉语方言区分状态补语和程度补语。

（Yue-Hashimoto 1993）吴福祥（2001，2002）对南方汉语方言几个状态补语标记的来源所做的研究也证实，在粤语和闽语里，状态补语和程度补语不使用同一个标记。

（A）广州话

彭小川（1993）描写了广州话引进状态补语的“得[tak⁵⁵]”和引进程度补语的“到[tou^{24~33}]”的功能和特点。例如：

24. 王生講得有道理。（表状态）

‘王先生说得有道理。’

25. 佢畀我問到口啞啞。（表程度）

‘他被我问得答不上来。’

彭小川（1993）指出，“得[tak⁵⁵]”描写当事者进行动作时的样子，“到[tou^{24~33}]”则强调当事者的动作所达到的程度。也就是说，粤语广州话状态补语标记和程度补语标记不同。

（B）漳州、泉州话

杨秀芳（1991）和冯爱珍（1993）指出，闽语表示状态补语和表示程度补语不是一个标记。以漳州、泉州话为例，状态补语标记是“着[tioʔ⁴⁴]”。例如：

26. 沃着真爽

‘淋着真爽’

程度补语标记则是“邁[kəʔ⁵~ka^{31~55}]”。例如：

27. 食邁真饱

‘吃得很饱。’

我们将北京话、广州话、漳州、泉州话及新加坡华语的状态补语标记和程度补语标记整理成表 4.3:

	北京话	广州话	漳州、泉州话	新加坡华语
状态补语标记	得	得[tak ⁵⁵]	着[tioʔ ⁴⁴]	到 / 得
程度补语标记	得	到[tou ²⁴⁻³³]	邁[kəʔ ⁵ ~ka ³¹⁻⁵⁵]	到

表 4.3: 北京话、广州话、福建话及新加坡华语的状态补语和程度补语标记

在功能上, 广州话和漳州、泉州话的程度补语标记“到[tou²⁴⁻³³]”和“邁[kəʔ⁵~ka³¹⁻⁵⁵]”与新加坡华语的“到”平行。然而, “到[tou²⁴⁻³³]”和“邁[kəʔ⁵~ka³¹⁻⁵⁵]”不引进状态补语, 广州话和漳州、泉州话的状态补语分别由“得[tak⁵⁵]”和“着[tioʔ⁴⁴]”引进。新加坡华语的“到”却似乎将这些个别语素的功能揽于一身。

事实上, 新加坡华语有〔动词+到+补语〕和〔动词+得+补语〕两种形式, 但〔动词+到+补语〕和〔动词+得+补语〕所表达的意义不完全一致。当〔动词+到+补语〕和〔动词+得+补语〕共现, 〔动词+得+补语〕纯粹说明动作、性状所呈现出来的状态, 而〔动词+到+补语〕除了说明状态, 也兼表程度。譬如: “穿到很好看”和“穿得很好看”两可, 但二者语义有别。“穿得很好看”表示一种好看的状态, 而“穿到很好看”除了表示好看的状态, 也表示穿戴达到了好看的程度。又如: 能说“吵架吵到乱”, 说明由吵导致乱的状态, 也表示吵到了乱的程度, 但“吵架吵得乱”就不合语法。这也就是说, 拉平使新加坡华语同时有〔动词+得+补语〕和〔动词+到+补语〕两个变式, 但两者在新加坡华语中被赋予新的功能。

另外, 我们根据 Lamarre (2001) 所归纳的汉语方言补语 / 补语标记的类型来看〔动词+到+补语〕结构所体现的句法格局。Lamarre (2001) 根据汉语方言里补语 / 补语标记的形式及功能, 将补语 / 补语标记进行归纳, 并按照补语 / 补语标记分出的类将汉语方言划分为四种类型:

补语分布类型		汉语方言
第一类型	<div> <div>状态补语</div> <div>可能补语</div> <div>程度补语</div> </div>	北方官话、南方官话、西南官话（四川、云南）、江淮官话（安庆、庐江）、赣方言（黎川）、吴方言（嘉定、常州、舟山）
第二类型	<div> <div>可能补语</div> <div> <div>程度补语</div> <div>状态补语</div> </div> </div>	<p>北方型（北京、天津和西安除外）：可能补语为 [liao]，状态补语和程度补语一般为“得”</p> <p>南方型：可能补语一般为“得”，程度补语和状态补语依不同方言而有不同的标记，譬如吴方言（上海、常熟、松江等）用“来”、吴方言（宜兴）以及部分西南官话用“着”、湘方言（长沙）用“起”、客家方言（梅县）用“去”、粤语（信宜）以及赣语用“到”</p>
第三类型	<div> <div>程度补语</div> <div> <div>可能补语</div> <div>状态补语</div> </div> </div>	粤语、部分吴语（铜陵）、部分客家方言以及部分赣方言
第四类型	<div> <div>程度补语</div> <div>可能补语</div> <div>状态补语</div> </div>	闽方言（福清－闽东、漳平－闽南、台湾闽南话）

表 4.4：汉语方言补语 / 补语标记的类型

如表 4.4 所示，在第一种类型中，状态补语、程度补语和可能补语是同一个标记。北方官话、南方官话、西南官话（四川、云南）、江淮官话（安庆、庐江）、赣方言（黎川）、吴方言（嘉定、常州、舟山）属于第一类型。在第二种类型中，程度补语标记和状态补语标记相同，但可能补语标记不同。这一类型依标记形式不同又分为北方型和南方型。北方型（北京、天津和西安除外）的可能补语标记为[liao]，状态补语和程度补语标记一般为“得”；南方型的可能补语标记一般为“得”，程度补语和状态补语依不同方言而有不同的标记，譬如：吴方言（上海、常熟、松江等）用“来”、吴方言（宜兴）以及部分西南官话用“着”、湘方言（长沙）用“起”、客家方言（梅县）用“去”、粤语（信宜）以及赣语用“到”。第三种类型是标准的南方型，即可能补语和状态补语用同一个标记而程度补语标记不同。粤语、部分吴语（铜陵）、部分客家方言以及部分赣方言属于这一类型。闽方言（福清—闽东、漳平—闽南、台湾闽南话）则属于第四种类型，即可能补语、程度补语和状态补语标记各异。

在类型上，新加坡华语补语标记的表现趋向第二种类型中的南方型，即程度补语标记和状态补语标记为“到”而可能补语标记为“得”或更常以助词“会”搭配谓语来表示。例如：

28. 这种锁头要特别的锁匙才打得开。（日常对话）

29. 这条路这样窄，我们的车会过吗？（日常对话）

‘这条路太窄了，我们的车子过得去吗？’

例（28）“打得开”的意思是“能打开”，“得”在这里表示可能。

例（29）是以助词“会”搭配谓语来表示可能，“会过吗”问的是车子可能不可能通过一条狭窄的路。

总的来说，方言混合与拉平使新加坡华语的补语及补语标记呈现一种非标准北方型亦非标准南方型的格局。

(iii) 除掉少数说话人使用的或异常的形式

按以往与柯因内化相关的研究成果，保留多数说话人使用的以及在各种汉语间表现出共性的形式应该是拉平过程中最常见的情况。

构词方面，由于闽方言、粤方言、客家方言、海南方言等南方汉语方言没有轻声及儿化词，因此，轻声和儿化在共同语里不形成构词手段。此外，由于南方汉语方言里有“头”后缀，因此，“头”后缀在华人的言语里得到保留。不过，“子”后缀就没有形成稳定的双音词化手段，华人还是习惯词语的单音节形式，因为单音形式不影响表义，如：“鸭、被、裙、椅、位”等形式所表达的意义与“鸭子、被子、裙子、椅子、位子”没有不同。

句法方面，闽南话和粤语能受形容词“大”和“小”修饰的量名结构得到保留。在闽南话里，受“大”或“小”修饰的量名结构[成(伤 [siū³³]) + 大(或细 [sue²¹]) + 量 + 的 + 名词] 强调数量的大或小。(周长楫、周清海 2000: 126) 例如：(周长楫、周清海 2000: 126)

30. 成大碗的饭，我食勿了。(很大的一碗饭，我吃不完。)

31. 伤细只的狗，否饲。(太小的狗，难饲养。)

例(30)“成大碗的饭”，“大”修饰由量词“碗”与名词“饭”所组成的量名结构，“成”是副词，相当于“很”。例(31)“伤细只的狗”，“细”(即“小”)修饰由量词“只”与名词“狗”所组成的量名结构。

在粤语里，受“大”、“小”修饰的量名结构一般作谓语。(Matthews & Yip 2011: 112-113) 例如：(Matthews & Yip 2011: 112-113)

32. 呢间房好大间。(这房间很大。)

33. 我哥哥好大只嘅。(我的哥哥体格健硕。)

34. 细细只猫仔。(很小的一只猫。)

例(32) - (34)中，受“大”、“小”修饰的量词结构分别为“大间”、“大只”、“细细只”，例(34)形容词“细”(即“小”)重叠。

由于在新加坡华语社群中母语为闽南话和粤语的成人占了绝大多数，因此，从使用人口和频率来说，这种受“大”、“小”修饰的量名结构普及性高，继而被保留到共同语里。

取南方汉语方言共有或普遍使用的形式而保留到共同语里的句法结构还有〔动词+回〕。

从语法形式和功能的角度来看，福建话、潮州话、客家话和广州话表示回复、回报的趋向补语都用了带有“返回”义的形式。

(A) 福建话

福建话以“倒转”表示回复、回报。例如：

- 35. 拍伊倒转。（回过来打他。）
- 36. 即本册还倒转互伊。（这本书还给他。）

(B) 潮州话

- 37. 拍伊倒转。（回过来打他。）
- 38. 即个碗还倒转分伊。（这个碗还给他。）

(C) 广州话

广州话表示回复、回报的趋向补语为“翻”。例如：（高华年 1980：56）

- 39. 我地倾翻求先啲个问题。（我们回来谈刚刚那个问题。）
- 40. 而家咁冻，你好着翻件棉袄罗。 （现在那么冷，你该把棉袄穿上了。）

(D) 客家话

客家话以“转”表示回复、回报，“转”附着于动词后。例如：

- 41. 厓打转佢。（我回过来打他。）
- 42. 还转分佢。（还给他。）

南方汉语方言里的〔动词+由“返回”义动词虚化而成的趋向补语〕这个结构保留到共同语里，以〔动词+回〕表示，如：“打回”表示还手、“找回”表示找回来。

综上，从句法层面上来看，在言语适应和方言拉平过程中，似乎是南方汉语方言共有或普遍使用的结构被保留下来。在不考虑方言人口的情况下确实如此。但是，我们再回来看比较式。

我们根据李蓝（2003）所归纳的现代汉语方言差比句的八种语序类型，将北京话、福建话、潮州话、广州话和客家话比较式的语序类型整理成表 4.5：³¹

	I 型 甲 + 比 + 乙 + 形容 词	II 型 甲 + 形容 词 + 过 + 乙	III 型 甲 + 较 + 形容词 + 乙	V 型 甲 + 比 + 乙 + 较 + 形容词	VI 型 甲 + 形容 词 + 乙 + (数量)
北京话	√				√
福建话			√	√	√
潮州话		√			
广州话	√	√			
客家话		√		甲 + 比 + 乙 + 靠 / 过 + 形容 词	√

表 4.5：北京话、福建话、潮州话、广州话、客家话比较式的语序类型

在语序类型上，潮州话、广州话和客家话用〔甲+形容词+过+乙〕，属于同一类型，但客家话表示比较不只一种形式，还有〔甲+比+乙+靠/过+形容词〕，广州话有时也用 I 型，即〔甲+比+乙+形容词〕；福建话表示比较不用“过”，而用“比”和“较”，在类型上跟潮州话、广州话和客家话的分歧最大。

³¹ 李蓝（2003）所归纳的现代汉语方言差比句的八种语序类型（例句中把相关方言里的比较结果都改成“高”，其他词语也改同普通话）：I 型“我比你高”；II 型“我高过你”；III 型“我较高你”；IV 型“我较高过你”；V 型“我比你较高”；VI 型“我高你（一头）”；VII 型“我是你高”；VIII 型“我你哈高着”。

为什么新加坡华语保留了〔甲+形容词+过+乙〕而不采用福建话的比较式，毕竟福建群体在华人人口中所占比率最高？或许我们能说这是因为说潮州话、广州话和客家话的人口相加起来高于说福建话的人口，因此，〔甲+形容词+过+乙〕在频率上取胜。然而，将这一解释用到双宾句式上就不成立。

粤语表示给予义的双宾句一般为〔动词+直接宾语 / 指物宾语+间接宾语 / 指人宾语〕（倒置双宾）。例如：（李新魁 1994：261）

43. 我畀（一）本书佢。（我给他一本书。）

44. 大佬送咗（一）支笔佢。（大哥送了一支笔给他。）

谢永昌（1994：302-303）指出，梅县方言双宾句有两种形式：

（一）〔动词+间接宾语+直接宾语〕

45. 阿伯分厝一身西装。（伯父送给我一套西服。）

（二）〔动词+直接宾语+间接宾语〕，这一形式较常用。例如：

46. 厝分两只柚子佢。（我赠给他两个柚子。）

根据张敏（2010），闽语（尤其是分布于其核心区域，即福建沿海、台湾以及广东潮汕地区的闽语）作为一种最典型的南方话，其双宾式不用〔动词+直接宾语+间接宾语〕（倒置双宾），而用的是跟北方话一样的形式，即〔动词+间接宾语+直接宾语〕。例如：

47. 我乞汝钱。（我给你钱。）

48. 伊送我一支笔。（他送我一支笔。）

新加坡华语的双宾句除了〔动词+间接宾语+直接宾语〕，如：

49. 我给他一粒糖。（日常对话）

也保留了倒置双宾。例如：

50. 你不要哭，等下我给糖你。（日常对话）

51. 他跟我讲他没有钱搭车，叫我借两块钱他。（同上）

既然拉平的目的是减少变式的数量，那么，按拉平的原则，人口少的粤语和客家话的倒置双宾应该要被淘汰，只留下人口多的闽语的双宾式。为什么新加坡华语却最终保留了两种双宾式？

以语音来说，闽语和其他汉语方言区别的两项语音特征——“端知不分”和“帮非不分”在拉平过程中被去除。³²譬如：“茶 [t-]”（澄母）、“饭 [p-]”（奉母）等的声母被拉平。“茶”、“饭”在闽、粤、客家方言及国语、新加坡华语中的发音为：

	新加坡华语	国语	梅县	广州	厦门	潮州
茶	[tɕʰa ³⁵]	[tɕʰa ³⁵]	[tsʰa ¹²]	[tʃa ²¹]	[te ²⁴]	[te ⁵⁵]
饭	[fan ⁵¹]	[fan ⁵¹]	[fan ⁴²]	[fan ²²]	[pŋ ³³]	[puŋ ¹¹]

以平列的方式来看，各汉语方言中只有厦门和潮州，即闽语，的声母端知、帮非不分，其他方言的声母端知、帮非分明。由于只有闽语的声母端知、帮非不分，因此，这两条语音规则被拉平。从语音形式的分布情况来看，这似乎说得过去。然而，从方言人口来考虑，根据 1881 年到 1957 年新加坡华族籍贯人口比例统计，由说福建话和说潮州话的华人组成的闽语群体的人口所占比率超过全部华人人口的百分之五十，广东、客家、海南方言群的人口相加起来只占华人人口约百分之三十。从频率上来看，闽语语音形式的使用应该远高于其他方言。按理说，“端知不分”和“帮非不分”这两项闽语的语音特征不会被淘汰，这当中似乎有比“频率”更强的条件控制着拉平的操作。

再往下看。由于闽、粤、客家、海南方言都有入声而国音也保留了入声调，因此，入声在拉平过程中被保留，表现为带有喉塞音韵尾的短促下降调，也就是所谓的第五声。我们将福建话、潮州话、广东话、客家话、海南话的入声韵尾整理成表 4.6：

³² “帮非不分”，即舌头音和舌上音不分，以及“端知不分”，即重唇音（双唇音）和轻唇音（唇齿音）不分，是上古汉语的语音现象。闽语的音系继承了上古汉语的这两项语音特征。

汉语方言	入声韵尾
福建话	[-p] [-t] [-k] [-ʔ]
潮州话	[-p] [-k] [-ʔ]
广东话	[-p] [-t] [-k]
客家话	[-p] [-t] [-k]
海南话	[-p] [-t] [-k] [-ʔ]

表 4.6: 闽、粤、客家、海南方言的入声韵尾

除了潮州话，福建话、广东话、客家话和海南话的入声韵尾都有 [-p] [-t] [-k]。新加坡华语的第五声既然是保留入声，为什么只带喉塞尾而不是南方汉语方言的全套塞音韵尾 [-p] [-t] [-k]？在方言混合与拉平的过程中，似乎有些条件抑制新的语言系统保留全套塞音韵尾。

至于阳声韵，我们先看表 4.7 新加坡华语和福建话、潮州话、广东话、客家话、海南话阳声韵尾的分布情况：

汉语方言	阳声韵尾
新加坡华语	[-n] [-ŋ]
福建话	[-m] [-n] [-ŋ]
潮州话	[-m] [-ŋ]
广东话	[-m] [-n] [-ŋ]
客家话	[-m] [-n] [-ŋ]
海南话	[-m] [-n] [-ŋ]

表 4.7: 新加坡华语和闽、粤、客家、海南方言的阳声韵尾

福建话、潮州话、广东话、客家话、海南话都有双唇鼻音韵尾 [-m]，新加坡华语有 [-n] [-ŋ] 两个鼻音韵尾，没有 [-m]。在柯因内化的观点而论就是，闽方言、粤方言、客家方言等南方汉语方言都有的鼻音韵尾 [-m] 在拉平过程中被淘汰，没有得到保留。就入声韵和阳声韵来说，入声在拉平中较占优势。我们认为，阳声鼻尾 [-m] 之所以比入声先被淘汰是因为汉语方言的入声和阳声韵尾 [-m] 之间存在蕴涵共性。

项梦冰（2010）在讨论《中原音韵》有没有入声时指出，阳声韵 [-m] 对于入声韵有很强的蕴涵性——有 [-m] 的方言有入声韵是很正常的，没有入声韵反而是很奇怪的。换言之，有 [-m] 的方言就有入声韵，但有入声韵的方

言不一定有 [-m]。³³表 4.8 为项梦冰（2010）对汉语方言阳声鼻尾 [-m] 和入声韵的分布所做的统计。

	有入声韵	无入声韵
有[-m]的方言	188 点	1 点 ³⁴
无[-m]的方言	177 点	150 点

表 4.8：汉语方言阳声韵尾 [-m] 和入声韵的分布（项梦冰 2010）

此外，王士元（2000 [1991]）对汉语南北方言音系特征所做的调查也证实阳声韵尾 [-m] 和入声韵之间的蕴涵关系。表 4.9 取自王士元（2000 [1991]）对汉语方言韵尾的分布所做的整理。

³³ 项梦冰（2010）指出，入声韵可以蕴涵入声调。

³⁴ 据项梦冰（2010）的调查，这一点有 [-m] 没有入声韵的方言是光泽。他指出，“就有无入声韵而言，光泽似乎是个例外；但如果放宽标准，只看有没有入声调，那么光泽就不是例外，因为光泽话还有入声调。其实如果就入声韵尾而言，光泽也不是真正的例外，或者说这种例外是有特殊的原因的。”

		-m	-n	-ŋ	~	-p	-t	-k	-ʔ
北京	BJ	-	8	8	-	-	-	-	-
武汉	WH	-	8	5	-	-	-	-	-
成都	CD	-	8	5	-	-	-	-	-
济南	JN	-	-	8	8	-	-	-	-
西安	XA	-	-	8	7	-	-	-	-
太原	TY	-	-	4	5	-	-	-	7
合肥	HF	-	4	2	8	-	-	-	8
扬州	YZ	-	2	5	6	-	-	-	13
苏州	SZ	-	4	8	-	-	-	-	13
温州	WZ	-	-	6	-	-	-	-	*
长沙	CS	-	9	2	3	-	-	-	*
双峰	SF	-	4	2	7	-	-	-	-
南昌	NC	-	12	8	-	-	12	8	-
梅县	MX	5	12	8	-	5	12	8	-
厦门	XM	3	5	6	11	3	5	5	-
潮州	CZ	-	-	9	14	-	-	9	13
福州	FZ	-	-	12	-	-	-	-	12
建瓯	JO	-	-	14	-	-	-	-	*
广州	GZ	3	7	7	-	3	7	7	-
阳江	YJ	4	8	9	-	4	8	9	-

表 4.9: 汉语方言韵尾的分布（王士元 2000 [1991]）

在表 4.9 中我们可以看到，太原、合肥、扬州、苏州等江淮官话有喉塞尾 [-ʔ] 但没有鼻尾 [-m]，而梅县、厦门、广州、阳江既有鼻尾 [-m] 也有塞音韵尾 [-p][-t][-k]。没有一个方言是有鼻尾 [-m] 而没有塞音韵尾的。

基于汉语方言入声和阳声韵尾 [-m] 的蕴涵共性，在方言拉平过程中，面对入声和阳声鼻尾 [-m] 两个可能性，入声会优先获得保留。但是，按柯因内化理论，多数人使用或方言之间有共性的形式会得到保留，由于闽、粤、客家、海南等南方汉语方言都有阳声韵尾 [-m]，因此，按理说，新加坡华语应该要有 [-m] 韵尾。是什么因素抑制阳声韵尾 [-m] 得到保留？这又说明，“频率”不是拉平过程中变式是否获得保留的决定性条件。

从语音方面的几点表现来看，新加坡华人共同语的形成背后似乎有一个优势语言支配拉平过程中变式的去留：

第一，不是所有的方言入声语素都被保留为第五声。我们认为，第五声的依据主要是国音。一个在闽、粤、客家等南方汉语方言里不读入声，但在国音里标作入声而新加坡华人读第五声的例子是“鼻”。

	广韵	闽	粤	客	国音 ³⁵	新加坡华语
鼻	止开三去至并	[p'i]/[p'ĩ]	[pei]	[p'i]	[ㄋ biq]	[piʔ]

再者，Chen（1982a）指在闽、粤、客家等南方汉语方言里是入声但新加坡华人读第五声的“北、百、白”，在国音里的读书音（读音）是入声，其说话音或白话音（语音）非入声。

	广韵	闽	粤	客	国音	新加坡华语
北	曾开一入德帮	[pak]	[pek]	[pet]	[ㄅㄟ beeɪ] (语音) [ㄅㄟ boq] (读音)	[pei ²¹⁴]
百	梗开二入陌帮	[paʔ]	[pak]	[pak]	[ㄅㄞ̌ bae] (语音) [ㄅㄞ̌ boq] (读音)	[pai ²¹⁴]
白	梗开二入陌并	[peʔ]	[pak]	[p'ak]	[ㄅㄞ̌ bair] (语音) [ㄅㄞ̌ boq] (读音)	[pai ³⁵]/[pai ²¹⁴]

另外，黄颖瑜（2012）的考察发现，有些在新加坡华语里读第五声的语素虽然源自中古入声，但在南方汉语方言里表达相同意义的语音形式不是入声。譬如：“哭”、“说”等在中古是入声，在新加坡华语里读第五声，但闽、粤、客等南方汉语方言里表达相同意义的语音形式不是入声。

³⁵ 根据 1932 年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编《国音常用字汇》。下同。

	广韵	闽	粤	客	国音	新加坡华语
哭	通合一入 屋溪	[hau]/ [k'au]	[ham]	[kiau]	[ㄅㄨˊ kuq]	[k'uʔ]
说	山合三入 薛书	[kɔŋ]	[kɔŋ]/ [wa]	[kɔŋ]/ [va]	[ㄕㄨㄛˊ shuoq]	[suoʔ]/[soʔ]

上表显示，“哭”和“说”在国音里是入声。虽然这些语素源自中古入声，但由于华人没有直接接触中古语音，却于早期从中国南来的老师那里习得国音，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第五声是国音遗留而非直接源自中古入声，也不单纯如以往学者所认为的是中古入声语素通过南方汉语方言的保留而投射到华语的音节结构。

第二，国音除了保留入声，也在北京音系的基础上增加了疑母洪音 [ŋ]。中古疑母字如“我、俄、偶、傲、熬、捱、岸、昂”等在第一代和第二代华人的发音里声母都是舌根鼻音 [ŋ-]。这可能是保留方言的语音形式，因为中古疑母字在闽、粤、客家、海南方言里的声母都是 [ŋ-]。值得注意的是，中古疑母字在国音里的声母也是 [ŋ-]（兀）。我们接着看其他语音现象就会发现，以往学界认为纯粹源自南方汉语方言的语音形式，在国音里也有相同的表现。

第三，当声母为双唇音 [p-][p'-][m-] 和唇齿音 [f-]，韵母 [-əŋ] 一般被发成 [-oŋ]。如：“捧 [p'oŋ²¹⁴]、峰 [foŋ⁵⁵]、梦 [moŋ⁵¹]”等。在闽、粤、客家等南方汉语方言里，这些字的韵母或为 [-oŋ]，或为 [-uŋ]。这些字在国音里的韵母均为 [-uŋ]（ㄨˊㄥ）。

第四，在国音里，“荣、融、容、溶、熔”等中古喻母字读 [juŋ]（ㄐㄨˊㄥ）。在闽、粤、客家等南方汉语方言里，除了“荣”，“融、容、溶、熔”等读 [juŋ] 或 [-ioŋ]/[-iuŋ]。³⁶由于“荣、融、容、溶、熔”等字在国音和方言中的音节结构为零声母或以半元音为首，因此，它们不同于现代标

³⁶ “荣”在广州话读 [wɪŋ]，在厦门话读 [ɪŋ]，在梅县客家话读 [iuŋ]。

准汉语里其他由 [z̥] 管辖的音节，不读作 [zon̩]，而是跟着国音与方言共有的形式，读 [jon̩]。³⁷

第五，再看撮口呼和齐齿呼。“略、掠、岳、约、乐、确、却、觉、虐、学、爵、嚼”等在国音里的韵母是 [-io]（ㄩㄛ），为齐齿呼。华人移民所使用的五个主要南方汉语方言中，只有粤语有撮口呼。因此，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在拉平过程中，撮口呼简化成齐齿呼；这也是基于省力原则的言语适应行为。

第六，华人移民所使用的五个主要南方汉语方言中，只有客家话有复韵母 [-uo]。复韵母 [-uo] 看似因少数说话人使用而被简化为单韵母。第一代和第二代华人的发音里基本上没有复韵母 [-uo]，如：“做、多、左、托、拖、拓、搓、昨、朵、梭”等分别读 [tso⁵¹]、[to⁵⁵]、[tso²¹⁴]、[t'o⁵⁵]、[t'o⁵⁵]、[t'o⁵¹]、[ts'o⁵⁵]、[tsoʔ]、[to²¹⁴]、[soʔ]。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字在国音里的韵母也都为 [-o]（ㄛ）。

以上六个语音现象说明，由学者和老师带来的国音在方言拉平过程中似乎被当作标准音，对语音形式的保留或淘汰起着决定性作用。这还表现在第一代和第二代华人发音里的复韵母 [-uei]，如：“内 [nuei⁵¹]、泪 [luei⁵¹]”等。闽语、粤语、客家话、海南话都没有复韵母 [-uei]，因此，华人发音里的复韵母 [-uei] 最有可能来自国音，而“内、泪”等在国音里的韵母确实为 [-uei]（ㄨㄟ）。

4.3 柯因内化不能解释的问题

以上，我们尝试应用柯因内化理论理清新加坡华语的形成机制。然而，柯因内化的拉平机制对于新加坡华语为什么有某些结构却没有另一些结构不能提供完善的解释。这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新加坡华语的形成不是一种柯因内化；（二）理论不完善，也就是说，以往研究成果所总结的

³⁷ 我们在第三章介绍新加坡华语语音特征的部分指出，新加坡华人将音节 [z̥on̩] 读作 [jon̩]，而出现在其他语音环境的舌尖后浊擦音声母 [z̥] 有两种发音，即 [z̥-] 和 [l-]。

“频率”和“标记性”不是决定语言变项去留的绝对条件，还有比“频率”和“标记性”更强的条件在控制着方言拉平。

虽然就接触模式而言，新加坡华语的生成环境与柯因内语形成的背景相类似，但要解决新加坡华语的形成问题，不能单凭文史资料做判断，而需要语言本体材料的支持。

就新加坡华语在语音方面的表现来说，方言拉平过程中似乎有一个标准音在支配语音变项的去留，而一系列证据似乎也证明了这一标准音是国音。这就是说，标准音超越所有其他条件，是决定语音变项去留的关键。譬如说，新加坡华语之所以有第五声却没有阳声韵尾 [-m] 是由于国音有入声但没有阳声韵尾 [-m]。此外，新加坡华语的第五声带喉塞尾 [-ʔ] 而非保留南方汉语方言的全套塞音韵尾 [-p][-t][-k] 也是由于国音主要采用南京话的形式；南京话的入声带喉塞尾 [-ʔ]，而不是塞音韵尾 [-p][-t][-k]。以上论述看起来好像都成立，但是，国音有轻声和儿化，新加坡华语没有。这违反了国音作为标准音所起的支配作用。轻声和儿化是国语的构词手段，若国音是支配语音变项去留的关键，那么，新加坡华语理应要有轻声和儿化。

另外，为减少变式的数量，按拉平的原则，人口少的粤语和客家话的倒置双宾应该要被淘汰，只留下人口多的闽语的正双宾。为什么新加坡华语却最终保留了两种双宾式？这也是柯因内化解释不了的问题。

4.4 可能的解释

我们从语言内部机制和语言习得两方面考虑，尝试解答以上问题。

4.4.1 基于语言内部机制提出的观点

新加坡华语有第五声且带喉塞尾，但没有阳声韵尾 [-m]；有两种双宾语语序，即〔动词＋间接宾语／指人宾语＋直接宾语／指物宾语〕及〔动词＋直接宾语／指物宾语＋间接宾语／指人宾语〕。就语言事实而言，新加坡华语的结构类型趋近于南方官话的结构类型。

南方官话不同于广义上的南方地区的官话。南方官话是刘勋宁（1995）基于音韵特征提出的汉语官话三大分区中的一个分区。刘勋宁根据入声分化类的多寡，将官话方言分为三类：西南官话和江淮官话为一类，古入声或保留为入声，或归入阳平；中原官话和兰银官话为一类，古入声字按声母清浊一分为二，全浊为阳平，清声母和次浊声母或归阴平，或归去声；其他四个官话，即胶辽官话、东北官话、北京官话和冀鲁官话，为一类，古入声字按声母清浊一分为三，全浊为阳平，次浊声母归去声，清声母或归上声，或归阴平，或派入阴、阳、上、去四声。刘勋宁指出，这种分类与地理形势以及历史上发生过的政治、经济、文化演进的过程相一致：古入声一分为二的地区，正是历史上长期作为政治、文化活动中心的中原地区，故将中原官话和兰银官话并为一大类，统称中原官话；古入声一分为三的地区则属于后起的新兴重心区，包括河北、山东一片以及向东北的延伸，故将胶辽官话、东北官话、北京官话和冀鲁官话并为一大类，称之为北方官话；而人们所谓的南方，古入声则整类转变，没有分化，故将西南官话和江淮官话并为一大类，称之为南方官话。表 4.10 为刘勋宁（1995）所整理的古入声字在官话方言里的调类：

	胶辽 官话	东北 官话	北京 官话	冀鲁 官话	中原 官话	兰银 官话	西南 官话	江淮 官话
古清音	上声	阴阳 上去	阴阳 上去	阴平	阴平	去声	阳平	入声
古次浊	去声							
古全浊	阳平							

表 4.10：古入声字在官话方言里的分化情况（刘勋宁 1995： 59）

明清时期，中国南方通用南方官话，而南京官话在南方官话中有一定声望，（麦耘、朱晓农 2012： 344）这是由于在明末清初，南京官话在福建和广东（包括澳门）等地的文人中有较高声望。（麦耘、朱晓农 2012： 344）南方官话有入声且带喉塞尾是南方官话与其他汉语官话方言区别之处。在南方官话里，阳声韵尾 [-m] 并为 [-ŋ]。句法上，南京官话两种双宾句式 [动词+

间接宾语+直接宾语]（给他一本书）和[动词+直接宾语+间接宾语]（给一本书他）并存。

新加坡华语在结构类型上和南方官话相近不是巧合。根据文史资料，新加坡早期的华人移民社会除了闽、粤、客家、海南等各种南方汉语方言，还有文人带来的国语和这些方言并存。凭借共时的语言材料我们推断，方言混合而后拉平的过程中，方言人口、变项的使用频率、方言共性会影响变项的去留，但结构类型控制了整个操作。方言混合以南方汉语方言占多数，按理说所形成的共同语的类型应该会是典型的南方类型，但由于当中还混了基础方言是北京话的国语，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新的语言系统彻底往南方汉语类型发展。方言变项之间的互动与相互竞争受到方言结构类型制约——入声因其优势而先获得保留，阳声韵尾 [-m] 最终被阻挡而淘汰，更确切地说，新加坡华语形成机制中的拉平实际上是方言结构类型的拉平，即南方类型与北方类型之间的协商与妥协。结果是，从语音方面来说，新加坡华语表现南方汉语的特征却不完全保留南方汉语的结构，因此在类型上的表现趋近于南方官话——不是典型的南方汉语的类型，亦非典型的北方汉语。

必须指出，国语在新加坡华语的形成过程中不是作为上层语言，而是与其他南方汉语方言并行共存，因为根据文史资料，国语不是第一代华人移民在本身的母语（主要是南方汉语方言）之外所学习的第二语言。即使是在学校，其教学媒介语也是方言。若真要说上层语言，福建话是各方言群体之间相互沟通时所使用的共同方言，也是新加坡政府强力推行华语以前的“竞选语言”。但若要说新加坡华语在福建话的基础上形成，那么，新加坡华语应该保留最多的是闽南方言的结构特征。可是，闽语最能与其他汉语方言区分的两项语音特征——“端知不分”和“帮非不分”没有保留到新加坡华语。以此推翻福建话作为基础方言的可能性。

以上是从语言内部机制来考虑而提出的观点。下面我们从语言使用者的角度出发来探讨新加坡华语没有阳声韵尾 [-m] 的原因。

4.4.2 基于语言习得提出的观点

从历史背景来看，第一代华人移民和第二代华人的语言使用情况是在说方言的同时又要学华语。所谓“学华语”，即 Krashen (1981) 所谓“习得” (acquisition)，是一种无意识、自然而然学习第二语言的过程。也就是说，学习者通常意识不到自己在习得语言，而是在自然交际中不知不觉学会了第二语言。³⁸

按柯因内化的拉平原则，既然福建话、潮州话、广东话、客家话、海南话等南方汉语方言都有阳声韵尾 [-m]，那么，方言共有的这一语音形式应该会保留到华语。事实是，新加坡华语的音节结构不包含双唇鼻音韵尾[-m]。

根据标记理论，“汉语韵尾辅音的非自然性：唇音大于软腭音；就韵尾鼻音的非自然性而言，其排列顺序为：[m] >> [ŋ]。因此，软腭鼻音比唇鼻音在汉语韵尾更具自然性，即无标记性。”（张吉生 2007：295）Lass (1984：132) 指出，一个有标记的音段在语言习得时较晚出现。由于双唇鼻音韵尾 [-m] 相对于另外两个鼻音韵尾 [-n] 和 [-ŋ] 来说更具标记性和非自然性，新加坡华人因此在习得华语时将之排除，选择保留更具自然性的两个鼻音韵尾 [-n] 和 [-ŋ]。

此外，从音节结构来看，方言的语音规则，如：中古见组声母保留舌根音，既然被拉平了，那么，韵母若保留方言的形式就会造成一个音节中出现双重规则，进而导致发音困难。我们具体以下面这个例子来说明。

³⁸ 第二语言习得分分为两大流派：行为主义学说 (behaviorism) 和固有观念学说 (innatism)。行为主义学说认为，学习者与其周围环境的交流导致语言习得；固有观念学说强调语言学习的关键是人内在和先天的因素，认为人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语言机制 (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Stephen Krashen 的第二语言习得理论的核心和出发点是他对“习得” (acquisition) 和“学得” (learning) 的区分。根据 Krashen 的理论，成人通过两条截然不同的途径逐步习得第二语言能力。第一条途径是“语言习得” (language acquisition)，这是一种无意识、自然而然学习第二语言的过程。第二条途径是“语言学习” (language learning)，是通过正规的语言教学，即教师讲解语言结构和语法规则，辅之以有意识的练习、记忆等活动，达到对所学语言的了解和掌握。

	新加坡华语	梅县	广州	厦门	潮州
金	tsin ⁵⁵	kim ⁴⁴	kɛm ⁵³	kim ⁵⁵	kim ³³

“金”是中古见组字，在梅县、广州、厦门、潮州等南方汉语方言里的声母是舌根塞音 [k-]，新加坡华人在说华语时将“金”的声母发成塞擦音 [ts-]。也就是说，华人在声母的发音上已经转向北方话的形式。在这种情况下，韵尾的语音形式也会跟着变。若只有声母变了而韵尾保留方言的形式，那一个音节中就会出现双重规则，不利于发音。既然这样，带喉塞尾的第五声是方言的形式，为什么就能保留？这是因为 [-ʔ] 是没有口腔发音机制的塞音。³⁹（Chomsky & Halle 1968: 293-329; Clements 1985: 223-252 等）当塞音 [-p][-t][-k] 失去口腔发音机制时，其结果就变成 [-ʔ]。因此，就发声态来说，发喉塞音不费力。这也是为什么新加坡华人将第五声发成带喉塞尾而不是在韵尾的发音上保留南方汉语方言的全套塞音韵尾 [-p][-t][-k]。

从语言使用者的角度来看，之所以在韵尾上保留喉塞音而淘汰双唇鼻音 [-m]，是因为按发音理据，产生一个鼻音比产生一个塞音复杂，鼻音比塞音多一个发声方式，即 [鼻音性]。（张吉生 2007: 292）这也是基于省力原则（Zipf 1949）的言语适应行为。

另一方面，由于第一代和第二代华人是习得而非学得华语，因此，他们在自然交际中不知不觉掌握华语的句式而不是有意识地学习华语的句法规则。以双宾式为例。华人在交际中接触两种双宾语语序，即 [动词+直接宾语+间接宾语] 和 [动词+间接宾语+直接宾语]，但由于 [动词+直接宾语+间接宾语] 和 [动词+间接宾语+直接宾语] 只是语序不同，两者的表

³⁹ 张吉生（2007: 292）：“所谓非口腔化（debuccalization 或 deoralization）是指辅音音段失去口腔发音机制的音系过程。辅音与元音的区别就在于前者发音时必定包含口腔某个发音部位对气流的明显阻碍。如一个辅音音段失去口腔发音机制，即失去发音部位，就失去了辅音性。非口腔化常发生在塞音、塞擦音、鼻音，它可以是一个历时变化过程，也可以是一个共时音系规则（如一种西班牙语的方言，辅音前的 [s] 往往非口腔化变成 [h]: mismos‘相似的’读作 [mihmoh]（Trask 1996: 78））……音系学家们（如 Chomsky & Halle 1968: 293-329; Clements 1985: 223-252 等）普遍认为，声门音（包括 [ʔ h ɦ]）的发音没有口腔部位的作用……”

意功能无异，这在认知上不构成显著刺激，因此，语言使用者也就忽略语序规则而两种双宾式兼用。

第五章 结论

关于新加坡华语及新加坡华语的形成,学界普遍认为,新加坡华语基本上以中国普通话为基础,但是,由于所处的社会背景和语言环境不同,华语从英语、马来语等外语中吸收了一些外来成分,又从方言中吸收了一些成分,因此,华语有别于普通话而具有自己的特色。(吴英成 1985;汪惠迪 1999;李临定、周清海 2002;Chua 2003;祝晓宏 2008 等)再者,学界也在第二语言习得层面上进行论述。学界普遍认同的观点为:以方言为母语的新加坡华人因不完善学习,将方言的结构特征应用到华语,使新加坡华语具有闽语、粤语、客家话等南方汉语方言的某些特征。譬如:Chen (1982b)和Chua (2003)认为,由于新加坡华人的祖籍方言,即福建话、潮州话、广东话、客家话、海南话等,没有舌尖后擦音和塞擦音 [tʂ tʂ' ʂ],因此,新加坡华人在学习华语时不能掌握这些发音。

根据文史资料记载,十九世纪中叶,华人移民到新加坡,当时新加坡没有强制教育,因此,学校也没有统一的教学媒介语,各源流学校并存,且华校和私塾以汉语方言教学。在这种情况下,除了殖民政府的语言——英语,华人社群内部根本没有一种标准语作为学习目标。此外,当时华人的文化水平不高,主要都是为生活打拼,基本上都不在意语言的学习,只要彼此间能进行沟通就好。这也造就了一个方言混杂的背景。

关于新加坡华语如何形成这个问题,学界一直都是通过解释语言现象,将新加坡华语的形成指向方言干扰。我们认为,这主要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接触语言学上所谓干扰,是有一个目标语言作为基础,目标语和语言使用者的母语接触,受母语干扰而发生变异,最后形成一个新的语言。一般上,这种干扰源于语言社群对目标语的不完善学习。目前学界对新加坡华语所持的看法就是:母语为南方汉语方言的华人在转用华语时,因不完善学习,将方言的某些特征带入华语。换句话说,新加坡华语是标准华语(即现代标准汉语)经方言干扰发生变异而形成的一种汉语变体。问题是,

早期华人移民社群中并没有所谓的标准华语，更别说将华语当作第二语言学习。这就如 Britain (2012) 在讨论柯因内化的方法问题时所用的烘焙比喻：我们虽然都尝过蛋糕，但就是有些人错估了蛋糕的用料或没有跟对食谱。

另一方面，方言干扰或许能解释新加坡华语所具有的结构源头及成因，但对于新加坡华语所没有的结构，譬如：南方汉语方言有阳声韵尾[-m]，但这一显著的南方方言特征却不干扰华语的音节结构，像这样的问题，方言干扰解释不了。换言之，方言干扰不能解释新加坡华语为什么有某些结构却没有另一些结构。

本文在柯因内化理论框架中讨论了新加坡华人社群中的汉语方言如何混合、方言如何进行拉平以减少方言变项、简化、重新定位等过程。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新加坡华语是在一个彼此有亲缘关系的方言混合并相互接触的环境中形成的一个新的方言。说不同方言的人在交流中的言语适应行为使形式各异的方言变项进行协商与妥协，最后融合成一个华人之间可以互相通话的语言。可是，我们不能单凭柯因内化一个理论就把新加坡华语的形成机制说明白。为完善对新加坡华语的形成机制的讨论，我们进一步从语言内部机制和语言习得两方面进行考虑。

按 Krashen 第二语言习得理论对“习得”和“学得”的区分，第一代华人移民和第二代华人是在自然交际中不知不觉习得华语的。这也就是说，语言使用者掌握的是语言的形式而非语法规则。因此，语言使用者在使用某个句式时往往会忽略句法规则，只讲究该句式是否满足表意目的。这也是为什么新加坡华语有表意功能相同但语序或组成成分不同的两种句式并存的情况，如：〔动词+到+补语〕和〔动词+得+补语〕都表状态、〔动词+直接宾语+间接宾语〕和〔动词+间接宾语+直接宾语〕两种双宾语语序的表意功能基本无异。

另外，我们凭借共时的语言材料推断，方言混合而后拉平的过程中，方言人口、变项的使用频率、方言共性会影响变项的去留，但结构类型控制

了整个操作。我们认为，新加坡华语形成机制中的拉平实际上是方言结构类型的拉平，即南方汉语方言类型与北方汉语方言类型之间的协商与妥协。结果是，新加坡华语在结构类型上的表现趋近于南方官话——不是典型的南方汉语的类型，亦非典型的北方汉语。

就共同语化而言，华语成为新加坡华人的共同语和普通话成为中国不同民族进行沟通交流的共同语，两者在本质上有所不同。普通话成为共同语有一个基础方言，即以北京语音为基础音，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华语则是在各种汉语方言平行使用、没有设定基础方言的环境下经过方言间的反复磨合才形成的一个共同语。换句话说，同样作为共同语，普通话是一个既定的语言系统，而新加坡华语是经过言语适应、拉平等过程才逐渐成形。

从标准语、语言政策、语文教育的转变以及说话人的角度来看，新加坡华人社群的共同语——华语实际上是一个连续体（continuum）。

语言是变动的结构系统。（陆俭明 2005：3）Labov（1972）的研究也证明，语言是按照社区阶层和性别等社会分类而成系统地变化的。在新加坡华人社群语言使用的变动中，华语一直处于波动的位置。若非讲华语运动的推行，华人可能到今天还普遍使用方言沟通，鸡同鸭讲；然而，双语教育所带来的英语的优势地位又使得年轻一代华人不那么重视华语。普遍上，年轻一代华人的第一语言是英语，若家庭用语不是华语，那么，华语就只作为第二语言在学校学得。由于年轻人的思维模式以第一语言为主，他们所说的华语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英语干扰。也就是说，华语从第一代华人移民发展到后面几代人，不同年龄层的华语，其形成机制也不一样。关于新加坡华语，还有很多方面值得研究。

参考文献

中文

- [1]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学教研室编（1964）《汉语方言词汇》，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
- [2]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学教研室编（1989）《汉语方音字汇》（第二版），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
- [3] 曹晋（2005）《“V 掉”、“V 成”、“V 住”三个汉语述结式的语法化》，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4] 曹志耘（2004）《地理语言学及其在中国的发展》，《北京语言大学汉语语言学文萃·方言卷》，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 [5] 陈保亚（1996）《论语言接触与语言联盟》，北京：语文出版社。
- [6] 陈重瑜（1981）《本地华语里声调的问题》，载《语文》第 7 期，页 38-42。又见陈重瑜（1993）《华语研究论文集》，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华语研究中心，页 273-282。
- [7] 一（1983）《新加坡华语——语法与词汇特征》，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华语研究中心。又见陈重瑜（1993）。
- [8] 一（1986）《新加坡华语语法特征》，载《语言研究》第 1 期，页 138-152。
- [9] 一（1993）《华语研究论文集》，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华语研究中心。
- [10] 陈法今（1982）《闽南方言的两种比较句》，载《中国语文》第 1 期。
- [11] 陈建民（1984）《汉语口语》，北京：北京出版社。
- [12] 一（1986）《北京口语的语体比较》，载《修辞学习》第 4 期。
- [13] 陈洪磊（2009）《“V 掉”的句法语义分析及“掉”的虚化探索》，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14] 陈琪（2008）《新加坡华语词语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15] 陈松岑（1985）《社会语言学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16] 陈章太、李如龙（1991）《闽语研究》，北京：语文出版社。
- [17] 崔贵强（1994）《新加坡华人：从开埠到建国》，新加坡：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教育出版私营有限公司。
- [18] 邓思颖（2015）《粤语语法讲义》，香港：商务印书馆。
- [19] 丁声树编录、李荣参订（1981）《古今字音对照手册》，北京：中华书局。
- [20] 董秀芳（2004）《汉语的词库与词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21] 房玉清（1992）《实用汉语语法》，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页 146-149。
- [22] 冯爱珍（1993）《福清方言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3] 高本汉著；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译（1937）《中国音韵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 [24] 高华年（1980）《广州方言研究》，香港：商务印书馆。
- [25] 郭熙（2006）《论“华语”》，载谭慧敏《汉语文走向世界》，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页37-56。
- [26] 一（2007）《华文教学概论》，北京：商务印书馆。
- [27] 郭振羽（1976）《从社会学观点论新加坡的语言》，新加坡：南洋大学华语研究中心。
- [28] 一（1985）《新加坡的语言与社会》，新加坡：正中书局。
- [29] 一（1996）《大众传播和语言》，载云惟利《新加坡社会和语言》，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页75-90。
- [30] 何耿镛（1993）《客家方言语法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 [31] 黄伯荣（1996）《汉语方言语法类编》，青岛：青岛出版社。
- [32] 黄伯荣、廖序东主编（2002）《现代汉语》（增订三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 [33] 黄雪霞（2011）《新加坡华语词汇五十年发展变化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34] 黄颖喻（2012）《新加坡华语“第五声”的起因再探》，Proceedings of the URECA @ NTU 2011-2012。
- [35] 贾益民、许迎春（2005）《新加坡华语特有词语补例及其与普通话词语差异分析》，载《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第4期，页32-49。
- [36] 劲松（2002）《现代汉语轻声动态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 [37] 李蓝（2003）《现代汉语方言差比句的语序类型》，载《方言》第3期，页214-232。
- [38] 李临定、周清海（2002）《新加坡华语词汇和中国普通话词汇比较》，载周清海主编《新加坡华语词汇与语法》，新加坡：玲子传媒，页151-331。
- [39] 李如龙（2001）《汉语方言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 [40] 一（2007）《关注汉语口语与书面语词汇的研究》，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页110-116。
- [41] 李新魁（1994）《广东的方言》，广东：人民出版社。
- [42] 李新魁、黄家教、施其生、麦耘、陈定方（1995）《广州方言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
- [43] 李永明（1959）《潮州方言》，北京：中华书局。
- [44] 林立芳（1997）《梅县方言语法论稿》，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 [45] 刘丹青（2001）《汉语给予类双及物结构的类型学考察》，载《中国语文》第5期。
- [46] 刘慧博（2010）《新加坡华语与普通话的分歧研究》，黑龙江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 [47] 刘宏（2003）《新加坡华人社团与教育：变迁中的互动关系（1945-1954）》，台北：中央研究院蔡元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亚太区域研究专题中心。
- [48] 刘勋宁（1995）《再论汉语北方话的分区》，载《中国语文》第6期。
- [49] 刘焱（2007）《“V掉”的语义类型与“掉”的虚化》，载《中国语文》第2期，页133-142。
- [50] 刘月华（2001）《实用现代汉语语法》，北京：商务印书馆。
- [51] 刘子平编著（2013）《汉语量词大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 [52] 卢绍昌（1981）《试论推广华语的问题：华语声调的体现》，新加坡：新加坡中学华文教师会。
- [53] 一（1984）《华语论集》，新加坡：[出版社不详]。
- [54] 一（1990）《新加坡华语词汇的考察》，载新加坡华语研究会编《世界华语教学研讨会论集》。
- [55] 一（2003）《华语声调的体现》，载卢绍昌、谢泽文、梁春芳、周维介、吴英成《新加坡华文教学论文三集》，新加坡：泛太平洋出版社。
- [56] 鲁川主编（1994）《动词大词典：人机通用》，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
- [57] 鲁允中（2001）《轻声和儿化》，北京：商务印书馆。
- [58] 陆俭明（1988）《双宾结构补议》，载《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页31-35。
- [59] 一（2005）《作为第二语言的汉语本体研究》，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60] 一（2007）《汉语走向世界与“大华语”的概念》，载徐大明《中国社会语言学新视角——第三届中国社会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页17-22。
- [61] 陆俭明、张楚浩、钱萍（2002）《新加坡华语语法的特点》，载周清华主编《新加坡华语词汇与语法》，页77-147。
- [62] 吕叔湘（1999）《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
- [63] 罗杰瑞（1995）《汉语概说》，北京：语文出版社。
- [64] 梁银峰（2006）《汉语动补结构的产生与演变》，上海：学林出版社。
- [65] 麦耘、朱晓农（2012）《南京方言不是明代官话的基础》，载《语言科学》第11卷第4期，页337-358。
- [66] 朴奎容（2000）《谈“V掉”中“掉”的意义》，载《汉语学习》第5期，页12-14。
- [67] 潘家福（2008）《新加坡华社的多语现象与语言接触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68] 彭小川（1993）《广州话的结构助词“到”》，载《广州话研究与教学》，中山大学出版社。

- [69] 桥本万太郎 (1985) 《语言地理类型学》，余志鸿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70] 桥本万太郎 (2008) 《语言地理类型学》，余志鸿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 [71] 沈家煊 (2003) 《现代汉语“动补结构”的类型学考察》，载《世界汉语教学》第3期，页17-23。
- [72] 田惠刚 (1994) 《海外华语与现代汉语的异同》，载《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页73-79。
- [73] 汪惠迪 (1990) 《新加坡华语词汇的特点》，载新加坡华文研究会编《新加坡世界华文教学研讨会论文集》，页346-356。
- [74] 一 (1999) 《时代新加坡特有词语词典》，新加坡：联邦出版社。
- [75] 一 (2002) 《新加坡华语特有词语探微》，载周清海主编《新加坡华语词汇与语法》，页27-73。
- [76] 一 (2007) 《新加坡、马来西亚华语规范的策略》，《联合早报》全球华语论坛，新加坡，11月16日。
- [77] 王洁 (2009) 《区域变异与互动视角下的华语新词新义研究》，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78] 王力 (1958) 《汉语史稿》，北京：科学出版社。
- [79] 王士元 (2000) 《语言的探索：王士元语言学论文选译》，石锋等译，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 [80] 吴福祥 (2001) 《南方方言几个状态补语标记的来源（一）》，载《方言》第4期，页344-354。
- [81] 一 (2002) 《南方方言几个状态补语标记的来源（二）》，载《方言》第1期，页24-34。
- [82] 一 (2007) 《关于接触引发的语言演变》，载《民族语文》第2期，页3-23。
- [83] 一 (2009) 《南方民族语言里若干接触引发的语法化现象》，第四届汉语语法化问题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提要。
- [84] 吴英成 (1985) 《新加坡华语语法研究》，国立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学士论文。
- [85] 一 (2007) 《新加坡双语教育政策的沿革与新机遇》，《台湾语言学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纪念台湾语言学先驱小川尚义教授》讲义，台中：国立台中教育大学，9月8日—9月9日。
- [86] 一 (2010) 《汉语国际传播：新加坡视角》，北京：商务印书馆。
- [87] 夏琳娜 (2003) 《新加坡华语“第五声”在不同年龄层的出现频率》，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荣誉学士学位毕业论文。
- [88] 项梦冰 (2010) 《从现代方言看〈中原音韵〉的入声之争》，中国语言的比较与类型学研究国际研讨会，香港科技大学中国语言研究中心主

- 办、南昌大学语言类型学研究所协办，香港：香港科技大学，2010年5月8—9日。
- [89] 项梦冰、曹晖（2005）《汉语方言地理学——入门与实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 [90] 谢燕燕（2013）《方言在本地已边缘化，但仍有生命力》，载《联合早报》2013年10月6日。
- [91] 谢永昌（1994）《梅县客家方言志》，广东：暨南大学出版社。
- [92] 新加坡推广华语理事会编（2000）《华人·华语·华文》，新加坡：推广华语理事会。
- [93] 邢福义（2005）《新加坡华语使用中源方言的潜性影响》，载《方言》第2期，页175-181。
- [94] 刑贺（2005）《现代汉语“掉”的语义认知分析》，上海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95] 徐大明（2003）《华语与华人社会》，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 [96] 一主编（2006）《语言变异与变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97] 徐杰（2007）《语言规划与语言教育》，上海：学林出版社。
- [98] 徐杰、王惠编（2004）《现代华语概论》，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
- [99] 许小颖、吴英成（2001）《新加坡华语“第五声”遗失过程中的“词汇扩散”现象》，载《新世纪的现代语音学》，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 [100] 许迎春（2006）《新加坡华语特色词语考察——以〈联合早报〉为例》，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101] 叶经韬（1986）《“掉”是时态助词吗？》，载辞书研究编辑部编《疑难字词辨析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 [102] 余尚兵（2002）《多元文化与新加坡华文词汇发展》，载《语文通讯》第74期，页26-29。
- [103] 余志鸿（2000）《语言接触与语言结构的变异》，载《民族语文》第4期。
- [104] 杨秀芳（1991）《从历史语法的观点论闽南语“了”的用法——兼论完成貌助词“矣（也）”》，载《台大中文学报》第4期，页213-284。
- [105] 袁家骅（1960）《汉语方言概要》（第二版），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
- [106] 曾玲（2003）《越洋再建家园：新加坡华人社会文化研究》，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
- [107] 詹伯慧（1991）《汉语方言及方言调查》，湖北：湖北教育出版社。
- [108] 张伯江、方梅（2007）《汉语功能与语法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109] 张从兴（2003）《华人、华语的定义问题》，载《语文建设通讯》（香港）第74期。
- [110] 张洪年（1972）《香港粤语语法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学。

- [111] 张吉生 (2007) 《汉语韵尾辅音演变的音系理据》，载《中国语文》第4期，页291-383。
- [112] 张敏 (2003) 《历时类型学与汉语历史语法的新课题》，新世纪汉语史发展与展望国际研讨会，浙江杭州，12月26-30日。
- [113] 一 (2010) 《汉语方言双及物结构南北差异的成因：类型学研究引发的新问题》，载《中国语言学报》第4卷第2期，页82-270。
- [114] 一 (2011) 《在类型学和接触语言学新视野中重申汉语语法特点及其成因》，首届中国语言学方法与方法论问题学术讨论会论文。
- [115] 张庆文、邓思颖 (2014) 《共性与差异：粤方言名词短语研究》，载《语言暨语言学》Language & Linguistics 15 (5)，页733-760。
- [116] 张洵如编 (1957) 《北京话轻声词汇》，北京：中华书局。
- [117] 张贻胜 (2013) 《新加坡华语韵母 [-əŋ] 变 [-ən] 的发音变化及其社会意义》，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荣誉学士学位论文。
- [118] 赵艳芳 (2001) 《认知语言学概论》，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119] 赵元任 (1952) 《北京口语语法》，李荣编译，中国青年出版社。
- [120] 周长楫 (1991) 《闽南话与普通话》，北京：语文出版社。
- [121] 一编撰；李荣主编 (1998) 《厦门方言词典》，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 [122] 周长楫、欧阳忆耘 (1998) 《厦门方言研究》，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
- [123] 周长楫、周清海 (2000) 《新加坡闽南话概说》，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 [124] 周长楫、周清海 (2002) 《新加坡闽南话词典》，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125] 周磊磊 (1999) 《“掉”的语法意义及其他》，载《六安师专学报》第2期，页61-63。
- [126] 周烈婷 (1998) 《新加坡华语和普通话几个词语的比较》，载《词库建设通讯》第15期，页18-20。
- [127] 一 (1999) 《从几个例子看新加坡华语和普通话的词义差别》，载《语言文字应用》，第1期。
- [128] 周清海、萧国政 (1999) 《新加坡华语词的词形、词义和词用选择》，载《中国语文》第4期。
- [129] 周清海、周长楫 (1998) 《新加坡闽南话与华语》，载《联合早报》10月20日。
- [130] 周清海 (2002) 《新加坡华语变异概说》，载《中国语文》第6期。又见周清海主编《新加坡华语词汇与语法》。
- [131] 一主编 (2002) 《新加坡华语词汇与语法》，新加坡：玲子传媒。
- [132] 一 (2006) 《新加坡华语和普通话的差异与处理差异的对策》，载《联合早报》3 (21, 23)：言论版。

- [133]—（2007）《论全球化环境下华语的规范问题》，载《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
- [134]—（2009）《变动中的语言：现代汉语和华语》，新加坡：玲子传媒。
- [135]—（2014）《全球化环境下中文的研究与教学问题》，第六届世界华语文教学研究生论坛，1月18至19日，台中：国立台中教育大学。
- [136]周一民（1998）《北京口语语法·词法卷》，北京：语文出版社。
- [137]—（2005）《北京话的轻音和语法化》，载《绍兴文理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
- [138]周有光（2001）《21世纪的华语和华文》，北京：语文现代化与汉语拼音方案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 [139]朱德熙（1982）《语法讲义》，北京：商务印书馆。
- [140]—（1987）《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对象是什么》，载《中国语文》第5期。又见袁毓林编（2001）《朱德熙选集》，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页77-92。
- [141]—（2007）《语法讲义》，北京：商务印书馆。
- [142]竺家宁（1992）《声韵学》，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143]祝晓宏（2008）《新加坡华语语法变异研究》，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144]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1999 [1981]）《方言调查字表》，北京：商务印书馆。
- [145]庄永康（2014）《宜将“话语”还民间》，载《怡和世纪》2014年10月—2015年1月号，总第24期。

英文

- [1] Aikhenvald, Alexandra Y. 2007. Grammars in contact: A cross-linguistic perspective. In Aikhenvald, Alexandra Y. and R.M.W. Dixon (eds). *Grammars in Contact: A Cross-linguistics Typolo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1-66.
- [2] Bhat, D. N. S. 2000. Word class and sentential functions. In Vogel, P. M. & Bernard Comrie (eds). *Approaches to the Typology of Word Classes*. Berlin &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pp. 47-63.
- [3] Blust, Robert. 2005. Must sound change be linguistically motivated? In *Diachronica* 22:2. pp. 219-269.
- [4] Borer, Hagit. 2005. *Structuring Sense*, Vol. 1: *In Name Only*. 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5] Britain, David. 2012. Koineization and cake baking: Reflection on methods in dialect contact research. In Ender, Andra, Adrian Leemann, Bernhard Wälchli (eds). *Methods in Contemporary Linguistics*. Berlin, Boston: Mouton de Gruyter.
- [6] Britain, David and Peter Trudgill. 1999. Migration, new-dialect formation and sociolinguistic refunctionalisation: reallocation as an outcome of dialect contact. *Transactions of the Philological Society* 97: 245-256.
- [7] Briton, Laurel J. and Elizabeth Closs Traugott. 2005. *Lexicalization and Language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8] Chambers, J.K. 1995. *Sociolinguistic Theory: Linguistic Variation and Its Social Significance*. Oxford and Cambridge: Blackwell.
- [9] Chao, Yuan Ren. 1968.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0] Chen, Chung-yu. 1982a. *A Fifth Tone in the Mandarin Spoken in Singapore*. Singapore: Chinese Language & Research Centr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Reprinted in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1-1 (1983): 92-119. 又见陈重瑜 (1993)。
- [11] --. 1982b. Salient Segmental Features of Singapore Mandarin. Singapore: Chinese Language & Research Centr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又见陈重瑜 (1993)。
- [12] --. 1984. Certain lexical features of Singapore Mandarin. New papers on Chinese language use. In Hong, Beverly ed. *Contemporary Chinese Papers*. No. 18: 93-104. Australi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又见陈重瑜 (1993)。
- [13] Chen, M.Y. and William S-Y Wang. 1975. Sound change: Actu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Language* Vol. 51 No. 2: 255-281.
- [14] Cheng, Hui-wen. 2004. *The Syntax and Semantics of Post-verbal Diao*. Master Thesis. Graduate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15] Cheng, Robert L. 1989. *Mandarin Function Words and their Taiwanese Equivalents*. Taipei: The Crane Publishing Co.
- [16] --. 1997. *Taiwanese and Mandarin Structures and their Developmental Trends in Taiwan III: Temporal and Spatial Relations, Questions and Negations in Taiwanese and Mandarin*. Taipei: Yuan-liou Publishing Co.
- [17] Chierchia, Gennaro. 1998. Reference to kinds across languages. *Natural Language Semantics* 6.4: 339-405.
- [18] Chomsky, Noam, and M. Halle. 1968. *The Sound Pattern of English*.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19] Chua, Chee Lay. 2003. *The Emergence of Singapore Mandarin: A Case Study of Language Contact*.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 [20] Clements, G.N. 1985. The geometry of phonological features. *Phonology Yearbook* 2: 223-252.
- [21] Croft, William. 2001. *Radical Construction Gramm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2] --. 2003. *Typology and Universals*. 2nd e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3] Croft, William and Poole. 2008. Inferring universals from grammatical variation: Multidimensional scaling for typological analysis. *Theoretical Linguistics* 34-1: 1-37.
- [24] Dillard, J.L. 1972. *Black English: Its History and Usage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Random House.
- [25] Eckert, P. 1989. *Jacks and Burnouts: Social Categories and Identity in the High School*.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 [26] Emerson, Ralph. 2003. The phonosemantics of nasal-stop clusters. *Iconicity in Language*. www.trismegistos.com/IconicityInLanguage.
- [27] François, Alexandre. 2008. Semantic maps and the typology of colexification: Intertwining polysemous networks across languages. In Vanhove, Martine, ed. *From Polysemy to Semantic Change: Towards a Typology of Lexical Semantics Associations*. Amsterdam/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p. 163-215.
- [28] Gambhir, S.K. 1981. *The East Indian Speech Community in Guyana: A Sociolinguistic Study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Koine Formation*.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 [29] Hale, K. and S. J. Keyser. 2005. Aspect and the syntax of argument structure. In Erteschik-Shir, N. and T. R. Rapoport (eds). *The Syntax of Aspec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42-64.
- [30] Heine, Bernd. 2010. On metatypy: What is possible in language contact? In *Linguistic Studies*. Vol. 5. pp. 17-34.
- [31] Hovav, Rappaport and Beth Levin. 1998. Building verb meanings. In Butt, Miriam and Wilhelm Geuder ed. *The Projection of Arguments: Lexical and Syntactic Constraints*. Stanford, CA: CSLI Publications. pp. 97-134.

- [32] Kerswill, P. 2001. Koineization and accommodation. In Chambers, J.K., P. Trudgill and N. Schilling-Estes (eds). *The Handbook of Language Variation and Change*. Oxford: Blackwell. pp. 669-702.
- [33] Krashen, Stephen. 1981.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Oxford: Pergamon Press.
- [34] Kuo, Eddie C.Y. 1984. Mass media and language planning: Singapore's Speak Mandarin Campaign. I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4 (2). pp. 24-35.
- [35] Labov, W. 1972. *Sociolinguistics Pattern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36] Lakoff, George and Johnson M.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37] --. 1987. *Woma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 [38] Lamarre, Christine. 2001. Verb complement constructions in Chinese dialects: Types and markers. In Hilary Chappell ed. *Sinitic Grammar: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Perspectiv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85-121.
- [39] LaPolla, Randy J. 2001. The role of migration and language contact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ino-Tibetan language family. In Dixon, R.M.W and A.Y. Aikhenvald (eds). *Areal Diffusion and Genetic Inheritance: Case Studies in Language Chan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225-254.
- [40] Lass, R. 1984. *Phonology: An Introduction to Basic Concep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41] Lau, Yu Chin Leon. Unpublished paper. Phonological Variation and Change in Singapore Mandarin: A Focus on the Removal of Aspiration from the Voiceless Bilabial.
- [42] Lee, Leslie. 2010. The tonal system of Singapore Mandari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joint meeting of IACL-18 and NACCL-22, May 20-22, Harvard University. Published in the Proceedings of the 22nd North American Conference on Chinese Linguistics (NACCL-22) and the 1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ese Linguistics (IACL-18).
- [43] Li, Charles N. and Sandra A. Thompson. 1981. *Mandarin Chinese: A Functional Reference Gramma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44] Li, Fengxiang. 1993. *A Diachronic Study of V-V Compounds in Chinese*. PhD Dissertation.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uffalo.
- [45] Liu, Mei-chun. 1997. Conceptual basis and categorical structure: A study of Mandarin V-R compounds as a radial category. In 《中国境内语言及语言学》第IV辑，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 [46] Magnus, Margaret. 2003. Archetypes in the Consonants. Margo's Magic Letter Page: www.conknet.com/~mmagnus.
- [47] Moravcsik, Edith. 1978. Universals of language contact. In Greenberg, Joseph H. ed. *Universals of Human Languag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94-122.

- [48] Newman, John. 1993. The semantics of giving in Mandarin. In Geiger R. A. and B. Rudzka-Ostyn (eds.) *Conceptualizations and Mental Processing in Language*. Berlin &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 [49] Nida, E.A. and H.W. Fehderau. 1970. Indigenous pidgins and koiné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merican Linguistics* 32 (2): 146-155.
- [50] Norman, Jerry. 1988. *Chines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51] Packard, Jerome L. 2000. *The Morphology of Chinese: A Linguistic and Cognitive Approa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52] Rottet, Kevin. 1995. *Language Shift and Language Death in the Cajun French-speaking Communities of Terrebonne and Lafourche Parishes, Louisiana*.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dissertation.
- [53] Samarin, W.J. 1971. Salient and substantive pidginization. In Hymes, D., ed. *Pidginization and Creolization of Languag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117-140.
- [54] Shi, Dingxu. 2004. *Peking Mandarin*. Muenchen: LINCOM GmbH.
- [55] Siegel, Jeff. 1985. Koinés and Koineization. *Language in Society* 14 (3): 357-378.
- [56] --, ed. 1993. *Koinés and Koineiz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99).
- [57] --. 1993a. Introduction: Controversies in the study of koinés and koineization. In Siegel, J., ed. pp. 5-8.
- [58] --. 1993b. Dialect contact and koineization. In Siegel, J., ed. pp. 105-121.
- [59] --. 2001. Koine formation and creole genesis. In Smith, N. and T. Veenstra, eds. *Creolization and Contact*.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p. 175-197.
- [60] Stephen Matthews and Virginia Yip. 2011. *Cantonese: A Comprehensive Grammar*. Second Edi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61] Tai, James H-Y. 2003. Cognitive relativism: resultative construction in Chinese.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4/2: 301-316.
- [62] Talmy, Leonard. 1985. Lexicalization patterns: Semantic structures in lexical forms. In Shopen, Timothy ed. *Language Typology and Syntactic Description Vol. 3: Grammatical Categories and the Lexic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57-149.
- [63] --. 2000. *Toward A Cognitive Semantics: Vol. II: Typology and Progress in Concept Structuring*.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64] Thio, E. 1960. The Singapore Chinese protectorate, events and conditions leading to its establishment 1837-1877. In 南洋学报 16 (1-2).
- [65] Thomason, Sarah G. 2001. Contact-induced typological change. In Haspelmath, Martin, Ekkehard Koenig, Wulf Oesterreicher, and Wolfgang Raible (eds.) *Language Typology and Language Universals, Sprachtypologie und Sprachliche Universalien: An International Handbook*. Berlin &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pp. 1640-1648.
- [66] --. 2003. Contact as a source of language change. In Richard D. Janda & Brian D. Joseph (eds.) *A Handbook of Historical Linguistics*. Oxford: Blackwell. pp. 687-712.

- [67] Thomason, Sarah G., and Terrence Kaufman. 1988. *Language Contact, Creolization, and Genetic Linguistic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68] Trudgill, P. 1986. *Dialects in Contact*. Oxford: Blackwell.
- [69] --. 1998. The chaos before the order: New Zealand English and the second stage of new-dialect formation. In Jahr, Ernst Håkon, ed. *Advances in Historical Sociolinguistics*.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pp. 1-11.
- [70] --. 2003. *A Glossary of Sociolinguis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71] --. 2004. *New Dialect Formation: The Inevitability of Colonial Englishes*.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 [72] Trudgill, P., Elizabeth Gordon, Gillian Lewis, and Margeret MacLagan. 2000. Determinism in new-dialect formation and the genesis of New Zealand English. *Journal of Linguistics* 36: 299-318.
- [73] Viberg, Å. 1984. The verbs of perception: A typological study. In Butterworth, B., B. Comrie and Ö. Dahl, eds. *Explanations for Language Universals*. Berlin, New York, Amsterdam: Mouton de Gruyter. pp. 123-162.
- [74] --. 2002. Polysemy and disambiguation cues across languages: The case of Swedish *få* and English *get*. In Altenberg, B. and S. Granger (eds). *Lexis in Contrast*.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p. 119-150.
- [75] --. 2005. The lexical typological profile of Swedish mental verbs. *Languages in Contrast* 5(1): 121-157.
- [76] Walker, James A. (James Anthony). 2010. *Variation in Linguistics Systems*. New York: Routledge.
- [77] Weinreich, U., W. Labov and M. I. Herzog. 1968. Empirical foundations for a theory of language change. In Lehmann, W. and Y. Malkiel (eds). *Directions for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pp. 95-195.
- [78] Yue-Hashimoto, A. 1993. *Comparative Chinese Dialectal Grammar: Handbook for Investigators*. (Collection des Cahiers de Linguistique d'Asie Orientale 1.) Paris: Ecole des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 [79] Zipf, G.K. 1949. *Human Behavior and the Principle of Least Effort*. Cambridge: Addison-Wesley Press.